

间谍秘史

——日本间谍惊人成功的奥秘

英　理查德·迪肯　著

王殿忠　译

军事科学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间谍秘史

——日本间谍惊人成功的奥秘

〔英〕理查德·迪肯 著

王殿忠 译

军事科学出版社

Richard DEACON

LES EXTRAORDINAIRES RÉUSSITES DES SERVICES SECRETS JAPONAIS

Jacques Grancher, éditeur, Paris

根据巴黎1986年法文版译出

间谍秘史

日本间谍惊人成功的奥秘

〔英〕理查德·迪肯 著

王殿忠 译

☆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昌平环球科技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625 印张 149 千字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7-80021-227-0/K·010

定价：3.30元

译者前言

情报的源起，一般认为始于战争。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手段的复杂、技术的进步和军事科学的发展，情报工作的面目也日新月异。到了近代，由于工业、商业、科技等的蓬勃发展，情报也便进入这些领域之中，因而也使人类生活在情报世界之中。

在中国，最初有关情报的理论，大约见于2000多年以前的《孙子兵法》，那上面关于情报工作的一些精辟论述，至今仍在许多国家被许多人当成原则使用。这不仅使我们中国人深感骄傲，就连日本人也为之骄傲；日本人宣称，他们是世界上第一批翻译《孙子兵法》的人，有的英文译本还是参考了日文译本才译出的。

本书内容丰富，史料翔实，文笔生动，比较系统地描述了自十六世纪以来日本情报事业的发展道路，栩栩如生地介绍了日本间谍不少成功和失败的实例，令人从中可以汲取不少经验和教训。书中搜集了大量正史上难以找到或当时不便披露的机密材料，其中有许多都是首次公开的内幕情况，读来使人惊诧不已。正如本书英文本的编辑所介绍的那样："作

者在这里向我们揭示了大量超级机密档案，比如您是否知道，当俄国的十月革命正在如火如荼之时，日本的情报专家们曾有过一个拯救沙皇出俄国的计划？您是否知道，他们在1934年曾制定过一个秘密计划，根据这个计划日本人要把在德国和俄国的数万名犹太人安置到'满洲'……另外，卓别林的贴身仆人曾是美国海军某基地情报网上的一个特务等等。”

本书涉及的历史人物众多。诸如丰臣秀吉、土肥原、川岛芳子……等等，中国方面的有孙中山、袁世凯，以及北洋军阀中的一些头面人物等。一些历史上有名的事件，如日俄战争、日美太平洋战争、珍珠港事件等等，都有活生生的人物作主干，“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令人读之如读小说，但却都是史实。

作者的某些观点，当然也不无偏颇之处，请读者注意鉴别。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大量的日本人名、地名及有关日本历史和情报方面的某些材料，多承王述坤先生和周明樑先生鼎力帮助，特致谢意。

另外，本书的翻译因参考资料所限，有些历史上的细节如三合会的接头诗等，难以详加译注，同时还可能有些技术上的错误，敬请识者给予指教。

王殿忠

1989年5月于南京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1
第二章 实现统一大业的伟人………………………… 7
第三章 英国来的特务………………………………… 17
第四章 秘密会党与情报机构的合作………………… 24
第五章 明石上校和“黑龙会”……………………… 34
第六章 日俄战争……………………………………… 42
第七章 柏林——符拉迪沃斯托克，骑马
而行…………………………………………… 53
第八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64
第九章 川岛浪速——满洲的冒险家……………… 69
第十章 拯救沙皇的计划……………………………… 79
第十一章 “战斗的波涛”…………………………… 89
第十二章 土肥原将军和川岛芳子………………… 97
第十三章 政治警察…………………………………112
第十四章 海军间谍在美国…………………………122
第十五章 查理·卓别林的男仆事件………………132
第十六章 在东南亚的情报手段……………………146
第十七章 苏联在日本的情报网……………………154
第十八章 珍珠港事件的后果………………………162
第十九章 密码电报：一次决定性的失败…………172
第二十章 新的起点…………………………………181
第二十一章 战后的情报工作………………………186

第二十二章　情报工作开辟了通向繁荣的道路……………………………………195

第一章　引　言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引自《孙子》

在日本，与其它国家的观念相反，他们一向把间谍活动视为一种光明正大和爱国的行为。在日本的许多参考书中，对他们的许多大人物曾参与过间谍活动这一事实，并不隐瞒。我们在日本版的《名人录》中，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

石川吾一，间谍。生于1866年，卒于1894年，曾被派往中国。在那里，他的足迹直达蒙古边境。在中日战争[1]期间，他仍然在中国活动，但后来被中国逮捕，并被处死……

为使日本的"情报"工作，在我们的头脑中有一客观"形象"，必须把它在二十世纪30年代时咄咄逼人的间谍工作同英国伊丽莎白一世时沃尔辛厄姆[2]的间谍工作和克伦威尔[3]时期瑟洛[4]的间谍工作加以比较。

---

(1)指1894年的中日甲午之战。——译者

(2)沃尔辛厄姆：弗朗西斯·沃利辛厄姆(1530—1590)英国政治家，当过驻巴黎大使、部长和国务秘书。在国务秘书任上，曾组建过强大的情报网。——译者

(3)克伦威尔：奥利夫·克伦威尔(1599—1658)，十七世纪英国共和时代的摄政者，称"护国公"。——译者

(4)瑟洛：约翰·瑟洛(1616—1668)，英国政治家，曾任国务秘书。——译者

这三个时期，在英国同在日本一样，每个时期都处于帝国蓬勃发展时期。同时，为把当时发生的事件理解得更加准确，还必须明白，日本国，它从十七世纪过渡到二十世纪，差不多只用了50年的时间。1840年日本的生活状况和1640年欧洲各国的生活状况处在同一水平上，但到1910年，它便成了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现代文化强国。若把世界各国的秘密情报工作做一比较，便可发现，它们中间没有任何共同之点。了解一下它们彼此间的区别，对我们当有益处。

以色列的情报工作，旨在不惜一切代价使以色列国保存下来——毫无疑问，这便是它的情报工作何以如此卓有成效的原因。苏维埃俄国在世界各地的情报工作是众所周知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则试图在日益发展的行政权力机构和雇佣军之间谋求平衡。中国的情报工作似乎最使人迷惑不解，尽管它从属于一个共产主义政府，但它却和克格勃根本不同。

在观念上，同其它任何大国相比，情报工作最具公开性和最富形象性的，日本是唯一的国家。在世界各民族中，日本人民是唯一的"为知而求知"的民族。他们搜集的情报经常用于和平目的，即：使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加兴旺发达。在这方面，西方国家应该向日本学习。

情报收集工作的源起，可以追溯到2450年以前。当时中国的军事家孙子就已对间谍的技术工作做了发挥。本章开头引用的孙子那段语录，便是日本秘密情报工作几个世纪以来所遵循的第一条准则。孙子所著《兵法》或称《战争谋略》一书，其中的许多原则，在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人心不古的世界上仍然适用。我们可以从许多日本将军的著述中看到《孙子兵法》的影响，时至今天，仍然如此。

英国原驻东京武官马尔考姆·肯尼迪上尉曾写过大量关

于日本文明的著述。他把日俄战争中，日本情报工作的成功，归结为他们深入地研究了中国两位军事家吴起和孙子的军事著作。为了更好地理解日本秘密情报工作的动机，必须了解属于日本人民性格中的两个特点。第一，他们有一种极其强烈的自主意识和个人主义意识；由于这种意识的影响，使日本在几个世纪里，形成了国家的孤立主义。这一点可以解释它之所以比其它国家发展迟缓的原因，但又是这一点，却加强了它的民族主义精神。第二个特点，便是极其强烈的求知欲。求知，可以说是这个民族的天性。

十二世纪的日本，国家控制在“征夷大将军府”之下，这是一个军事性的部门。府邸设在东京附近的镰仓。当时，如果那些军事统治者们决心想使日本同外界隔离时，他们就把对外国人的敌视情绪散布到人民中间去。从前，日本人对于海外来客，一直表现得十分礼貌，他们是个好客的民族。到了德川幕府统治时期，一支名符其实的官方特务大军便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他们时刻都在窥伺着哪怕是一点点的反对政府迹象。任何一种不慎的言论，或任何一种不合当局意愿的行动，都可招致本人甚至全家被捕。在那个时期，特务活动已成为国家统治的手段。

在这一时期，还有一种名叫“能人团”的组织，其成员一般是从“萨木拉依”（武士）[1]中招募而来。在日本的词典里有一个叫“忍者”的词，就是“萨木拉依”，其释意为：“武技高超、行动飘忽，来去无踪并从事间谍活动的人。”相传“忍者”还能在水上行走如飞。总之，这些人都类似詹姆斯·邦

(1)“萨木拉依”，即日本所谓的“侍”，是贵族的侍卫和武士的总称。——译者

德[1]之流的人物。

除了"征夷大将军"的特务手段之外，日本人还有一个天生的特性，那便是对任何事物都好奇，这种好奇心理便产生了一个后果，即他们往往被自己人或是外国人怀疑为间谍。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渴望了解各种事物的心情而已。

这种渴求知识的愿望，甚至竟发展成为一种对未来进行占卜的狂热，或者至少已发展成对未来的发展力证实的激情。在二十世纪，未来学有发展的趋势，它被某些人看作是一门科学。而且有一批研究未来信息的单位在世界各地建立了许多网点。如果说日本人在这方面的一些技术手段是走在前面的话，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六世纪。

占卜术在日本一向是比较盛行和普及的。在传统的习惯上，日本的星象学家一直处于一种非常特殊的地位。时至今日，人们仍在借助电子计算机进行占卜。从前，日本人把占卜家称为"阴阳师"。他们属和尚、道士之流，其地位之高，相当于国家的参事。当时日本首都是奈良。在奈良的朝廷上，他们负责预卜国家的吉凶祸福。在一个情报事业尚处于初级阶段的国度，他们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他们掌握着预测事物成败的权力，同时还负有对收集的情报进行分析的责任。当时朝廷还在间谍部门内部设置了从事预卜的专门机构，被称为"阴阳寮"，它附属于当时的内务省。

"阴阳师"们把卜算出的吉凶祸福，以及把对收集来的情报进行分析的结果，直送"太政官府"（相当于国务院）[2]。

（1）詹姆斯·邦德，是英国系列间谍片"特务007"中的主角，他勇敢坚强、武技超群，是一个被神化了的人物。——译者

（2）太政官府是明治初期设置的最高行政机构。后来日本改为内阁制，太政官府便被取消。——译者

这些人把中国的占星术学说应用于日本的政治之中。日本把黄道12宫同中国的12个属性相结合，也分成12个形象和符号，但其占卜方法却有些不同，即只有36种具体算法被日本朝廷所采用。

在这些算法中有星象学、字象学、手象术、圆梦术以及感应术等。其它则有些类似于气象学方面的东西，如"风占术"，即借助风力进行占卜。这些占星术在奈良时代开始应用，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仍盛行不衰。其中"风占术"在专设机构"阴阳寮"中崭露头角，直至近期，它仍然在海防系统中被应用。如风向以及风力的强弱被仔细地加以研究，以利用它使潜在的敌人处于不利地位。

"卡米卡宰"(意即"神风")这个词是日本人在十三世纪与忽必烈可汗的战争中使用起来的。在这次战争中一场强大的风暴帮助了日本人，使蒙古人的入侵失败了。那是在1281年，一场破坏性的飓风袭击了蒙古人的舰队，使日本人取得了胜利。自那以后，"风占术"便带着更加科学化的性质发展起来，而颇带神秘色彩的"卡米卡宰"一词则成了日本海军的传统词语。二十世纪初，在日俄战争中，"风占术"在战略上也帮了日本的忙。"卡米卡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被报纸和电台广泛地使用。在讲到日军航空兵驾驶员，用座机冲向敌方战舰作孤注一掷时尤其如此。日本海军少将大西泷治郎，在提到飞机俯冲轰炸敌舰甲板时，即用这个字眼，他把它同海上的飓风所造成的毁灭性破坏相提并论。

与此相同的爱国热潮，也使得"浪人"们(具有浪漫色彩的冒险者)活跃起来。他们积极参加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大大膨胀起来的秘密社团。这些人保卫国家的热情和他们天生的勇敢性格，使他们成为第一流的间谍，在西方世界很难找

到可以与他们媲美的人物。一个失去了首领的士兵看起来似一雇佣者，然而，基于他的爱国热情，就是出最高价钱，他们也从不出卖自己，他们一方面为荣誉心所驱使，同时还掺杂着激进民主主义的狂热性。

这些秘密会党构成了日本唯一的、又是形式多样的秘密情报工作的基础。1930年它已发展成一个遍布世界的情报组织网。日本人的间谍工作是全面的，它比苏联的情报网更有效率。这时的日本，它执行的是一种不甚民主的政治，但颇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它却选定了一个和人民群众一起搞情报的方式。它的情报工作，得到了并非属于情报机关的各阶层人员诸如农民、工联主义分子、以及“浪人”等的充分支持。

“秘密情报”这个名称，对每一个不同国家或民族来说，意味着不同的含义。各种情报动机随着年代的变化而变化，但对其最有影响的则始终是国防的需要和建设的需求。

总而言之，秘密情报无需使人觉得可怕，尽管害怕是一种普遍心理……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将有可能在世界上为情报工作创造一个和平观念开辟一条道路。情报的获取将有可能帮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繁荣，将帮助我们克服世界上某些地区的饥馑，或者将帮助我们利用科学成果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东京已为此打开了道路。但他们的范例似乎并没有被所有的人所理解。

第二章　实现统一大业的伟人

丰臣秀吉一生的事业，是一个天才家最值得纪念的胜利业绩之一，他逾越了日本历史上所能容纳的、众多的和巨大的障碍……象他那样杰出的一生是少见的。

——瓦尔德·戴宁

一个注定成为一位日本最伟大的将军，甚至一名最伟大的国家元首的孩子，诞生于天文5年的第一个月的第一天（1536年1月1日）。曾有一个神话般的传说，说他降临世界的那一天，天上出现了一颗新星。他的名字便叫丰臣秀吉。

当时的日本，对外闭关锁国，内部松散动乱，经过两个世纪的内讧和斗争，使这个国家的百业凋敝，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包括各个岛屿在内的各藩，由10个军阀和贵族所割据，他们不遗余力地进行互相间的阴谋斗争。其中有3个军阀分据在当时的首都京都附近。这3个人都试图与当时的中央政权建立联系。

日本十二世纪创立的幕府制，在丰臣秀吉诞生时，仍然是一个有实权的军事立法权力机构。丰臣秀吉的传记作者瓦尔德·戴宁把当时的日本帝国比作“一张巨大的特务网……这

个政府体系的基本原则，是对一切人都怀疑。”

当丰臣秀吉还是孩子时，就喜欢运动而不好读书。他头脑聪慧，思维敏捷，并且小小年纪便具有惊人的推理能力。作为一名学生，他面对书藉无精打彩，懒于学习，但对外界刺激的反应却迅速而有力。他敢于同当权者对抗。与他同时的人都认为他长得象只猴子，并以此为绰号来称呼他。然而，他成年时的画像却与这一称号不符，这可能是画师们想把他的形象搞得好一些。不过据说，丰臣秀吉对于自己象只猴子颇感骄傲。他对各种体育活动都有异乎寻常的兴趣。比如角斗、跳跃、爬树等等。在寺庙的学校里，他经常因不用心听讲宗教课而受到斥责。对此他反驳说：

“你们这些和尚，其实是一大群乞丐。你们没有理由来让一个来到这个充满对立和冲突的世界上的勇敢孩子学习当乞丐。”

这个回答表明，他是早熟的，他当时即已本能地感觉到，对他的国家来说有许多事情要做。

他12岁时被和尚们从学校开除，因为他反对神灵的崇拜，并且打碎了一尊菩萨的塑像，当时他对着神像说：

“你好象是一个能助人的神。你受到所有来寺庙进香人的尊崇，人们天天都在给你供奉祭品，可你好象一点儿也没有吃，一个什么也不吃的神像，怎么能有足够的力量去保护他人呢？你不是一位女神，而是一个不能说话的泥像，我非把你打个粉碎不可！……”

自从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后，丰臣秀吉谋取职业就困难了，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他竟被辞退了38次。在家乡附近，他被看成一个没有用的人。他对于雇主们也报以同样态度，对他们深恶痛绝。于是他决定单枪匹马地出去碰碰运气。尽

管他谴责把乞讨作为生活的准则，他还是长途跋涉去乞求施舍，企望得到一个职业以为自己今后的发展争取一线希望。此后不久，他结识了一个拦路打劫的团伙，并说服他们收留他作帮手。这个强盗团伙的首领名叫高鹿，他对丰臣秀吉的机灵颇为欣赏，于是便答应收留他。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先考察他一下是否能够翻墙入室，到高堂华屋里去盗窃。于是这位年轻人便出发侦察了。他首先研究了各类屋主的房屋所处的位置和地形，又记下了各类宅院的防范措施和弱点，然后又设想了事成之后怎样才能尽快逃跑的方案。最后这群强盗便选中了一家宅院作为目标。丰臣秀吉替他们带路。当他第一个进入那栋住宅后，不料被里面的人听到了，黑暗中许多人向他扑来。他隐藏在一根大柱子后面，突然灵机一动想出了一办法，他拿起一块石头扔进旁边的井里，同时发出一声惊叫，以使那些人以为他掉进井里，当人们朝井跑去时，丰臣秀吉便不慌不忙地从另一个方向逃了出去。

高鹿对于一个年纪这么小便有这么机灵聪慧头脑的人十分欣赏。作为对秀吉的奖赏，高鹿送给他一把剑，那是国内最优秀的军工匠人制造的。

秀吉后来又回到自己的家乡。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觉得要想实现自己的抱负，就必须离开亲人们。但他父亲只不过是一个穷伐木工人，没有任何关系可找。他为了能投靠到当时日本最大的军阀织田信长的门下，曾挖空心思想过许多办法。他认为首先必须找个借口以便能够接近这位大人物的住宅。机会终于来了，有一个和尚请他代做一件功德，名叫"福达"，这是每年和尚们必须进行的一件例行工作，其任务是到大人物家里向各类人员出卖祈祷经文。

当他为完成这一任务而在许多大人物那里走家串户时，

他认识了一位非常富有的朝臣，此人出身于一个名叫今川的贵族之家。他便在今川家里当了仆人。在这期间他还学习了剑术，很快成了一名击剑好手。这样不觉已到成年，其主人建议他成家立业。由于在这里的成功，更使他下定决心要到织田信长名下去干一番事业。这时他又去探望了一次他的双亲，他对自己未来的成功充满信心，竟放肆地向他们宣称：

“你们任何人不要再指望得到我的消息了。倘若在全日本都知道我的名字之前，我便已死去的话，我或许会安排人来告知你们我的死讯。不然的话，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1558年，他在织田信长经常打猎的一个山区安顿下来。由于他的胆略和迫切希望成功的心理，使他克服了种种困难，最后终于得到了这位大人物的召见。织田信长向他提了一些有相当深度的难题，他回答得十分恰当而明确，给织田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于是织田便在自己的长随班子中给了他一个位置。其时他们行猎已毕正在归途，这位名将转过身来对随行人员开玩笑地说道：

“今天我们这场围猎打得非常不错，竟猎到了一只猴子，现在我们可以回去了。”

从那一刻起，丰臣秀吉无论受领什么任务，都竭尽全力，完成得十分出色，以此来取悦于主人。织田信长很快地就发现他每天起得比别人都早，工作也干在别人前边；同时他还发现，这个年轻人工作很有效率，并且善于观察，善出好主意。

不久，丰臣秀吉便表现出，在主人面前他绝不仅限于是一个好的侍从，而且还是一个善于深思熟虑的好参谋，他对主人由于一时冲动而作出的行动和计划能够大胆劝阻。他所以能做到这些，其秘密就在于他的头脑中能够不断地出现新颖出

奇的独特想法，他的语言富有感染力和说服力。而这一切足可与其在军事上的英勇善战相提并论。

凭着他的聪慧，他初步学会了“将棋”，即一种类似象棋样的带有军事性的游戏。这种消遣，作为一种战略演习，在织田信长时代特别为那些将军们所看重。丰臣秀吉非常精于此道，他的非凡判断力每每在他主人的获胜中显示出来。织田渐渐向外扩张势力，从而使自己的疆域也在慢慢地扩大，仅用了几年时间，他便在日本绝大部分领土上成为不可争辩的领袖。在征服其对手的一系列战争中，丰臣秀吉发挥了他的全部才能，因而被提升为织田信长的全军统帅。这时他已成为众人的领袖，并且很快地便赢得了大家的信任。他也是一个同时具有勇士气质的老练的政治家。

织田信长令人在京都建筑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但他的绥靖计划却执行甚缓，直到1582年他被手下的一名军官刺死，该计划仍未实现。丰臣秀吉接过这个计划，继续完成织田未竟的事业。

丰臣秀吉在军事上的胜利，应归功于为他提供各种敌情的情报工作网，归功于他的陆战战略。他也是遵循孙子兵法格言的人，他在战争中大胆地，并带有创造性地运用这些格言。在使用他所建立起来的密如蛛网的情报网点时，他坚持情报人员必须亲自走遍各地，并向他提供各该地区所发生的各类事件。他的情报人员必须按计划互相轮换，他们在各地所进行的情报活动也需轮换周转实施。这样，便可以把第一批人员取得的情报同以后的人所取得的情报加以比较。每当他着手制定作战计划时，他必先派出侦察人员，并规定这些人员要向他做出详细的报告。

例如1587年，当他准备夺取日本帝国最南部的领土——

九州岛时，他竟把进攻时间推迟了一年多。其原因是为了使他的情报人员能向他提供更充分的情报，并在人民群众中进行颠覆活动。他得到了九州岛的各种地形详图，得到了有关农作物收获、粮食贮藏、商品运输以及九州岛上各割据军阀同其所辖军队的关系等各方面的情报。所有这些，对他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他认为，这些因素是决定他行动成败的关键。作为长期打算，丰臣秀吉意在征服他所有的同盟者。为了圆满地实现这一目标，他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宽容态度。他对诸如条约、协定之类的东西常常表现得不信任。他那无产者出身的烙印也时常在他身上体现出来。有一次他手下的一个人员大胆地向他提出，说他缺乏大人物应有的尊严。对此，丰臣秀吉反驳道：

"这可以请你放心！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没有任何人象我这样强有力，因此也就没有任何人敢于起来反抗我！"

尽管他经常表现得十分傲慢，但他也非常明白应该在什么情况下要谦逊。身为一个高官显贵，他却对人民有一种本能的理解。同时，凡需向敌手提出的意见、方案等他都经过仔细认真的考虑。当时的军阀德川家康曾和他对峙过一段时间，但随后便投降了。当德川家康被带去见大阁[1]时，大阁令他去说服另外两个军阀义久和义弘交出武器投降。德川家康没有完成这个使命便回来了。丰臣秀吉手下的将军们怀疑德川家康在玩弄两面手法，但丰臣秀吉却不同意这种看法，并想和德川家康搞一个联盟。

当时，岛津义久的势力也非常强大。日向、大隅、萨摩三个藩都在他的控制之下。与其毗邻的藩分的人民不准进入

(1)指丰臣秀吉。大阁相当于后来的宰相。——译者

他的辖区，甚至连通商都不允许，因此要在外边找一个熟悉其内部情况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为解决这个问题，在派兵去九州岛的前一年，丰臣秀吉就已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情报机构。他想，岛津义久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于是便派了六名间谍打到显如高僧那里去当差，因为显如和尚为执行一项专门任务，正在准备与岛津义久会见。

在显如和尚身边的6名间谍中，有两名是丰臣秀吉的最好的武士，一名叫春日猛森，一名叫平野永吉。在几百年当中，日本情报工作的一个令人吃惊的特点，就是间谍人员非常善于化装。甚至最高阶层的贵族人物，为了适应间谍工作的需要，也不惜借助化装术，乔妆改扮成最低下的贫民。即使时至二十世纪，也可以随时举出许多诸如一位上校化装成苦力，一位海军将军化装成渔夫的例子。

显如和尚曾经是岛津义久的老师，因此，他和他的随行人员可以随意在这三个藩内云游。其中的狮子岛是他们经常观光的地方，因为那里是一个佛教盛地，就是在这个地方，丰臣秀吉的间谍获取了大量情报。丰臣秀吉掌握了足够的情报后便命令他的军队沿着川内河向前推进，并把他的指挥所设在一座寺庙里。当显如和尚得知他距丰臣秀吉已不远时，便向义久提出要离开那里，其理由是，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他不想成为义久这块领地上的负担。于是便有人找了几个向导，沿着一条僻静的道路把显如和尚同他的随从带出义久的领地。这样，显如和尚离丰臣秀吉的驻地就更近了。此时，丰臣秀吉派出去的间谍们便回来向他报告了情况，并充当向导，带领50万人马，浩浩荡荡地向狮子岛进发。

然而，与其说丰臣秀吉侵略，倒不如说他实行了一项和解政策。他认为，如果能够不战而克，才是一个政治家应当

采取的战术。他手下的将军们主张立即向敌人土地上这个唯一的堡垒进军。但他却保持着冷静的头脑，为了争取和对方进行谈判，他竟按兵不动一直等了3天。“就是那些对丰臣秀吉发动这样一次攻势的意图十分了解的人，也对他如此宽宏大度感到吃惊”。J·H·格宾斯在他的文章中写道，“大军长驱直入，却不攻占对方的首府；敌人就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却不加以歼灭；保持着一支胜利的军队，直至最后的胜利。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一种坚韧的精神，一种意志的力量。这是很少将帅所能做到的”。

最后，还是德川家康派出了一位大和尚到萨摩的首府，命令他们投降。岛津义久接受了投降条件。这样，丰臣秀吉便以最小的代价达到了目的，而且其结果比预期的还要好。

1590年，他完成了统一日本的大业。前面我们提到，他曾派出一些间谍到显如和尚那里去，岂不知显如和尚本人就是他的一名间谍。当时显如和尚已猜到了他的宏图，便主动为他工作并帮他建立了情报网。丰臣秀吉为此慷慨地给了他一笔奖金。显如利用这笔钱建造了西本愿寺。此寺后来成了日本的佛教圣迹之一。

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在国内完成大业以后，便把注意力转移到海外各国。他同越南、马尼拉和暹逻王国签署了海上贸易协定。他还鼓励外国传教士到日本来。这些传教士第一次登上日本的领土是在1549年，到十六世纪末，他们已接受75000人入了教。丰臣秀吉对这些人是抱着犬儒主义态度的。他曾打算帮助他们或鼓励他们进行反对佛教徒的斗争，而对佛教徒，他同样也表现出犬儒主义思想。他特别强调下述看法：“日本国不应该成为敌对教派之间的赌注”。这些传教士们不懂得，他们不能“赢”丰臣秀吉的钱。他们对权力的欲望

表现得同军阀一样强烈。天主教方济会的那些修士们也不懂得，他们作为使节所具有的使命，也不准许他们进行宗教宣传。丰臣秀吉的一个间谍向他报告说，西班牙王国利用他们的传教士作掩护，进行特务活动。于是太阁很快便据此作出反应：他宣布了反基督教法令，并且立即执行。他同时还下令暗杀六名欧洲传教士和20名信基督教的日本人。但他却准许基督教商人继续从事商业活动，而且他手下还有两名军官竟然也是基督教徒。

丰臣秀吉在一生中只犯了一个错误。直到1592年，日本几乎从未停止过侵略别国领土的政策。他下令进犯高丽，但这一企图遭到惨重失败。1597年他开始认识到这一侵略政策是他一生事业中最为严重的错误。在他去世前不久，曾对军队远离自己的国土，到它国土地上去流血牺牲的做法公开地表示遗憾。并下令从高丽召回他的军队。

尽管他已风烛残年，但在与敌人斗智方面，仍然不失当年风采。关于这一点，有一份当他打算派兵十万到高丽去时他和他的军需官麻名永正的一次对话材料可以为证：

麻名永正：您对后勤方面有什么指令？

丰臣秀吉：准备300万斤带壳的稻谷。

麻名：这么多稻谷怎么运输？

丰臣：调集一切海上运输工具，将其运到釜山港。

麻名：这么多粮食，运到那里我们怎么看守呢？

丰臣：无需看守，静待事情的发展好了。

麻名：如果我们不加看守，高丽人岂不要将其全部拿走？

丰臣：难道这不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吗？

麻名：可是，如果我们失去这些给养，那我们岂不是将陷入重重困难之中？

丰臣：要知道，这是300万斤带壳的稻谷，这样一个数量，仓促之间是不可能把它们运走的，也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它们吃掉。

麻名：高丽人会把它们全部运到内地去的。

丰臣：如果真是如此，那可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情。让敌人给我们当运输队，是一件合算的买卖。如果按这个方案进行的话，那么我们的军队所到之处沿途随时都会有粮食在等待着他们。

丰臣秀吉所预料的，终于得到了实现。那些稻谷果真被高丽人运往内地各处，但它们都在日军前进的路上陆续被夺了回来。这一战役开始的各阶段，高丽人在人员、粮食和物资上损失惨重。然而，由于战争的拖长，中国人介入了。尽管日本人开始时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最终还是失败了。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粮食供应。

丰臣秀吉在世时，即已成为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是十六世纪日本的唯一一位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同时，正如几个世纪以前中国的孙子一样，丰臣秀吉被视为日本情报事业的开山鼻祖。他被现代日本人仍视为师表，且受到西方历史学家们和军事家利德尔·哈特(1)的高度赞扬。利德尔·哈特认为丰臣秀吉是一位“比拿破伦·波拿巴更为优秀的将军”。

---

(1)利德尔·哈特，1895年生于巴黎。英国的批评家和军事理论家。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6年负伤后，开始了一系列军事作品和军事评论文章的写作。——译者

第三章　英国来的特务

“那个可怜的维廉·亚当斯，他的船只在日本的海域搁了浅。他并没被当成亲王一样来接待，但这个人……却取得了相当高的地位，并且在这个帝国占有同一位亲王一样多的财富。”

——托马斯·朗德尔：《对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日本帝国的回忆》

丰臣秀吉于1598年去世。他生前最后的愿望就是希望看到德川家康能够暂时继承他的事业，直到他的儿子能够独立承担履行其未竟之志的重任为止。当时他的儿子丰臣秀赖年方七岁。但是不久德川家康发现，这个过渡时期妨碍了帝国政府的团结。在一个坚强、刚毅如丰臣秀吉那样的铁腕人物去世以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其他领袖人物想取而代之来把持这个帝国。

为破坏德川家康的权力基础，这些人不惜制造谣言，并且不择手段地制造事端。因此，家康在执政的头两年里，他的地位受到如此严重的威胁，以致连找一个不背叛他的真正同盟者都很困难。

1600年4月，他寻找真正心腹的心愿竟出乎意外地实现了。当时一队荷兰商船，为寻找新的通商港口，横越大西洋，穿过麦哲伦海峡驶往智利。由于风暴、缺粮和疾病的影响，船

员们受到极大损害。当他们离开智利时已经筋疲力尽。当时船队的船长们还对日本一无所知。但他们听到别人讲，日本那个地方非常需要毛料服装。1600年2月，这个商船队中的一艘船离队而去，只剩两艘商船继续航行。其中一艘船的船长名叫维廉·亚当斯。但是海上的逆风严重地影响了它的航行，于是只好改道沿日本海岸航行。为避免船只触上暗礁，亚当斯只好命令抛锚。不久，一些日本小渔船便前来接他们上岸。尽管他们受到的待遇很好，但很明显，他们已被软禁。由于语言的不同，使他们无法互相了解，交谈只能借助手势。当时只有亚当斯一人了解他们这种微妙的处境。

打破这种局面的最好办法，就是向日本人奉送一些礼物。此外，日本人还似乎对这些不速之客怀有极大的兴趣，同时也渴望了解他们的航海技术。于是日本人便去找来了一个葡萄牙人当翻译，这位翻译可以和亚当斯手下的一名略懂葡萄牙语的水手进行交谈。他来后不久，又来了一位耶稣教会的教士，此人的英语、荷兰语和葡萄牙语都讲得很好。他对维廉·亚当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认为亚当斯在他们同事中最有教养，而且是他们最好的代言人。亚当斯向他提出交涉说，愿以毛料服装为交换，请日本人向他们提供生活必需品，待他们修好船只后便回国。

但是，还有最后一件事没有解决，即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移民商人，都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买卖让那些被他们所瞧不起的新教徒英国人或荷兰人夺去。于是，那位耶稣会的教士便决心对于任何基督教而非天主教对日本的渗透进行抵制。他对亚当斯说，任何一份通商或商业协定，必须由一位葡萄牙的专员来处理。但亚当斯也立即毫不含糊地声明：他只和日本人签署协议。

这位教士十分震怒，他把这位荷兰人的话告诉了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这些人想说服日本人，把该商船的装备就地毁掉，把所有的船员当海盗论处，全部处死。但是德川家康从丰臣秀吉那里学到了不少有关外国人的心理知识，他认为有些外国人经常是表面上装得很诚恳，其实内心却很恶毒，或者怀有不可告人的打算。而家康本人也具有那种日本人身上所具有的突出特点，即非常愿意学习新东西、了解新事物。而这些不速之客恰恰是来自另一个世界。于是他便很雄辩地向他们解释说，如果把他们统统杀死的话，那就得不到他们的秘密，也学不到他们的先进科学了。当然，他也锐敏地看出那些葡人的眼睛只盯住自己的利益。

但是德川家康当时正为平定本土上的一起暴乱而十分繁忙。因而他下令说，要优待这些荷兰俘虏，待他处理完暴乱事件以后，要亲自询问他们。然而，一等就是8个月。在这期间，亚当斯为了能很好地代表船员和日本当局打交道，他学会了足以应付一切的日语。而德川家康在这一时间的平乱工作进行得也很顺利。他的表现证明，他也颇具有一些他的老主人丰臣秀吉那样的军事天才和军事策略。他以敌我损失二与一的比例击败了敌人的军队。因此在他凯旋回宫时，兴致很好。

当那些荷兰人被带到德川家康面前时，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又重新提出处死他们的要求，至少也要把他们驱逐出境。德川家康很不喜欢这种命令式的语气，他绝对不能接受在自己的国土上做什么事却由外国人来发号施令。那些葡萄牙人担心的是，这些荷兰人将会被强行留在日本，更害怕这些人将会和自己一样，成为日本人最好的合作者。德川家康在和荷兰人见面之前，没有做任何决定。但一经交谈，他马上

发现，亚当斯此人十分精明，并且善于辞令，对答如流。他们愈谈愈投机，愈谈德川家康愈喜欢亚当斯。这时，他脑中想的根本不是如何处死这些荷兰人的问题，相反地，他坚持要他们在日本定居下来……。

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建都。在这里，他正式决定把荷兰船员召来为自己工作。他建立了"征夷大将军府"，自己也便成了"征夷大将军"。"5年以后"，亚当斯后来写道，"我请求国王放我回去和我的妻儿们团聚……皇帝对我的请求很不以为然，竟宣布永远禁止我回国，并要求我在他的国家定居下来"。对他来说，不能离开这个异国的土地返回自己的家园，确实是一个打击。但他却受到了征夷大将军热情而慷慨的待遇，因为大将军十分欣赏他的丰富经验。亚当斯在参加荷兰商船队之前，曾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海军里服过役，还在一个名叫"巴尔巴里商业公司"里干过。德川家康赏给他和他的同事一大笔钱，并且向他宣布，自己已把他当成"最光荣的顾问和情报官"。

这样，原是一个下层人物的亚当斯，从此便进入上层社会，并拥有了足可同一位亲王相比的财富。他成了一位权大而精明的君主所尊敬的顾问。不久，他又成为一名优秀的间谍。他亲自向征夷大将军传授航海术和数学。每当德川家康想了解世界上某些事物时，他总是向亚当斯请教，而不再找那些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了。

当他想要知道哪些外国商人在搞些什么秘密活动时，揭示这些阴谋活动的任务也总是落在亚当斯身上。随着欧洲人在日本的影响逐渐下降，亚当斯的影响却在不断上升。一切呈送征夷大将军的文件，都要经亚当斯之手传呈。甚至在某些时候，他还要负责监视宫廷内的妇女，并把她们的一举一动

都报告给征夷大将军。

不久，德川家康下令增加亚当斯的俸禄，并宣布他常住宫内。作为交换，德川家康又要他负责监造一艘舰艇，并在上面装上先进的航海仪器和大砲。与此同时，德川又让他代表日本同荷兰、英国签订一个通商协定。协定条款中有一条是："日本皇帝对世界各种信息均非常注意，对国外的各种新兴规划尤其如此"。亚当斯在给他家人的信中，曾这样描写他在宫中的生活："皇帝给我的地位，相当于一个英国贵族，有90名侍从在身边供我支使"。

1613年，理查德·考科斯船长为替英国设立一个商务代办处在日本登陆。他在给英国政府的一封信中，曾谈到了亚当斯同征夷大将军之间的密切关系："事实是皇帝给予他以极大的信任，他可以随便在什么时候进宫同皇帝谈话，每遇到这种情况，那些王公贵族们便主动退避"。

他甚至可以直言不讳地对征夷大将军说：英国人和荷兰人到日本来，可以打破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对日本贸易的垄断局面。他还曾帮助征夷大将军建造了一些远洋船只。但他的主要任务是向德川家康提供世界上的最新信息。在一定范围内，他鼓励那种迫害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以及益加限制基督教徒活动的浪潮。

在这个时期，亚当斯发现某些日本基督教徒在和丰臣秀吉的儿子丰臣秀赖进行秘密联系。丰臣秀吉死后，秀赖没有当成征夷大将军，他在大阪的一个城堡内索居。当德川家康听到了阴谋反对自己的风声以后，便派兵去攻打这个城堡。丰臣秀赖和他的母亲因不愿投降受辱而自杀身亡。此后德川家康就成了日本不可争辩的领袖。

德川家康死于1616年。当时日本的排外运动日益高涨。

那些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心情特别紧张。然而英国商务代办处的关闭却不是亚当斯的责任，那是因为他们自己管理不善的缘故。

荷兰商务代办处得以保留。直到1638年外国人和外国传教士被驱逐出境以后，该代办处还在继续工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就只有这唯一的一条渠道。到德川家光任征夷大将军时，其排外思想比德川家康更甚。德川家康生前尚且鼓励思想自由，但他的死亡便是专制主义和排外思想抬头的信号。随之，孤立主义也出现了。然而，当时的日本却处在文化繁荣时期，在艺术上有极大的进步，这就加强了它的民族主义情绪，发展了它的自治思想。

亚当斯的影响，使得荷兰商务代办处继续存在下来，他本人也被称为"萨木拉依"，并享有身配双剑的特权。他还起了一个日本名字，叫"安近米拉"("米拉"是日语"反射镜"之意)。并娶了一位日本妻子，她为他生下一男一女。他的府邸也同他的身份相称，"占地宽广，布置豪华，屋外是日本式的花园，有山有水，各种奇花异草点缀于假山怪石之间"。亚当斯于1626年去世，当局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他的日本夫人后来也安葬在他的墓房。他们的墓地至今仍然受到人们的凭吊和崇敬。他身后的名声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英国间谍"。日本政府为纪念他逝世300周年，甚至还在东京为他竖起了塑像。

但到了下一世纪，日本的间谍活动，无论在国内或国外都日渐滑坡。原因是征夷大将军府扎稳了阵脚。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从此就得不到任何外国的情报了。一个精干的团体组成了，它的成员都为搜集在长崎登陆的荷兰商人的情报而学会了荷兰语。这是日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存在的同欧洲人

的唯一联络点。

同样，西方对日本也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或者说，知之甚少。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这种无知的程度。有一个名叫乔治·普沙木纳札尔的年轻人于1703年把自己说成是福摩萨[1]的基督教徒，去欺骗英国人。大主教坦尼森对这个年轻人印象非常之好，竟动员他写了一本描写“福摩萨的地理和历史情况及其对日本帝国的依赖”的书。此人在书中描写了日本人如何如何占领了福摩萨等等，其实这个岛屿当时仍在中国的统治之下。普沙木纳札尔的欺骗行径随后不久便被揭穿了。事实是此人出生于法国北部，曾学习过许多地区的方言，据此，他又炮制出一本《福摩萨方言集》。

1790年，一个名叫小田屋的遇难船员，在圣彼得堡居留了一年以后返回日本，于是便诞生了一部12卷本的有关俄国的书，书名是《小木筏北海漂流记》。这部书由小田屋主述，其他遇难船员补充编纂而成。

这一部书的编写成功，标志着日本正式尝试搜集俄国情报的开始。不久，俄国人的一支远洋船队出现在白令海峡，当这支船队于1739年进入日本领水时才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日本人是从不放过哪怕是任何一个很小的学习机会的。

过了几年，待到日本人把上述小田屋等人的著述消化、吸收以后，便派出一批日本渔民去开发阿拉斯加海湾群岛。这些渔人发回来的报告说，那里的那些岛屿无人居住，也无法居住，而且由于常年下雨，某些岛上洪水成灾。另外，这些岛上任何农作物和蔬菜都无法生长，并由此而形成了一股热气流。

---

(1)指我国的台湾省。——译者

第四章　秘密会党与情报机构的合作

"为强化帝国法律之根基，需在世界范围内寻求知识"。

——引自1868年《五项宣言》

十九世纪初期，日本与英国、俄国的几次海上冲突，暴露了日本海军舰队的弱点，并显露了政府在军事上缺乏组织能力。各种情况表明，一个象俄国这样的大国，一旦发动进攻，完全可以把日本置于它的掌握之中。

与此同时，留学荷兰的日本学生组织也不时地向国内报告，介绍西方国家在军事上的发展情况，并极力要求征夷大将军府加强其防御力量。日本在北方的防御力量，特别是在北海道的防御措施，由于惧怕俄国人的入侵，已得到了加强。这种担心的产生，来源于日本的闭关锁国和在国际上缺乏同盟者。这一切都推动着日本很快地从封建主义的社会中走了出来。而西方国家也愈来愈表现得迫不及待，并对日本继续在国际贸易方面关紧大门，不时地施加压力。换句话说，如果日本不再让步的话，他们即将诉诸武力。一开始，美国和俄国企图用和平方式同日本建立贸易关系。他们的表示被很有礼貌地拒绝了。不久，征夷大将军府又决定，所有进入日本口岸的外国船只，一律用武装力量驱逐出其海域。

甚至日本的"宠儿"荷兰人也无法从中调停。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53年。在这一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以4艘战斗舰为前驱，驶入东京湾。他随身带有美国总统的一封信函，信中建议两国开展贸易关系。同年，一艘俄国战舰，带有与美国同样的使命开进长崎港。这一次他们没有受到斩钉截铁的拒绝，但却迟迟未得答复。当佩里准将再次率领更多的军队来到日本时，日本政府才不得不违心地与其签订了通商条约。

所有这些条款均于1859年才生效。

在这种形势下，征夷大将军府的垮台只是个时间问题。条约刚签订完毕，便有人谴责征夷大将军在西方人的要求面前过于软弱。一股排外的浪潮在政界和军界掀了起来。这一运动中的极端分子，极力主张对西方发动一次先发制人的战争；然而温和派尽管被迫放弃了让外国军队驻札在各港口的想法，但仍然主张先得到西方人所以强大的秘密。最后还是好奇心占了上风，把尊严放在了第二位，从而废除了政府原来定下的所有法令。其结果，导致了流血和牺牲。最后就是连年的内战。唯一的解决办法，似乎是只能由皇室人员来出面干预。

这时已经到了明治年间。1867年由睦仁接替了征夷大将军的职务，号称明治天皇。这个称号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日本的象征。但当时尚处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日本现代化的起步，意味着议会政府的开始。

要了解日本情报事业的发展，就必须了解那个时代日本政治上的风云变幻。自1860年开始，日本的情报网即在国内社会的各领域中建立起来。在军队里，在航海部门，在教育领域以及在工业界，情报工作却十分活跃。在此之前，世界

上尚未有一个国家建立过如此广泛的情报体系。日本的情报网对任何情况都不放过，而且对任何事都绝不掉以轻心。现在经常听到有人这样说：十九世纪的日本所搜集的情报远远超过了它所能消化的份量，而且大部分都是没有价值的东西。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日本对外情报的工作方针是：要把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杂乱无章，似乎没有价值的东西详加分类，然后进行鉴别，从而达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为了装备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和掌握先进的航海技术，日本同样也需要发展其它有关科学。

仇外浪潮并非纯属偏激。西方国家和俄国也应负一部分责任。美国和俄国为了签订通商条约，不惜用武力来威胁，因此受害者也便自然表现出对帝国主义未来侵略的恐惧。

这种威胁来自许多国家：大不列颠、美利坚合众国，俄国和法国。事实上，如果日本不表现出其强烈的独立自主愿望和不进行坚决抵抗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它也会象印度支那各国和印度那样沦为殖民地了。

1862年，英国人理查森在去东海道的路上被暗杀，引起了英国人对鹿儿岛的炮击和战火。1864年，美、英、荷和法国的联合舰队进攻下关，并登陆拆毁了岸上的炮台。

日本同欧洲第一次真正的官方联系，是在1862年。那一年日本派出了一个35人的代表团前往欧洲列国的首都进行访问，5年以后，有一批留学生被派往国外学习。表面上这些人是去求学，实际上是刺探外交情报。当时日本对于来自俄国的情报给予极大的重视。1855年日俄签订“下田条约”，该条约规定，日俄共同使用千岛群岛。20年后，库页岛变成俄国的领土，而千岛群岛又复归于日本。当时日本帝国的格言是：“国家的繁荣要依靠军事力量”。江户随后改名为东京，

接着，皇帝便离开京都迁入新京。

日本人决心要加强其军事力量。重点是海军，海军要以不列颠帝国的“皇家舰队”为样板。发展陆军则以德国为榜样。因此，在1860年到1870年仅10年间他们便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他们开办了兵工厂，创建了造船厂，重建了许多学校。这些做法的目的就是要在技术上赶上西方。尤其对于航海学校，特予优先发展。同时又创办了第一所外语中心，以培养派往国外的间谍。这一革命发生在1865至1885年的20年内，其效率之高和措施之彻底，在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改革可以与其相比。一切都进行了详尽的规划，以便按照指令有条不紊地进行。例如，1872年一个在伦敦执行任务的情报人员写道：“要从欧洲国家汲取的最大教训便是，他们的军火工厂没有充分地以国家目标为中心来进行。一些公司把它们各自的利益放在国家的要求之上。此外，由于生产任务的分配不合理，以致使得生产品的速度不快。在英国，一件需100或200个劳动力来完成的工作，倘在我们国家，只需30或60个劳动力便可完成”。

以上述报告为思想基础，日本政府极力促使以军事合同的方式来处理工业体系的生产，同时，还积极着手进行国家安全工作。电报、电话线路由国家垄断。明治时期的国家领导，为了发展先进的教育事业，于1868年颁发了著名的《五项宣言》，该宣言有一条称：“为强化帝国法律之根基，需在世界范围内寻求知识”。

为此，政府拨出大量经费向欧洲派遣留学生。1871年，由帝国首相率领的一个重要代表团，前往美国和欧洲访问。留学生中有54人充当了这个代表团的情报员。

东方的间谍在手段上从来都比西方间谍直接得多。但对

诸如拉拢、腐蚀和一些非法手段，他们却从不重复使用。

在军事情报方面，日本选中了麦克尔少校当他们的教官。此人1885年在东京领导着一个外交使团执行任务。他原是普鲁士军队参谋部的军官海尔曼茨·逢·默尔特克伯爵的学生。麦克尔在日本一直居留到1894年。作为一名情报教官，他的价值可以在下面这件事上看出：1904年鸭绿江战斗之后，日本的儿玉源太郎将军首先给他发去了电报，声称，此次战斗的胜利是由于他的出色训练的结果。

西方的间谍工作，在搜集某些情报时，常常表现得迫不及待。日本人却有这种不耐心的情绪，他们认为这种情绪常常会导致工作的失败。同时，有耐心可以少花许多经费。日本情报工作的格言是“依靠爱国心而不依靠出钱收买”。这种作为间谍动力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同时代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情报工作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英国人和美国人在他们的间谍人员被捕后，历来都是矢口否认，只有在不可推托的铁证面前才勉强承认。与此相反，每当日本人的间谍被捕以后，他们总是提出强烈抗议。同西方人比较起来，日本的间谍人员在这个民族的心目中是光荣的，甚至是高尚的。为自己国家搜集情报，其荣耀程度可以同参加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并驾齐驱。日本的一名情报人员，其荣誉感比当一名现役军人更高。因为他们知道，战斗的胜利来自准确的情报。

日本人能不用招募办法而把这种特权的身份授予他们的间谍人员。与此同时，还创建了一些秘密会党。其成员要宣誓为民族的荣誉而搜集情报。这些情报被作为一种虔诚的爱国主义教青而反复地向青年人灌输。在此以前，日本青年的视野从来没有越出过自己国家的国境。同时也由于这种政策

的执行，使得外务省、陆军、海军等部门得到的情报，其费用十分低廉，因为他们这些间谍人员工作几乎不计报酬，当然，为执行某种特殊任务所需的津贴除外。而这些津贴又大都来自居住富有国家侨民自动捐助，因此，国家完全不必为动用很大的财政开支而担心。这种秘密会党的情报网规模相当之大，陆军为其提供一部份经费，但经济来源的绝大部份是由这些秘密会党的领导人和创建者承担。他们所花经费的数目，与俄国和德国向自己的特务机关提供的相比，那是微乎其微的。

第一个特务网以“玄洋社”这个名字作掩护。“玄洋社”又叫“黑洋社”，于1881年由平冈幸太郎创建。他是“萨木拉依”中的巨富，满洲矿藏的开发者。一开始，玄洋社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九州地区，似乎在那里享有很高的威望。其宗旨是：“为皇室争光，尊崇帝国，使平民的权利受到尊重。”但在这些道德原则下面，却掩盖着它的真正目的，即：获取关于中国(含满洲)、韩国等地的情报，并用以对其实行扩张。对俄国也采取同样方针。

玄洋社和当时的间谍学校一样，它也是一个恐怖组织。1892年，松冈洋右内阁向玄洋社的领导人宣称，政府将执行一个强硬的外交政策。于是，玄洋社便作为这个政策的支持者，立即掀起了一个对付所有反政府派的恐怖运动。然而反对派在议会中赢得了席位。玄洋社赢得了一些新的门徒。随之，新的社团纷纷成立。1898年这些社团举行了一次大会，商讨共同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该组织名为“东亚文化联盟会社”。不久，这个会社又在中国的上海成立了一个“东文学社”。东文学社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培训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的人员。

1872年义务教育的实行，又给这些秘密社团提供了一张王牌，因为此后涌现出的大批大学生对于到国外留学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这些社团的秘密计划，便是设法渗透到中国当时存在的包括某些敌视日本的各秘密会党中去。1882年，玄洋社的一个名叫外山睦的头头，一次即向中国派出了100名这样的"学生"。这一措施非常有效，几年以后，他们就可以向国内提供军事情报了。

在1878至1882年间，有两个因素加快了日本秘密会党的建立速度。一是日军参谋本部的建立使日本有了一个军事情报机构。二是此后3年又诞生了一个军事警察机构，它的名字叫"宪兵队"。这一机构完全不同于世界其它国家的军事警察。它倒有点象英国的反间谍处（MIS）和法国的"本土警戒局"(.DS.T)的混合体。军队的情报机关同宪兵队有联系，但这种宪兵队的组织，后来变得比军队的情报机关要厉害得多。

为了更好地理解日本人对中国秘密会党的渗透，最好读读《中国的三合会》这本书[1]。一个名叫平野天峰的文人兼间谍，他在中国旅行期间，和这些中国的革命者进行了接触，向他们学习了宗教礼仪、秘密联络暗号和这些人活动的内容。他把这些东西写成一本书，但被压了很久不准出版，因为这是获取中国情报的唯一来源。平野天峰每天不间断地

(1)这本书译者没有见到，也未见中文本，因此后文提到的三合会秘密联络的暗语，因未见中文原文，只能意译，其中的一些名词也只能音译，而作者使用的又非中国正规的汉语拚音文字，因此肯定会有错的。"三合会"又名"天地会"、"三点会"，因"拜天为父，拜地为母"，故用"天地会"之名较普遍。其宗旨为"反清复明"。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故对内又称"洪门"。其支派有"小刀会"、"哥老会"等。相传建立于1674年。——译者

坚持到中国的酒楼茶馆去观察，终于了解了三合会的礼仪和联络暗号。平野天峰还发现，这些秘密会党的宗旨被一些极端分子修正了，因为这些人的目的是阶级斗争，因此他们的口号不再是"反清复明"而变成"劫富济贫"了。

三合会的秘密联络暗号，是用一套摆在盘子上的茶壶和茶碗来进行的。平野天峰把茶馆里每个茶盘上的茶碗和茶壶的位置都划下示意图，然后等待进来的茶客，看他们怎样移动其位置。然后他便在示意图上注明茶壶、茶碗如何摆法代表着什么意义，茶客的一些手势和动作又代表着什么意义。例如：一个装满茶水的茶碗，如果同茶壶平行摆着，那意思就是："……必需解救我们的一个人，现在他正处于危险之中……"如果这位茶客能给此人以帮助，他便把这碗茶水喝光，如果不能，他需把茶碗里的茶倒掉，再用另一只碗由自己倒茶。

如果这位茶客确实是三合会的人，他还必须唸几句诗。四只茶碗、一把茶壶代表要求帮助，当此人不能给予帮助时，他要把碗和壶的位置变动一下，然后才能开始喝茶。如果他想过问这件事，他还必须唸下面几句诗：

韩朋出生在山阴，
谁给韩福当靠山？
程田意欲报仇恨，
为何张括泪不干？

很明显，玄洋社的头头们已经操纵了中国秘密会党的首领，这只要一观察就可以看得出。十九世纪末期，这些中国秘密会党的头头们，只要在政治上遭到挫折，他们便会跑到日本的东京去住，并在那里同当地的秘密会党的成员接触，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玄洋社内有影

响的成员，在日本和中国都开设有妓院，以此为掩护来蒙蔽三合会的各级头头。这些花街柳巷里的妓院都起有很别致的名字，如“天趣馆”等。

在这些烟花风流之乡，他们能让中国会党的领袖人物为了把大把大把的金钱花在女人和美酒上，而不得不动用这些会党的公积金。从中得到好处的便是玄洋社。

这些妓院大多开设在汉口、上海和天津。他们获取情报的手段一般是威胁或收买。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有资格的高级妓女向她们的嫖客强行敲榨。日本人开设的妓院远比中国妓院要高级。其陈设之华丽足以使嫖客的性欲达到反常的地步。这样，一方面满足了高级嫖客的要求，同时也大大方便了情报的获取。用这种方式，日本人取得了数量相当可观的中国和外国的情报。这些情报对1894年中日战争中日本人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远东现代史学家琼·切斯诺，曾经提到过一位名叫唐才尚（音译）的中国会党的头头，此人负责会党的财务工作，切斯诺透露了这人怎样从一位新加坡富商那里弄到一笔30万两白银的巨款，用以购买武器来支持长江流域的起义行动，他写道：“此人把这笔钱的大部分都花在在上海嫖妓女上，从而使计划中的起义未能实现。”而剩下的那些银子，则在日本人的监督下交给了一个妓院。

大量材料表明，在当时日本对中国的战争中，玄洋社在情报获取上，对日本的胜利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然而，日本的情报并不仅仅从那些使人刺激的、带着异国情调的妓院中获取，而且有时也从敌对的情况下，通过艰苦的努力去获取。在外国，情况就是这样。在那里，一个日本特务组织，为获取一些地形地志情报，整整经历了一个严

寒的冬季。玄洋社的领导人牛田良平，甚至还为此组织了一次更为艰难的远征。他向外国派出了15名精干的间谍。他们都是“天佑教”的教徒。“天佑教”意思是“上天保佑被压迫者的教会”。他们受命同外国的一个中间性质的教会组织成员接触，该组织名叫“东学党”，其宗旨是反对任何形式的西方文化。由于这个教会曾得到天佑教的大力支持，以致使得外国当局曾向东京提出过严重抗议。这一事件为后来日本对外国的干涉伏下了一条隐线。

玄洋社和它的成员们并不满足于窃取外国的情报，他们的目的在于利用“东学党”的会众为工具制造动乱，以此来削弱外国当局的统治力量。

玄洋社还向东学党授意，制造了许多爆炸和暗杀事件。但他们的主要罪行则是在1895年暗杀了韩国的明王后。她是韩国的一位下台的老领导人郑元勋的儿媳，明王后被暗杀后，郑元勋在日本人扶掖下又重新上台。这一暗杀事件是由玄洋社策动，由当时在汉城执行公务的一位日本阁员具体指挥的。

这是自丰田秀吉去世后，正式特务组织第一次出面进行的旨在征服韩国的尝试。军方的参谋本部对这次行动和它的情报工作极为赞赏。自此以后，参谋本部便把特务组织的建立同它的军事装备一样，放在军事建设的优先地位。在整整这一世纪中，全世界没有任何一支军队掌握有一个组织形式如此多样的间谍机构，也没有任何一支军队象日本那样对它寄予如此大的希望。

第五章　明石上校和黑龙会

"'阿穆尔河'按中国方块字的含义叫'爱之河'(流经满洲的北部边界地区)，但它同时也叫'黑龙江'。'黑龙会'日语叫'考苦流卞依'，或者叫'爱之河会'。人们之所以起这样一个名字，正是为了标明它的宗旨，即把住在满洲的俄国人驱逐到'爱之河'的彼岸去。"

——马尔科姆·D·肯尼迪：《日本的一段历史》

上面这段题铭很简短地概括了"黑龙会"这个名字的来源。黑龙会成立于1901年，是玄洋社的一个分支。这个组织以"黑龙会"扬名于日本本土以外的列国，所以本书中一直沿用这个名称。

黑龙会把玄洋社所从事的一部分工作接到自己手中，这看来似乎有些奇怪。玄洋社这个强大组织的领袖们竟然把自己计划中的一部分工作交给一个新成立的组织，那答案便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玄洋社的领袖们几乎"过分地"功成名就了。他们的活动渗透到世界各地。然而在西方，他们却没有为日本留下一个好的形象。暗杀韩国王后，以及他们所执行的恐怖主义，到后来反被他们的对手所利用。玄洋社的两位

头面人物富山睦和内田良平，对此早已有所感觉。内田良平曾出访过俄国，并对俄国领导人的政策进行过研究。他认为，在亚洲大陆上进行扩张的唯一的，也是真正的威胁是俄国，有鉴于此，他才创建了黑龙会。随之，黑龙会成了所有会党中最强大、最富活动能力的一个组织。

尽管富山睦不属于这个组织，但他却对它全力支持，并积极地在战略上为其出谋划策。此人性格古怪而孤僻。他身上有一半是政治家的气质，而另一半则带有神秘主义色彩。他还是一个禁欲主义者，喜欢一个人沉思默想。尽管他在表面上看来清心寡欲，不喜欢在公众场合出头露面，但他却结识了许多最重要的军政大员。由于他的影响，黑龙会才得以继续玄洋社的事业，并把主要注意力放到俄国和满洲方面。该会的目标同"爱之河会"的名字是一致的。富山睦到他1944年去世为止，一直是这个组织的顾问。

黑龙会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成立，并且长期在绝密的情况下进行活动和发展的，但它的活动一旦暴露，那就只能以公开面目出现了。在一开始时，它并不想吸收玄洋社中那些令人感到不便的恐怖分子。

当时的一些青年人被一股爱国热潮所推动，同时又被这些社团的冒险职业所吸引，竞相加入黑龙会。然而，在这些勇士中，有一些人实际上是些没有职业的浪人，在帝国复兴以后，他们就根本无事可做了。

黑龙会在创立之初的几年中，其成员颇有些慷慨激昂之士，但到了后来，充斥其中的，则有很多人是流氓或强盗。必须承认，这些人原先并不是该组织的成员，并且又大都热衷于搞犯罪活动，参加该组织后都曾为自己的国家认真地工作过。

事实上，在这些特务中各阶层人员都有，从职业的分类看，他们中有内阁阁员、专业特务、歌唱家，乃至到被雇佣的杀手。到1944年，其人数已达1万人。

在初期，其活动目标主要集中在搜集（中国）满洲方面的情报。随后，到了1930年，他们的活动范围便扩大到韩国、中国、马来西亚、菲律宾、香港、新加坡、印度、阿富汗、埃塞俄比亚、土耳其、摩洛哥、美国，以及南美诸国。

在支持黑龙会的第一批人们当中，有一个名叫广田弘毅的，他后来成了日本的首相。他以富山睦为榜样，一直在幕后活动。

广田弘毅原本是一个石匠的儿子，生于1878年。于1906年开始从事外交工作。在担任首相之前，他曾在世界许多地方任公职，其中包括在华盛顿。他认为世界可以被划分为3个有影响的地区：美洲、欧洲和日本。

当时日本试图效法西方列强。这些西方国家当时已经在中国、印度支那、印度，以及安的列斯海[1]等地开始了殖民主义活动。俄国人也在贪婪地想把东亚变成他们的殖民地。1900年以前，日本人完全有理由认为俄国人的某些计划不仅与日本人本身的长期利益背道而驰，而且还威胁着他们的安全。十九世纪末，中国和俄国是日本的两个潜在敌人。当时，德国人竭力利用俄国要把东亚变成它的殖民地的说法，使日本人感到恐慌，并极力怂恿日本把军事间谍派往俄国。麦克尔少校的任务是同日本人开个玩笑，当然，他同时也成功地在日本人和俄国人之间制造了不和。一些日本学生被派往德国，深入研究著名间谍威廉·斯蒂贝尔的情报原则。

（1）安的列斯海即现在的加勒比海。——译者

此人曾在欧洲许多国家的首都，利用当地的动乱分子制造麻烦。

1891年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筑，标志着俄国面向东方的政策又前进了一步。日本在1894年到1895年的日中战争中胜利以后，俄国人在法国和德国的支持下，在辽东半岛上取得了一块仅几英亩的地盘。1896年，库鲁珀特金将军已意识到俄国人梦想扩张的危险性，他曾经写道："我曾对威特讲过，我们的沙皇头脑中有着宏伟的计划：夺取满洲，吞并韩国，他甚至还梦想，由他来托管西藏。"

尽管一些有见地的优秀将军们不断地予以忠告，但俄国还是逐步地把自己的计划向外界显示出来。英国人把他们全部的同情都投向日本，因为日本的战舰是仿照英国建造的。另外，这两个国家均属岛国亦不无原因。日本政府的政策也得到了它驻伦敦大使林正伯爵的支持，此人是一位机敏的外交家，他是1902年签订的英日同盟条约的倡导者。

一年以前，黑龙会即把它取得的第一批情报中的一份调查报告送到陆军部。在决定了把俄国作为他们情报工作的最主要对象以后，黑龙会的人便提出，凡是向这个国家派出的任何一名武官，都必须经过他们的同意。但在这个问题上，陆军部与外务省之间，似乎存在着分歧。内田良平是一个矢志不移的人。他对自己想干的工作，总是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这次他对陆军部的抵制也非常固执。他坚决主张让石川吾一去帮助军方。此人在中日冲突之前，曾在中国当过间谍，他在被中国人逮捕之前，曾向国内提供过许多情报，这些情报保证了对中国进攻的胜利。

内田良平认为，他的那些情报，对于军方制定任何行动计划都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但对这一切能否正确地做出评价

和付诸行动，就要看是否让他来选择日本驻俄国的武官。他推荐了明石上校。明石在军事上，可以当一名很好的顾问，并且是一个战术专家。1904年，明石以巡回大使的身份被派往欧洲。这次，内田良平顶住了陆军部的反对意见。他认为，派出一名巡回武官，要比派出一名常驻圣彼得堡的情报官好得多。因为这样做，他可以同住在俄国以外的俄国间谍进行接触。因此，他认为明石上校可以同居住在法国、瑞典、德国和瑞士等国的俄国革命者进行联络。

这就意味着，明石开始了一种新的职业，这一职业与其它各种职业都不相同，即：既受雇于陆军部，同时又拿黑龙会的津贴。他的任务要求他，拿出钱来付给俄国的某些革命者，以换取俄国间谍机关和俄国武装力量内部的情报。在许多著述中，都认为明石曾和一个名叫列夫诺·阿泽夫的双重间谍有过联系。此人替“奥赫拉那”即沙皇的秘密警察做事，同时也替一部分俄国革命党人工作。但后来阿泽夫完全被收买了，他不仅参与谋杀革命党人，同时还向“奥赫拉那”出卖过和他在一起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

阿泽夫还有一种特殊的本领，即他非常善于物色某一位可能被“买过来”的间谍。比如他和西德尼·赖利的联系就是一例。赖利也是一个间谍，但比起阿泽夫来，他更加堕落。此人是个三重间谍，是个不可多得的人物。

赖利于1874年出生在俄国（他原名叫西格蒙德·乔治维奇·罗森布拉姆，是他的俄国母亲和维也那的一位以色列医生非法结合的后代）。赖利这个名字，是他加入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后使用的。他说谎的本领可以说能做到天衣无缝，因此，人们平时很难辨别他的哪句话是谎话，哪句话是真话。由于有一次被人抓住了尾巴，他便在1900年以前加入了英国

秘密情报局。他替别家当间谍则是1917年以后。实际上，这个赖利很可能1890年开始，就已是一个单线联系的特务了，那时他可能就已为英国情报局和俄国的一个特务机关同时工作。

赖利在圣彼得堡认识了明石。非常突然，不知为什么他突然被调到中国的旅顺口去了。旅顺口是日本间谍活动十分频繁的一个点。他在那里创建了一个名叫“格伦伯格——赖利”的建筑木材公司，同时还身兼一个名叫“东亚商行”的经理。这一时期，他的情绪非常不好，因为他的太太整日沉溺于酗酒之中，已变成他的一个负担。于是他就接受了明石的条件，答应为他工作。

赖利同时也向日本提供俄国国防方面的详尽情报和旅顺口以及其它港口的海军军备情况。明石上校知道此人暂时需要钱用，同时还想从个人问题中摆脱出来，因此，明石经过一番考虑后决定冒险向他提出了情报要求。在此之前他深知此人是替英国人搞情报的，现在又成了日本人的同事。但自那时起，俄国人可能对他产生了某些怀疑，认为他可能是个间谍。因为赖利发现，他身边的一个人是替俄国反间谍机关工作的。因此，他立即做出决定，马上把他的太太送往伦敦，而自己则立即往日本去领取他的特务津贴去了。

象这样出钱来收买一个外国间谍，对日本人来说是很少见的。然而赖利却无意与英国秘密情报局或俄国的间谍机关一刀两断。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没有任何肯定的证据证明他已叛变。因此，他也不应给人产生一种印象，以为他是为了逃避“奥赫拉那”的惩罚而躲到日本去的。为此，他制造爱情假象，以混淆视听……。当时，他对结识的一个女人大献殷勤，这个女人便表示出愿同他一起去日本旅游的意思。赖利

就不失时机地当晚和她同居了。那晚上，他表现得既富有激情，又令人信服，以致轻而易举地便使这个女人同意第二天去日本。翌晨，二人双双逃离旅顺。

在东京，赖利向日本人提供了一大批关于俄国的情报。然而在其它方面，他的行动仍然诡秘异常。日本人对于用慷慨解囊换来的这些情报似乎相当满意，但他们却从来没有给过他充分的信任。他们知道，此人一方面为英国秘密情报局工作，同时也并未割断同俄国的联系。1902年底，赖利在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报告中写道："满洲地区算是无望了。中国成为列强瓜分的掌中物，只是个时间问题。中国人实际上等于没有什么情报机构。但我要向你们说明的是，在这块被忽略的真空地带，不久就会诞生出更为危险的情报机构。今天，它还是子宫里的一颗精子，明天它会怎样呢？明天可能就会成为用自己的翅膀飞起来的孩子！"

赖利这样说，是在影射日本的情报机构吗？在他替日本工作期间，为使自己不致在日俄战争之前同俄国的关系搞僵，他向伦敦方面请求休假。他开始感到害怕了。于是便借口离开了和他一同跑到日本来的那个女人。关于那个女人的国藉和真正的身份，从来人们就没有明确过，尽管赖利声称她是个英国人，名字叫安娜·卢克。

在此几年以前，还有一个名叫伊迪丝·卡鲁的女人，被东京的英国领事裁判庭判处死刑，罪名是下毒谋害她丈夫的一个同事。这一事件，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件错案，因为当时曾流传着关于一位"蒙着头巾，名叫安娜·卢克的女人"的许多谣传，但这些谣传非常离奇，又自相矛盾。

据说这个女人后来又同沃尔特·卡鲁有来往，而且在她死前的第12天，还有人在横滨看见过她。后来卡鲁太太因为日

本皇后的去世而受到日本皇帝的特赦。英国政府没有征求驻横滨领事的意见，便把她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因此，关于安娜·卢克，没有任何人知道她的下落。对于能提供她的线索者，将悬赏500英镑，但却始终没有人知道她的消息。难道她就是和赖利跑到日本去的那个女人吗？当然，如果是的话，她拿的肯定是假护照。

赖利也突然失踪了。但几个月以后，他却出现在中国的陕西，当时他住在一座喇嘛庙里。日俄冲突之后，他又继续同英国人和俄国人接上了关系。

在这一时期，黑龙会的势力一直渗透到西伯利亚和满洲。并且由黑龙会出面，在符拉迪沃斯托克[1]开办了一所柔术学校，但这时却没有能使赖利和黑龙会再度合作的条件了，因为赖利已不可能以一个情报人员的身份出现了。

在这段时间里，黑龙会还在东京资助了一个专门研究俄国的团体，那是在1903年。这时候，日本的特务机关已经发展到最完善、最有效的地步。这一形势为过去从来所未有。

(1)即中文名字海参崴。——译者

第六章 日俄战争

1904年2月8日，日俄战争爆发。在现代史上，没有任何一支陆军，也没有任何一支海军，为了进行一次战争，在情报工作方面，事先准备得如此出色。可以说，这是一次经过最周密的计划和最密切的配合的一次战争。我认为这样评价并不过份。

当时驻日武官马尔科姆·D·肯尼迪上尉曾侦察到"日本这次对俄战争的绝密的战略企图和出色的战术行动计划，以及一些旨在散布假情报以迷惑敌人的办法。除这些企图、计划和办法之外，再加上他们的情报准备工作，就使得日本人几乎象恶魔一样，把他们敌人的情况和行动都掌握在手中，从而使他们取得了胜利。"

伊恩·哈密尔顿将军曾以军事观察员的身份，随日本第1集团军作战。他证明了肯尼迪上尉叙述的正确，尤其日本在反情报方面更是如此。他写道："日本人对俄国的弱点，了解得远比任何一位美国的或是欧洲的军事观察员要深刻得多。英国人认为俄国最终将占领满洲，而日本人在深刻地估计了占领和不可能占领的两种可能后，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接受了自己专家们的建议，而盎格鲁——撒克逊人却在'专家'二字前气得发狂。"

哈密尔顿将军同日本人在一起过了几周以后，日本人交给他一份关于俄国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每支部队部署的报告。"这份文件讲的是1903年10月份的情况，还有一个附件，

详细说明了在上述日期至1904年1月份这段时间内，俄国军队的人数、武器装备，以及补充到边境来的军马数量等情况。使我吃惊的，不仅是这份报告中附有简直是数不清的图表，而且我看到俄国人投入了那么多的兵力。据那份报告估计，俄国人集中了180个营的步兵，再加上骑兵、炮兵和工兵，总兵力竟达20万人。”

哈密尔顿不久发现，日本人送给他的这份材料竟是假的，他并且还发现，当时日本人对于俄国人1904年5月1日以前投入的兵力掌握得一清二楚，即俄国全部的机动部队总人数只不过8万人。他们不但知道库鲁珀特金将军的战略后备队的兵力，他们并且还判断出，这位将军的兵力达不到沿鸭绿江设防的能力，因为要那样则需有3万名俄国士兵，而运送这些士兵需3000辆中国式的四轮大马车，这些车辆当时尚未征集到。

语言是日本人的又一张王牌。因为日本文字有三种书写体系，虽是表达同一事件，其写法可不相同。再加上他们又使用的是秘码书写，因此，不用费多少心思即可以想象得出，他们的秘密文件传递是非常容易的，即使落在敌人手中，也绝对不会被破译。其实，日本人也无需对文件加以密写，因为在10万名俄国人中才有一名能够勉强读懂日本文字，至于对日本文字的各种写法都能通读的人，则只占总人数的1/75万。当然，住在满洲的某些中国人除外。

哈密尔顿将军还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该文字有双重含义的绝妙例子。他对日本人的艺妓印象非常深刻。这种人大都在旅馆里充当女侍者的角色。“这里全是清一色的漂亮女侍者。如果那天的晚会是由其中的某一位来主持的话，她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把晚会搞得十分出色……这些姑娘都是些非常随和

可亲的人，她们十分知趣，且又落落大方、对答如流。接连两天晚上，在晚饭时，我都向一位年轻的女子表示亲热。她回答我说，她的名字叫‘昌尼小姐’。在向她告别时，我对她说，我对她的名字非常欣赏。而她则对我说，如果按表意文字，她的名字是“英联邦自治领”的意思，并表示，从此以后，她的名字便只取后者的意义。我带着十分好奇的心情，请教了一位日本的大学者。他向我讲解了日本文字一字双义的学问。”

黑龙会的重要作用。从多方面，包括从日本人自己方面，都得到了证实。在内田良平的影响下，这个组织不断地策动一些小股的中国散兵游勇对俄国人进行骚扰。同时，黑龙会里有些人自愿出面替日本军队当翻译。

他们在米哈尔顿将军所指出的搞虚伪情报的活动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当明石上校在东京时，他从来没有和黑龙会的某些领导人断绝过关系。他在同外国人建立关系上，表明了出色的才能。例如同赖利的关系。他和此人一直相处得很好。再如他同芬兰的革命者康尼·齐利亚克斯的关系，以及同阿卜杜勒·拉希德·易卜拉欣的关系。易卜拉欣是鞑靼人，俄国政府有关穆斯林的问题，都向他咨询。无论这些国外的关系在日俄战争时是否帮了他的忙，但都对他以后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好处。易卜拉欣是明石上校同穆斯林人接触中重要的环节。

明石上校以其在世界上广交朋友和他对世界事物博闻多见而著称。因此，在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他成了日本在欧洲情报机构的最高领导人。当时他住在斯德哥尔摩。在那里，他不遗余力地在被流放的俄国革命党人和芬兰

革命者中间进行挑拨离间。日俄战争开始后仅几天，他就和当地的某些流放者开了一次秘密会议，鼓动他们在俄国工业中心城市组织暴乱，并答应向他们提供武器和弹药。就在那里，他认识了康尼·齐利亚克斯。此人是一个狂热的爱国者，强烈地希望看到俄罗斯帝国被推翻。很明显，这两个人是受到瑞典和英国新会党人支持的。还有一个人，名叫塞谬尔·霍布森。此人在1903年即已参与在里加的军火贩卖活动。一些迹象表明，英国官方对这些事是闭上眼睛假装不知的。其原因就是，按明石的说法，这些事是大英帝国乐于帮助日本工作的一部分。

明石仍然到处活动。他同日本驻伦敦武官宇都宫太郎上校合作搞情报活动，同时还指派两名情报人员利用合法身份，不停地来往穿梭于斯德哥尔摩和伊尔库斯克之间。明石的情报网已经伸到巴黎、苏黎世、日内瓦、哥本哈根、罗马、里斯本和华沙。

当外务省和陆军部得知明石在外面已经和那些革命者混在一起，并且确确实实地在出钱支持他们时，便对他感到不信任，感到担心。要使外务省和陆军部的领导者们相信那些地方发生某些动乱对日本是有好处的，并争取他们在经济上给予帮助，确实需要明石拿出坚韧不拔的精神来。他们的担心果然被消除了。明石对那些革命者进行经济支援，其用心是极其狡诈的。人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明石对那些极端分子是不信任的，但他竟然能够和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和那些芬兰革命党人达成一项协议。日本外务省和陆军部的档案表明，作为一名军人，他在争取日本驻斯德哥尔摩公使的支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从而得到了所有人的尊敬。他说明公使回到东京去游说为他争取经费。他以芬兰人制造的骚乱

为例子来证明他要钱的正确性。他说，如果这些骚乱蔓延起来的话，那么俄国的沙皇分子就可能提前向日本提出和平条件，如果出现了这种形势，那对日本将是十分有利的。但是，日本人不想把这个打算交给那些欧洲的革命人士去完成。因此，东京对他提的那些见解，很有那么一段时间表现得犹豫不决。明石提出要100万日元，政府却只答应给两万，还要分两次付给。然而他最终还是争取到了100万日元的款子。历史上有几个间谍能以如此显赫的业绩而自豪？

黑龙会的成员曾对俄国人在满洲和韩国的活动情况提供过非常宝贵的情报。他们的做法是，把他们的人混入当时在满洲的军阀部队，鼓动对俄国进行破坏活动。当时满洲部队的首领是张作霖元帅。

黑龙会的人，没有一个人曾被逮捕过。当初，他们在北海道曾受过非常全面的间谍训练。其中有一个名叫“浪龙”的会员，曾以摄影爱好者的身份掩护去符拉迪沃斯托克旅游，以便了解哈巴罗夫斯克和比罗比詹的情况。这一旨在广泛搜集军事情报兼及其它情报的活动，每一细节都曾经过周密的研究。

每一个间谍都有自己的专业作掩护。他们每个人从事的专业特别纷繁，所调查的地域也特别广阔。其掩护职业有渔民、商人、教授、考古学家、学外语的学生，以及和尚等。为了对宗教进行研究并和住在俄国的穆斯林们交朋友，他们当中有些人还必须参加伊斯兰教。

在这方面，明石的格语是：“仅同穆斯林人接触是不够的，凡勤奋的军官都必须了解他们的教义，以便能够以尽善尽美的方式同他们交谈，而不致做出蠢事来。这一点，欧洲人是做不到的。”

在日俄战争以前的时期，日本人把从事间谍活动视为一件应尽的爱国主义义务。从没有人为此提出要求给予自己什么荣誉或奖赏。对日本人来说，情报工作，从各种意义上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

1903年，英国派驻日本第1集团军的专员文森特上尉，在韩国逗留了7个月。提到汉城时，他写道："这里是阴谋诡计的大本营"，在战争爆发以前，他已看到："日本人乘着商船和小帆船，已悄悄地溜进了各口岸。大袋子里装的都是枪支和军用物资。一些将军甚至化装成苦力，以便在此待机率领他们的军队去作战。"

在开战以前，日本间谍即以各种借口，打入韩国、满洲或俄国。

罗纳尔德·塞思指出：在日俄冲突期间，"在满洲里替俄国人干活的苦力，10个人中就有一个是日本间谍。有些贫苦的中国人，因为俄国人付给他们的工资太低而想补充一点经济收入，可以往往为了两个卢布就把一些情报卖给日本人。因此，日本人获得那些关于俄国人活动的情报，都是杂乱无章地凑起来的。"

日本的这种渗透战术，已被当时的观察家所证实。为了窥伺对方的秘密，俄国人和日本人都使用中国人的情报。日本人在抓住俄国派出的间谍时，只要他们答应以后替自己工作，便立即予以释放。日俄交火以后，日本人又联络了一大批还在为俄国人工作的中国人倒戈，转过来为自己工作。

在日俄战争之前的数年中，旨在对亚洲大陆执行扩张主义的日本，出现了许多秘密会党。在这些秘密会党和军方某些部门的国家主义的压力之下，同时还存在着一种政治态度比较温和的势力。这一势力主要存在于当时的政界人物之

中。日本政府在圣彼得堡就俄国人向满洲进军和韩国北部边境问题同俄国人谈判时，曾表现出和解的意向。1903年俄国人派兵占领了鸭绿江口。事实上，他们根本无意撤出于1902年就正式转归日本的满洲。1904年初，俄国又向远东加派了增援部队和战舰，于是1904年2月9日双方断绝了外交关系。当时伦敦的《泰晤士报》是这样报道的："日本的舰队以一种大无畏的英勇行动拉开了战幕。这一行动将在海军编年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2月8日夜间，日本的鱼雷艇在旅顺袭击了俄国的舰艇，并进行了一场十分灵活机动的战斗。结果是俄国的两艘战舰和一艘巡洋舰均遭重创。"

当时日本海军动用的是它们自己的情报机关，并没有同黑龙会有任何接触，也未同其它秘密会党发生联系。日本海军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得极富创造性。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一支海军可同它相匹敌。

日本舰队上的两名海军上尉秋吉正孝和镰田贤宗，在日俄两国冲突之前，便已混入那些自愿充当间谍的日本人中间进行间谍训练。他们隐瞒了真实的身份，紧张地学习俄文，以及接受有关俄国人日常生活方式的全面训练。在这期间，他们吃的是俄国饭，并详尽地学习了东正教的各种礼仪。镰田贤宗等人，和从前那些化装成苦力到韩国去作战的军官一样，也十分高兴地接受了去俄国的一个名叫派特金海运公司的几个办公室里充任一些不重要的秘书角色。

他们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尤其是在无法隐瞒其国籍的情况下，显得更为突出。不过，当时的欧洲人也并不太能分辨哪些是日本人，哪些是中国人，或亚洲其它国家的人，对他们来说，这些人都是东方人罢了。几年当中，他们搜集了大量的各方面情报，特别是海军情报。然后便把这些情报送

到驻圣彼得堡的日本大使馆。1904年9月，他们提交给日本驻俄海军武官一份关于罗热斯特文斯基海军中将所辖波罗的海舰队的情报，以及俄国舰队预定的调动日期等情报。

为了使自己的地位更加稳固，镰田贤宗决定要娶一个俄国老婆，他的另一个同事同意作他的证婚人。但在结婚前夕，他们被捕了。罪名是进行间谍活动。秘密警察在他们房间里没有搜出任何证据。两个人愤怒地否认强加给他们的罪名，并认为他们可能会得到释放的。“奥赫拉那”继续在镰田贤宗的未婚妻那儿进行调查，并找到了他们制造假身份的真凭实据。而两个日本人则认为，这是“奥赫拉那”制造的伪证，故意放在那个俄国女人那儿，以制造一个驱逐他们出境的借口。

实际上，充当镰田贤宗未婚妻的那个年轻的俄国女人，是“奥赫拉那”的一位领导人A·B·格拉西莫夫上校雇佣的一名精明能干的反间谍人员。使格拉西莫夫吃惊的是，那么多在俄国的日本人，都娶的是俄国老婆。这在正常情况下，比如日俄关系没有变得如此紧张之前，也本不足为奇。但俄国秘密警察接到来自海牙的一份报告，从中得知，日本驻圣彼得堡大使馆就是一个日本特务在俄国和其它国家搜集情报的传递点，于是才引起了俄国人的警惕。

格拉西莫夫上校的这位女间谍并不满足于使其未来的丈夫上当受骗，还进一步从镰田贤宗那里套出了他全部秘密。上面这个故事的俄文译本显然是把这件事进行了一些美化。可以肯定，作为一名有经验的间谍，镰田贤宗绝对不会让他的俄国未婚妻发现关于他自己工作的任何蛛丝马迹，同样更不可能让她替自己保存机密文件。

本来认为，作为秘密情报文件，如果用日文写可以保险不泄密，但是，冒着极大危险用电报发出去的第一批秘电却并

非如此。因受这种教训而学聪明了的，并非只有日本。

在日俄战争之前不久，俄国人已经能够破译日本的某些外交文电了。日本人发现了这一点后，便改换了秘码。上述那两名秘书之被捕，对日本来说，是意想不到的因祸得福。因为这件事提醒了日本海军当局，俄国人可能已能够破译他们的秘码了。这样，日本人便警惕起来，于是日本的舰队才能够成功地对俄国人进行了第一次奇袭。

镰田贤宗和秋吉正孝仅仅是日本人在俄国、荷兰、丹麦，和斯勘的纳维亚半岛上布置的12名高级间谍中的两个。自那以后，驻圣彼得堡的日本使馆，日本驻欧洲其它国家的使馆也一样，都改为把搜集到的情报，综合成一个情报资料摘要，然后再由使馆送往东京或柏林的日本使馆，因为柏林使馆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驻外使团。日本驻柏林使馆的海军武官是一个非常熟练的技术专家，他能够监视波罗的海和北海上所有的军事行动。日本人在所有欧洲和亚洲的重要港口，都派有他们的特务，而俄国人却正是利用这些港口向远东运输煤炭和粮食等补给品的。

还有一些日本情报官员，作为观光客，也经常在波罗的海海上航游。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是作为短期旅游者出现的，而另一些人则常期在欧洲从事谨慎而有效的间谍工作。镰田贤宗和秋吉正孝两人，如果不是“奥赫拉那”从海牙得到情报的话，肯定不会受到怀疑。

经过这样一番精心组织的大量间谍活动以后，日本人便开始逐步实践其战争初期的战略计划：首先他们在旅顺口袭击了俄国舰队。海军上将东乡平八郎的“蚊子”(1)在深夜，

(1)这里指的是日本的小鱼雷艇。——译者

猛烈地袭击了停泊在港湾内的俄国舰艇，使得“察列维奇”号，“列特维赞”号和“波尔塔瓦”号3艘舰艇爆炸起火。与此同时，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俄国舰队也遭到上村上将的猛烈攻击，他击沉了“茹列克”号，并把“诺维克”号逼向萨哈林岛的方向。

1904年10月，在北海上发生了一桩令人不可思议的事件。俄国舰队当时接到命令：经由波罗的海和地中海向远东进发。这支庞大的舰队由罗热斯特文斯基率领，他将与日本海军进行一次殊死的决战。当时，浓雾笼罩着舰队。当他的舰队快要达到陶格尔沙的时候，突然他发现自己的舰队周围出现了许多小船。

在这样一片不属于俄国人管辖的海域上，出现了这种情况，使他们感到惊恐异常。于是便把它们当成日本人的船支对其开了火，并且打沉了许多。不幸的是，那些小船却是英国人在海上打鱼的拖网渔船。

这一误会使俄国和它的欧洲邻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紧张状态。俄国人为自己辨护说，他们当时确信，那些船是日本的巡逻艇。但英国政府要求进一步做出解释，并要求赔偿损失。原来就很紧张的双边关系，这次几乎闹到破裂的地步。最后还是由一些国家的海军将领组成一个国际委员会，代表双方对此事进行调查。同年2月份，专家们作出了仲裁。这一裁断有利于英国，责成俄国人向英国政府赔偿6.5万英镑才算了事。

为什么俄国人要向这些渔民们开火呢？对这次误会唯一合乎情理的解释，似乎只有一条，可以说这是日本人经过精

(2)即库页岛。——译者

心策划的一次反情报斗争。

1904年10月24日，英国外交部秘书洛德·兰兹德文收到俄国代办送来的第一份解释文件，该文件试图代表俄国政府，对发生的事件作出解释。这位代办在文件中称，在英国，有日本的情报人员，那些人“是为了策划对波罗的海舰队的攻击。鉴于当时的环境，俄国舰队司令官发现在自己舰队周围有那么多船只而引起警觉，实非不正常现象。”

不久，俄国大使又宣称：“俄国舰队之所以有此反应，那是因为他们认为那些渔民是化了装的日本间谍，尽管那些人是在自己的捕渔范围之内，并且按照国际法的规定发出了信号。”在这个声明之后，接着又发表了一个更令人惊诧的声明：俄国人已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证明有两名日本特务已到达英国的赫尔，其时正是那些渔民们离港出海之前。

在整个日俄战争时期，日本海军的情报工作一直非常有效率。在奇袭旅顺口之前，海军上将东乡平八郎就已掌握了所有敌人舰艇位置的详细情报。

罗热斯特文斯基海军中将率领舰队继续他的远东之行，于1905年2月，赶上了由海军中将涅博加托夫率领的舰队。于是他们两个舰队合并，共40艘战舰，浩浩荡荡地向符拉迪沃斯托克进发。

海军上将东乡平八郎并不阻挡，放他们过去，直到韩国和日本之间的对马海峡。这时东乡才开始对他们实施包围。仅用了24个小时便击沉、撞毁或击伤俄国8艘装甲舰、9艘巡洋舰和9条反鱼雷艇。这一场由日本人大获全胜的海战，使俄国一蹶不振，毫无报复的余地。

第七章　柏林——符拉迪沃斯托克，骑马而行

“福岛是个真正的唐·吉诃德。他的勇气，他的品行和他欢快的性格使人惊讶。只要有大无畏的精神，便没有做不成的事。请交给他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吧，他肯定会完成。”

——拉斐尔·诺加尔将军

这个时期，在最杰出的军事情报工作者中，有一个男爵，他就是福岛少将。他于1858年生于松本的一个“萨木拉依”之家。曾在东京大学学过法律。由于他和同事们的关系极其融洽，便使他能于1875年转往参谋本部工作。翌年晋升为中尉……随后他访问了蒙古。并于1882年至1884年间，在北京任武官。他素以屡立战功和处事勇敢而享有很高的声誉。1887年，他在柏林又任武官。他在德国任武官的5年当中，深孚众望。

在日本，如果一个外国人同你打赌，从来不会被人置之不理，尽管这种打赌的内容看起来很古怪，或者同一个军官应尽的责任完全相反。福岛少将就是如此，他是一个尚武的军人，他热衷于任何一种打赌游戏。

有一天，他和几位德国军官在一起，话题谈到了这上面来。有人说，如果骑一匹马，每天以同样的步伐行走，那会走到什么地方去呢？福岛是个无双的骑士，他宣称，他的坐骑可以带着他从柏林直到符拉迪沃斯托克。

在场的德国军官们不禁放声大笑。

“这是开玩笑而已，这完全不可能。”其中一个说。

“您难道连地图都没看过吗？这中间的距离足有9 000英里呢。”另一个这样补充说。

“我当然知道这路程不近，”福岛回答说，“但我知道得很清楚，我们——我和我的马，是能够做到的。我觉得我有足够的力量做这件事，我现在身体非常好，而且我也习惯于骑马走山路。”

几杯酒下肚以后，这几位德国军官便和他打起赌来。因为他们不相信他会同意干这种事，于是便主动提议给他一匹好马使用。使他们感到特别惊讶的是，他本人不但同意和他们打这个赌，并且还居然得到其上级的准许。

这个故事使我们想起了十九世纪另一个不可思议的冒险行为，即弗雷德·伯纳比上校的故事。伯纳比是个骑兵军官，福岛和他有许多相同之处。伯纳比1874年曾在苏丹工作，当他得知俄国的边界已对外关闭时，便立即动身，经过小亚细亚回到科希瓦。伯纳比是福岛心目中的英雄。

但他这次的打赌，却主要是看个人的持久性和耐力如何。结果是通过这次长途骑马旅行，福岛打破了有关这方面所有的记录，做出了比伯纳比更为惊人的壮举。

我们这位日本军官于1892年开始了他的征程，15个月以后，他到达了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中间他穿过了俄罗斯、西伯利亚、蒙古，最后经过满洲到达目的地。为了争取时间，

他衣服也没换便赶回东京。当他到达日本首都时，已经变成一个衣衫褴褛、满身泥浆的乞丐模样的人了。但一连几天他都被人们当成英雄来欢迎。这一壮举使他成了一个民族英雄。在开过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之后，他便晋升为中校。他旅途中穿过的那些破衣服、使用过的马鞭等物均被送进日本国家陈列馆展出。

关于这件事的另一篇译文则认为，福岛的打赌实际上是一次掩护行动，其真正目的，则在于搜集俄国的情报。而日本军事当局之所以批准他打这样的赌，其用意也是为了让他把沿途所见所闻记在心中，以后再写出详细的报告呈送当局。当时他正在柏林工作，他的看法是，应该由一名日本军官去“摸摸”俄国人的底。他说：“作为一名军人，到实地去体察一下我们所获取的情报价值如何，是非常重要的。”他能够流利地讲多种语言和某些地区的土语，当然这也包括俄语在内。由于他俄语讲得好，就有可能使他在沿途得到许多十分有价值的情报。

自那时起，福岛便进入日本有等级的人士行列之中。他在日军参谋本部工作时，曾出使过埃及、土耳其、阿拉伯、印度……等国。1902年，他前往伦敦，代表日本参加艾德华七世加冕礼仪式。当然，他此行还有另一个目的，即在暗中充当英日同盟条约签订的牵线人物。

在这次访问中，他被英国授予“高级荣誉骑士”称号。

当伊恩·哈密尔顿将军第一次遇到他时，便认定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情报工作领导者。”这位英国将军给予他很高的评价，尽管这位日本军官当时的任务是“不惜使用任何可能使用的手段破坏和阻止一切外国人针对日本的计划。为了最有效地执行这一不令人喜欢的工作，他常以朋友和合作者

的面目出现在那些外国人中间。”

哈密尔顿将军发现，福岛对英国驻印度的军队以及他的俄国对手的情况了解得十分清楚。对此，福岛反驳说：“在印度的英国军官，比锡克教徒更具锡克教徒味，比廓尔喀人更象廓尔喀人[1]……”

福岛手下的荻野上校，正式在第1集团军指挥部里任职。和他的上级一样，荻野也是个俄国问题专家，他曾在俄国住过7年，并曾在欧洲受过教育。这人的思想非常开放，所以即使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他也对俄国人的谦恭有礼和亲切殷勤十分欣赏。

这位世界主义者在审问俄国战俘时，也同样表现得十分灵活机动。由于他具有善于分析人的心理的才能，所以他一眼便可以看出哪些人是否受过良好的训练。经过对俄国人的一番考察后，他得出结论说，大部分俄国士兵只受过8个月的军事训练。

日本人对应征到俄国部队的土耳其斯坦[2]人特别感兴趣。经审问表明，他们都是优秀的战士，并且非常容易接近，因为他们都是穆斯林。日本人之所以乐于和他们接近，其用心是深远的……这一个种族属于亚洲的大摩西族人。日本人始终想把他们从沙皇俄国的控制下解脱出来。这一想法在二十世纪的20年代和30年代，曾不断地在日本内部提出。这一看法的两个积极鼓吹者就是富山睦和内田良平。富山睦希望

（1）锡克教是印度的一种教派。廓尔喀人是尼泊尔中南部和部分西南部的居民。——译者

（2）土耳其斯坦是俄国版图的一部分，位于俄国亚洲部分的北部。老土耳其斯坦现在已划为苏联的五个加盟共和国，即哈萨克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乌兹别克共和国、土库曼共和国和塔吉克共和国。——译者

他的情报机构可以通过这种做法同穆斯林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

还有一个人物也应该说一说，此人名叫荒尾清，是亚洲地区秘密会党的领导人，他还在上海建立了一个“中日通商研究学院”。“学生们毕业后20人为一组，编成若干组，分布到中国各地，一直到满洲……”不久，他们当中有些人被分配到日本在中国最大的一些公司当职员，从而变成了各该地区的间谍。另一些人则以远东贸易专家的身分，进入商务裁判机关。还有许多人在中日战争期间当了翻译。

中国人知道日本人打进他们的行列，如在旅顺港，苦力中有12％是日本人。因此，中国人决心支持俄国。

双方间谍机构都设在对方的战线之内。情报的传递系统运转得非常漂亮。所有情报均由日本人或中国人来传递。就是使用这种传递方式，日本人发现了俄国人的一个秘密计划，即在所有的海岸港口和所有日军要经过的地方，俄国人都布下水雷。这一计划的详细内容是由那些已经成功地打入对方布雷单位的人报回来的。在这里的工人中，12个人里就有1个是日本间谍。这使得日本人轻而易举地便画了一张随时可变动的地图，上面标明，哪些地方是俄国人的雷区，哪些地方存放着雷管、炸药等。

为了把工作搞得尽善尽美，日本排雷人员于深夜清除了上述水域的水雷。

随着战争的进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转而为日本人工作了。因为日本人成功地向中国人表明了他们的善良愿望。在一般情况下，情报的传递方式是，把情报放进用糯米纸搓成的小团内来传递。此外，比这更为隐蔽的方法也时常使用。有时，派乞丐拿着在木盘上摆放的一些有记念意义的小玩艺

儿，到边界线上去叫卖，趁人不注意便越过边界。那些小玩艺儿在木盘上的位置，便代表敌方军队调动的情况。因此，在满洲的双方作战边界上，乞丐特别多，这种把戏也从来未被人发觉过。

几个月以后，俄国人的战线便全被特务们所渗透。这些特务中绝大部分是为日本人工作的中国人。这些中国人通常都不会讲俄语，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他们以人多取胜。

在当今世界上，如果论对敌人实行系统的破坏政策，那么日本人肯定是名列前茅的，这在当前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他们号召间谍人员打到敌人的内部去。发电机、探照灯、铁路，是他们特别喜欢破坏的目标。1904年，化装成蒙古人的两名日本军官，当他们正在破坏一条铁路和一架发报机时被当场捉住。

拉斐尔·诺加尔将军，是这次战争中为数很少的为日本人服务的外国人中的一个。这个雇佣的间谍，是18岁那年在美西战争(1) 中 开 始 干这个行当的。后来他当过美国西部的牧牛人，当过矿工。在他重操间谍旧业之前，是个地质勘探者。一位名叫伊文斯的韩国王国国务秘书雇用了他。同时伊文斯本人也受雇于日本人，充当日本特务和间谍的发展人，同时也是日本在韩国的情报网的监督人。

伊文斯命令诺加尔以瑞士一家手表公司代表的身分到旅顺去，在那里开展其特务工作。伊文斯之所 以 给 他 这一任务，是因为当地的俄国驻军司令斯托埃塞尔是瑞士人。

诺加尔同时也十分了解袁世凯的内幕情况。袁世凯是一个中国军阀，此人同俄国人有联系，但他同时又和一个日本

---

(1)指1898年美国和西班牙的战争。——译者

特务搞秘密谈判。这个日本特务是一个名叫吴岭（音译）的老人，由于诺加尔一系列的反问，终于使这个老人开口了。吴岭借助放大镜，在一张比香烟纸还小的仿羊皮纸上写了一些字并画了一些图，然后把这张纸揉成一个别针头那么大小的纸团，他嘴里有四颗假牙，取下一个，把小纸团放在牙洞内，然后用蜡封好，再把假牙放回原位。

但吴岭还是被袁世凯出卖了。他遭到俄国人的逮捕，并受到拷打，假牙也被取下。牙洞内的纸团写的是俄国人入侵中国的详细计划，还有俄国军队的宿营地点以及给养、仓库等方面的情报。后来吴岭被以最野蛮的方式处死，其尸体并被扔到篝火里烧掉。

日本人对于俄国间谍，则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日本人在这方面的态度十分明白地说明孙子对他们的影响。他们很重视间谍人员的爱国热情。比如，有一个俄国间谍，化装成中国人溜进日本军营后，迅即被俘。当然，此人被判处了死刑。然而，由于日本人对他的勇敢精神给予很高的评价，并对他所从事的间谍工作非常尊敬，所以曾向库罗珀特金将军发去一个照会，在照会中对那个间谍的忠诚和他心灵的高尚给予了表彰。这无疑是颇具现代骑士风味的一个极其典型的例子。

日本人从不放过任何一次能使俄国人上当受骗的机会。哈密尔顿将军就他的所见，对日本人在鸭绿江附近所采取的伪装措施作了描述：

“我们所经过的道路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江的对岸俄国人占领的地方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如果一个俄国军官在那边用一架高倍望远镜，就可以准确地观察到一切，并能估量出我们有多少兵力。为避免这种情况，日本人借助大

树来作掩护。当隐蔽在对岸观察的俄国人看到头一天还什么也没有的大路上，一夜之间竟在它边上长出了一条密密的杉树时，我相信其惊异程度恐怕比麦克白看到勃南的森林移到邓西嫩去还要大得多[1]。这种伪装搞得很有特色，既没有细弱的小树，也未留下疏密不匀的缺口，全是一色的粗壮树木，形成了一条用树林挡住的大路。这条"康庄大道"一直通到我们的下一站义州。"

诺加尔是在日俄战争中同福岛相识的。这位日本将军向他详细地询问了美西战争的情况。还有一次，那是在一次短暂的战争间歇，在一个晚会上，大家在饮酒作乐，诺加尔又见到了他，其时他正和许多军官在一起，诺加尔写道：

"军官们正在十分认真地研究着某些情况，突然福岛用手击了一下桌子，然后笑着说：

——现在，让我们对此庆贺一番吧。诺加尔，您也来和我们一起玩玩。

我对此着实感到惊诧。看到他这个样子，我想，他竟能如此容易地在这一两个小时把战争全部忘掉。"

吴岭被捕以后，急需找一个隐藏文字情报的新联络点。因为敌人得到那些情报后，尽管不了解内容，但却可以把它们毁掉。待到战争后期，日本人开始试着避免使用文字书写的方法传递情报。他们比较喜欢用的方法是利用口头传递，这样比较灵活，传递人员只需把情报内容记在脑子里，到时

(1)麦克白是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中的主角，原是苏格兰的大将，勃南和邓西嫩是两个相距很远的地名。麦克白使用手段使自己当上了国王，苏格兰贵族起来反抗。女巫告诉麦克白："麦克白永远不会被人打败，除非有一天勃南的森林会冲着他向邓西嫩高山移动"。后来勃南的森林果真移到了邓西嫩，麦克白于是便知道自己的大势已去。 ——译者

候用叙述的方式传递。至于有关巡洋舰、反鱼雷艇，以及其它有关舰艇方面的情报材料，必须使用文字者，则用布料代纸，缝在衣服内。

黑龙会经过数年的精心准备，在这时结出了硕果。黑龙会里有一位名叫浜田肇的专家，于1898年离开北海道前往满洲的北部边境，然后又在俄国境内定居下来，后来又在距俄国军队驻防地不远的地方开了一家小杂货铺。他在店铺后间的屋子里，摆放着各式各样为妇女所喜爱的便宜的装饰品或假珍珠项链等。这些货物价廉物美，很受驻地军官太太们的欢迎。加之此人在她们前来买东西时，又特别殷勤，所以他们很快就混熟了。自那以后，每当那些太太们在前屋里东西买得比较多时，他便把她们请到后屋里去，向她们显示他那些“宝贝”，并作为礼物，每人都送给一件小物品。

在这些军官太太们的眼里，他只不过是一个“东方式”的小商人而已，从来也没有想到他是个日本人。再说，此人的俄语讲得非常好，有时候还能为她们背诵几句俄文诗。不久，他就成了这一地区最受欢迎的商人了。有人说，他曾在点心里放进去春药，给两位军官太太吃，从而诱奸了她们。不管他曾使用过什么方法，他的情报联络的秘密，就在他后面的那间小屋子里。人们从来没有发现过他在店外搞过什么活动。此外，他也十分谨慎，只有在没有人注意的情况下，他才在自己的后屋里接待她们。

连续4年，他都按时通过信件把搜集的情报投送出去。他搜集的情报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从那些军官太太们嘴里得来的。这些情报都是通过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一个特务交通员送往日本军事情报部门的。

有一天，当地的村民们发现这个小店的门突然上了锁。

原来浜田肇已经跑掉了，待到俄国警察前来调查时，他早已没有了踪影。原来驻地的一名军官太太向他讲过许多俄国军营内部的情况，她也知道自己犯了罪，于是便把警察要来调查的事预先透露给他了。

后来浜田肇到了天津，又在一个新的职业掩护之下，继续从事他的特务活动。

当时的一般人都认为，俄国肯定会在这场战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日本人对这种说法也不加反驳。日本人按惯例，可以允许某些外国人以军事观察员的身份到日本军队内随军行动，同时可以向这些外国观察员们提供一些有真有假的情报，这些真真假假的情报使外国观察员如堕雾中。

福岛和明石二人，彼此相互都十分佩服。尽管他们的私交不深，但他们都经常在一起探讨日本情报事业的未来等问题。他们二人一致认为，在满洲，在韩国，在蒙古，乃至在远东大片的土地上，日本妓女在获取情报方面，是他们最可宝贵的资本。福岛曾写过一首诗，名为《凋谢的花朵升华成一颗名星》，讲的就是一名妓女如何变成一个爱国者的事。随军摄影记者西光真清，曾招募了一大批姑娘为他工作，他本人是军方情报机关的一名军官。在1880年左右，这批姑娘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她们素以“温柔、礼貌、热心”而闻名。所到之处大受青睐。到十九世纪末，她们已经形成了“可以随时行动的情报网”。

明石并坚持参加各种文学沙笼。在文艺圈中，他经常应邀去谈自己的诗画，同时也经常应邀去发表他的军事见解。在晋升为将军以后，他原被准备任命为日本驻福摩萨[1]总

（1）即中国台湾。——译者

督，但命令尚未发布他便于1919年死去。

他生前在世界各地为日本结交了许多真正的朋友。其中有很多是穆斯林人。在十九世纪20年代，黑龙会的人在同穆斯林秘密联系方面，曾与这些人有过密切的合作。

日俄战争以后，福岛特别受到重视，曾被派往中国担任相当于辽东半岛总督地位的职务。他 于 1919 年 2 月 18日去世。

第八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十九世纪20年代，日本已变成一个强国，对此应予重视。而英日同盟，则又是日本同西方世界关系的一块基石。这一联盟在1905年又得到了加强。随后在1907年日本同法国订立的“协议”又打开了同俄国对话的渠道。这样便初步形成了大不列颠、法国、日本和俄国四国联盟的基础。这在1914年的时候，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战前的英国外交国务大臣洛德·格雷在他的自传中证明，在他担任国务秘书的12年中，日本人还未试图过分地利用过这个联盟。

在同欧洲的关系得到改善的同时，同美国的摩擦却加剧了。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未能使这一形势有多大改变。日本向美国移民的增加，引起了美国内部的混乱。在加利福尼亚洲，许多人参加了抵制日本企业的活动。在学校里，日本孩子受到孤立，尽管他们的智力水平和其他孩子相同，甚至还高于他们。虽然1907年在一份“君子协定”中，对日本劳动者的移民进行了限制，但是“加利福尼亚反日同盟”却断然要求禁止日本方面的任何移民入境。

两国之间的糟糕关系，很可能导致两国全面断交，因为美国海军已把日本人当成头号公开的敌人。然而，在当时除了为准备一切战争而正在活动着的某些间谍组织以外，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上面那种说法。

1914年春，日本发生了一件丑闻，它导致山本内阁倒台。这一丑闻更加证明了美国人对日本参加军备竞赛的怀

疑。事情是这样：英国维克斯公司在日本东京的一家分公司的3位领导人，被指控花4万英镑收买海军少将松本。此外德国的西门子-舒克特公司也因同日本进行无线电交易而被牵连进去，它被揭发进行贿赂。揭露出来的这些事，导致对维克斯公司及其日本雇员进行反调查活动，导致陆军部和海军部的情报机关对在这场贩卖武器事件中德国人的活动以及英国人的阴谋进行深入的调查。

维克斯公司的协调人巴兹尔·扎哈罗夫，在这场军火工业的贿赂事件中，是一个危险的关键人物。日本情报机关掌握了此人的大量档案材料。对于他如何因在敌对双方间贩卖军火而大发横财，以及他在自己一手策划的这场纠纷中得了多少好处，日本人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日本人加入了协约国一方，它起的作用尽管不能忽略，但毕竟有限。尽管它自日俄战争开始，即大力加强其军事力量，但国内的舆论却谴责它"把大量的金钱耗费在军备和国防上面"，而对其批评最尖锐的，则来自商界。日本在参战的同时，却又变成了对西方国家廉价商品的供应者，这就帮助了它的经济起飞。当1914年它对德国宣战时，正是大隈重信内阁执政，全国军队共有25万人。

就在这个时候，长期经营的日本情报工作，开始结出硕果。它从同俄国进行有限的合作，发到到1916年的签订秘密协议。使这两个国家受益最多的，还是在中国那片土地上。一系列反对德国的军事行动从青岛开始。德国人于十九世纪初叶即把青岛占为海军基地。经过两个月的斗争。德国人失败了。在以后的战争中，日本人企图在中国大陆建立一个坚实的阵地，这时它的海军已经封锁了被德国人占领的太平洋诸岛。

日本人的这一系列行动，应该被看作日本对协约国的光

明正大行为，但我们却不能不看到，在这背后，有着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果然，当时的首相大限重信候爵曾明白无误地承认了这一点。1914年他声称："世界将被几个大国瓜分，并由它们来统治的日子即将来临。而成为这些大国当中的一员，便是日本的目标。"

1915年，日本把德国在山东所占领的地盘夺了过去，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二十一项条件，其中包括把它的势力范围扩大到满洲和中国北部一带。中国当时对是否接受这些条件犹豫了很久。洛德·格雷很客观地把日本人所处的形势说得很清楚："在大战期间，日本人试图加强他们在东亚的阵地。欧洲已让战争拖得精疲力竭，而美国的注意力和力量也都消耗在这上面了。"因此，这对日本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德国人加强了把日本从协约国分化出来的努力。他们想借助于墨西哥领事馆内某些成员的力量来达到这一目的。德国人向东京提出了很诱人的条件，例如放弃他们在亚洲的利益和交出太平洋诸岛等等。

墨西哥和日本当时的关系相处得极好。这个国家对待日本的移民比美国也好。它同时也为德国人提出的秘密条件服务……。这使人们想起了著名的齐迈尔曼电报事件，这件事的暴露，曾引起协约国很大的沮丧情绪。

事情是这样的：德国外交部长阿瑟·齐迈尔曼给他驻华盛顿的大使发出一份密码电报，这份电报被伦敦的海关分舰队的情报机关截获并破译了。该电报签发日期是1916年1月16日，全文如下："绝密——请阁下注意：2月1日我们将开始进行无限制的水下战争。我们将尽最大努力迫使美国保持中立。如果此举不成，我们将按如下条件提出同墨西哥结盟，即：以必要的条件作为交换，达到战则同战，和则同和

的目的；这些条件是：我们将向墨西哥提供慷慨的援助和必要的支持，以使它能够收回已失去的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请您在对美国的战争即将开始时，把以上意见告知卡伦札总统，并请您向他建议：使其力促日本立即赞同并同我们谈判，您务必把总统的注意力转到这方面来，即：我们潜艇的出动可以迫使英国在几个月内签订一项和约。”

摆在海军上将、英国海军情报处处长W·R·霍尔面前一个很大的难题需要解决，即怎样说服美国人，使他们相信，德国人的这些一厢情愿的天真想法（把得克萨斯州等归还墨西哥）不是故弄玄虚的把戏，也不是英国人为使美国参战而故意编造出来的假电报。霍尔对英国的那些同盟者甚表怀疑，如果说，他已和日本人合作了，他就应该收到对德国这份电报的证实文件，因为按常规讲，如果英日在海军情报工作方面合作得很出色的话，那么日本就应该让英国人知道德国人在幕后策划的这一阴谋，因为东京对德国人的计划需要准确的了解，但现在这种情况却是反常的。鉴于德国同墨西哥的会谈正在深入下去，日本人便加强了对墨西哥的情报工作。

1915年，日本人的一支小舰队在没有任何公开理由的情况下，停泊在墨西哥水域内。为使该舰队停留的时间长些，日本人借口说，他们的“浅间”号在下加利福尼亚海湾搁浅，该舰在未修复前不能起航。这一次访问的任务，实际上是探查和监视德国人在这一带可能采取何种行动。墨西哥城接到命令：保持中立。日本的一部分船上人员已在墨西哥和下加利福尼亚上岸，并和当地的日本移民混在一起，而且已在当地吸收了一批日本移民当情报员。很明显，墨西哥除了一些给

养外，不可能向德国人提供任何东西，海军对此是没有怀疑的，但东京却害怕德一墨联合，会有助于德国取得胜利。

英国海军情报机关的调查证实了日本人的这种恐惧情绪。美国密码破译局未能破译过一份德国或者日本发出的密码电报。

人们还发现，停泊在维腊克鲁斯港的德国舰船上无线电军官每天夜间都溜到岸上，从伊克斯塔巴尔巴向外发报。而日本情报人员和他们自己的技术员也已渗透到当地的无线电发报站，并不惜花大价钱收买了一个专门开箱的锁匠对无线电发报机进行破坏和干扰。但他们却不知道，这个锁匠也同时被英国情报机关收买干着同样的事……。

日本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起了主要作用，但它却从没有得到应得的荣誉。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它始终和英国海军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尽管其间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件。它在地中海和太平洋上也起了同样明显的作用。它的军舰经常被秘密派出，负责对通商航线进行监视和保护，有时也被派出侦察敌人的潜艇。尽管战事一开始日本即加入了协约国，但它内心总有些感觉，即觉得自己从未得到过平等的待遇。这种抱怨情绪在美国人参战后，变得更加强烈了。

第九章　川岛浪速
——满洲的冒险家

小小萤火虫，你快过来吧。
到这边儿来喝水吧！
那边儿水是苦的，
这边儿水是甜的！
来吧，来吧，快来吧，
这边儿生活是甜美的！

——日本儿歌

在日本控制下的满洲第一批非正规战斗队员，把这首出自岛根的儿歌当作他们的口令和互相识别的暗号。这首儿歌也是这支战斗队的领导川岛浪速所最喜欢的一支歌曲；他把它译成汉语和俄语，以便于用各该语言演唱；他只把韵脚稍稍作了些改动，有个别的词句也稍有变动，如“这边儿生活是甜美的”一句，应理解为“日本这边的生活是甜美的”。

川岛浪速出身于1868年王朝复辟以后东京的一个“萨木拉依”家庭。20多年来，他一直是一个非常杰出的间谍。他和宫崎一样，也转信了基督教，但基督教却很快使他失望了。他视西方人为精神侵略者，认为他们在最贫困的亚洲大地高喊和平，而自己却装满了腰包。川岛浪速年轻时曾到过

中国，很惊骇于当时中国人民的贫困和政府的腐败。

他同时还是一个出色的语言学家，在同俄国作战期间他曾以译员的身份在日军中工作。日俄战争以后，他被调到日本军事情报部门工作。开始是在北京的日本警察局任局长，随后加入黑龙会。川岛浪速有很明确的政治观点，他希望有一个政治清明、有作为的日本帝国，这个帝国能够保护亚洲大陆的人民不受俄国的侵略，不象中国那样腐败，不象西方国家那样贪婪。据他的设想，日本应该首先控制住整个满洲和华北。为实现这一设想，他准备采取让执政的满洲王朝统治者扮演一名傀儡领导人的角色。

川岛浪速还效法一些日本的民族主义者，他左右逢源、狡猾奸诈，又是个理想主义者。他青年时期曾热烈地支持过孙中山，并且准备同孙中山联合，以鼓励中国的那些极端的反清分子。但是，他后来渐渐地对孙中山产生了怀疑，因为孙中山根本不相信日本的未来就是他革命的方向。

不久，川岛浪速创建了许多“满洲支部”，其目的是想在满洲形成一个亲日组织的核心，并等待着一旦时机成熟便立即行动。无论是谁，也不管他是在中国还是在满洲，也不管他们酝酿着什么计划，川岛都能够了如指掌。又因为他在日本开办了一个特务训练学校，所以他便有条件很容易地把他培植出的特务人员安插在中国各地的关键性岗位上。在北京，他和肃亲王拉上了关系，这个肃亲王是满洲的积极支持者，当时任中国首都巡警局的头头。他虽然被排斥在清王朝小朝廷的圈子之外，但仍然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1901年，他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了爱德华七世的加冕礼。川岛的说服力是强的，没过多久他便说服了肃亲王，使这位亲王极力主张中日合作，并且同意满洲可以在日本控制之下，由一名

满洲人出面领导。

1911年初，机会果然来了。川岛听到中国发生革命的风声，便要求东京：只要日本在北方保住了满洲，便可放手支持中国南方的反清活动。他的这一战略方针虽然显得有些自相矛盾，并且执行起来也相当复杂，但从实现他的长远目标看，这个战略方针是符合逻辑的。他把自己的打算向当时日本驻北京的代表伊顺彦吉讲了，这一做法，无疑是他犯下的第一个错误。伊顺彦吉很感兴趣地听了他的陈述，好象对他颇为赞许，但此人却是全面支持袁世凯的，而袁世凯又是千方百计想消灭南方反对派的代表人物。

袁世凯这位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铁腕人物已经引起了日本黑龙会的注意。在此之前，黑龙会已经安插了一些人在孙中山的亲信人物周围工作，但它同时又在袁世凯的支持者中广交朋友。袁世凯此时已了解到孙中山同日本的某些激进分子有了联系，因此他也企图同日本政府达成某种交易，以抵制孙中山的联日力量。这时日本不但取得了在满洲经营一条铁路的权利，同时它还得到了“汉冶萍钢铁公司”将由中日合办的许诺。在写入袁世凯条约的一些秘密条款中，有一条规定：所有的中国警察机关，将由日本和中国官员共同领导。这一特权的获得，为日本搜集各种情报大大提供了方便。

孙中山打进袁世凯内部的情报人员，向他详细地报告了这些秘密条款的内容，以便使他可以发动舆论反袁。在这时期，川岛浪速和伊顺彦吉也在互相斗智。前者在积极地搜集伊顺彦吉搞阴谋活动的罪证，而伊顺彦吉也在密切注视着川岛的一举一动。

川岛浪速是个十分果断的人，一旦决定了的事情，他就要干到底。以他在黑龙会的资格，他深受会员弟兄们的爱

藏。此外，他还和中国的某些实力人物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这些中国人并不反对同日本合作，如果这种合作不妨碍他们本身利益的话。吴禄贞将军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位。川岛曾同他密谋，计划如何阻止袁世凯回到北京，不幸这一计划败露了，该计划还未来得及执行，吴就被袁派人暗杀了。

过了很久，川岛又密谋制定了一个暗杀计划，即在袁世凯去北京的列车上放置一枚炸弹。这是黑龙会一手策划的又一次暗杀行动。参与的人还有两名军官：高山上校和田贺少校。这两人也是黑龙会会员。这一新的密谋活动又被及时揭露。毫无疑问，这是由伊顺彦吉泄露出去的。因为他为搞报复，对川岛采取了严密的监视措施。最后一次流产的暗杀，是在袁世凯的官邸里进行的，但还是失败了，因为袁经常会突然改换他的住地。

在这个时期，肃亲王住在辽东半岛上的大连，准备一旦机会到来便同日本进行合作。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下目标上：一个是满洲那块土地，一个是选一位王族作那里傀儡政权的头头。为此，他单枪匹马地（但却得到富山睦的支持）创建了一个秘密团体，名叫“汗山所”。他隐约地觉得，他的这一成果有海格立斯(1)式的特点，即需要花大力气对世界各国进行细致而稳妥的工作。这个秘密团体的宗旨是，建立一个满—蒙联合的国家，在日本人的监护下，由肃亲王出任国家元首。肃亲王不久回到北京，准备同日本人进行秘密会谈。但这时革命党人听到他回来的消息，便四处寻找他的踪迹，准备杀掉他，他又不得不费尽力气在3名黑龙会会员的帮助下逃出了北京。

---

(1)海格立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以其有非凡的力气和赫赫的武功而著称。——译者

为了对他的救命恩人表示感恩之情，肃亲王毫不犹豫地卖掉了他珍藏的古玩玉器和个人的财宝，筹措了一笔巨款送给在满洲的战斗队员和“汗山所”做经费。这样，看起来川岛的计划似乎进行得很顺利。大藏省属下的一家贸易公司并慷慨解囊，拿出200万银元赠给“汗山所”。但是，一个巨大的障碍阻止了他计划的顺利进行，即日本的外务省和陆军部队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初衷。外务省还好说，但他们却不能没有军方的实力支持。许多久经疆场的军人和在军部工作的军官都站在川岛这一边，但是他们的上级对于把这样一片未经开发的土地留给那些秘密会党去干，感到非常没有把握，犹豫不决。他们企图放慢决策的速度，对“汗山所”成功的可能性持极其悲观的态度。

除了肃亲王外，还有两位亲王参与了这一计划，那是两个蒙古人，一个叫喀喇沁，一个叫巴林。这两个人对于满洲实行某种自治的想法非常赞同。尽管陆军部在这件事情上畏首畏尾，但是陆军总司令部还是派出数名军官前往中国参与“汗山所”的各项工作。

川岛浪速同两位蒙古王公签订了一个条约，规定日本向蒙古派出农业顾问和提供粮食，以换取日本对蒙古的行政监督权。

这个条约同时还规定了给日本人通商以特别优惠权。实际上，日本此举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蒙古单独同俄国人接触。从理论上讲，蒙古属于清王朝领土的一部分，但实际上俄国人早已把这片土地当成他们的一个势力范围了。蒙古北靠西伯利亚，东与满洲接壤，大有开发价值。川岛浪速巧妙地迷惑了蒙古人。蒙古很少河流，只在北部有些河流流经西伯利亚（但“那边儿水是苦的”），在最东北部是阿穆尔河（黑龙江）

的源头（即“这边儿水是甜的”）。

佛教是日本和蒙古文化和宗教的共同纽带，这就使得两个民族接近了。在当时，人民中有1/3是佛教徒，这些人对那首《萤火虫》民歌所体现的意思，感应十分灵敏。

中国的那位年轻皇帝在袁世凯执政以前便已退位。因此川岛想，和这位年方12岁的前皇帝保持着联系还是可取的。在当时看起来，日本人要在东亚站住脚跟，似乎有利条件比较多。如果川岛能取得外务省和军方的支持的话，他的计划肯定可以实现，然而最大的问题，是向蒙古和满洲运送军火问题。通常使用的方法，是通过韩国这个渠道。但是，甚至连负责道路警戒的日本军官，也不怎么赞成这些货物非法入境。

那些军火贩运商们，冒着被土匪袭击的危险贩运武器弹药。在这一危险的工作中，有50余人死于非命。

然而，他们一把特务的黑手秘密地伸向这个国家，他们就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起码在试探虚实方面是如此。如果这一企图得以实现，那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也不会有什么改变。不过，毫无疑问，它却可以对俄国人战后的扩张主义有所遏制。在其它某些方面，也或许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川岛浪速的宏图，在第一个10年中，有点象400年前丰臣秀吉的神韵。任何一个现代国家，从来没有象日本那样，不用枪炮就赢得了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使用的策略，仅只是把它的特务们安插在各个关键的岗位上。同样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象日本那样，在其它国家对那件事还不甚了然的情况下，它已经尽善尽美地完成了它的计划。当然，这与40万平方公里的满洲相比，只是无所谓的一个区区小数，但它的意义却在于它制定的一系列计划，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

成功之作。

这一入侵行动是在3000名特务具体指挥下进行的。其一切步骤均按军部命令执行，其参加者大部为日本人。满洲的那支战斗队负责联络工作和建立情报网。川岛浪速看到他的计划已经到了成功的边缘时，便动身去东京，并且自以为会受到表扬和得到更多的支持。但实际上，外务省和陆军部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产生了分歧。他们在总的方面同意这些战略要点，而在具体实施上却迟疑不决。

川岛浪速的这次东京之行，是参谋本部给他一封信让他回去的。当时他接信后马上想到的，是参部本部可能要同他具体商谈下一次对他实施军事援助的细节。然而他却彻底失望了，因为军方认为，他在这次行动中，越出了他应有的权力范围。因此，他不得不耐心等待着适宜时机的到来。对于今天的日本来说，当时的那种评断是何等荒谬！如果满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便被殖民化了，那么，30年代的那种混乱局面肯定可以避免。

尽管川岛的宏图受到了挫败，但他却拒绝放弃自己的打算。他不赞成日本政府的政策，但他也从不使用公开的批评手段使政府难堪。不管他的思想感情如何，他始终保持着一个忠实、守纪的情报人员本色。

日本开始对孙中山寄予极大的希望，甚至对他同袁世凯进行的"旷日持久的谈判"也寄予希望。1915年仲夏，由于孙中山同袁世凯在进行讨价还价的谈判中给了袁远远超出明文规定的"权限"，于是中国便出现了比以往更加分裂的局面。

许多事实证明，日本政府试图严格地忠实于和它签约的西方国家，并且力图不做任何有损于它同西方国家关系的事。茅野长治向大隈重信首相递交了一份报告，要求把在青岛缴

获的德国武器送给亲日的中国革命党人，首相断然拒绝了，并说："如果我们对中国的革命者给予帮助，那我们就会遭到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反对。"

于是，茅野长治和川岛浪速只好陆陆续续搞些武器，以半公开的方式支援这些中国革命党人，但从未满足过他们为达到其目的所提的要求。当时川岛在大连，他正忙于发展一个小型的保皇主义分子骨干队伍，这个队伍的目标是以肃亲王为中心建立的。这时，外务省对分布在中国各地的秘密情报人员送来的报告进行了分析，还画了一幅中国地图，在上面标出某地设有军事司令部，某地的军事实力如何，以及革命党的每个小组活动的范围等。

1916年底，日本军方正式撤消了它原来对进军满洲的半公开的支持。1917年，川岛又重新搞起了他在满洲建立政权的计划。但他的密谋被泄露了出去，日本政府否认在这一事件中有任何牵连。黑龙会的会员认为这是一种懦弱行为，并认为政府的外交极不灵活，以致感到愤怒。在当时，最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的力量得到了增强，他们的影响也大为扩大，从而使得自由主义的追随者处于守势。

1917年的俄国革命，使中国和日本的形势大变。孙中山变得愈来愈敌视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而日本人由于他们同英国结成了同盟，也便在中国人的眼中成了"坏蛋"。孙中山曾对日本人说过："贵国的举动，恰似操纵在英国人手上的木偶。"他并且补充说："此次在欧洲进行的战争，以德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终，但亚洲并没有得到好处，特别是中国和日本。"

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表现得愈来愈亲密，这就损害了日本的利益。美国人的这种态度，不仅表现在公开的谈话

中，而且在官方的活动中也有所体现。尽管美日两国是同盟国，但美国海军却加强了它在日本的情报工作。《日日新闻》在1918年12月12日发表了一篇社论，反对把青岛无条件地归还中国。此外，日本人还要求，在俄国国内的秩序没有确立之前，任何国家的军队都不应撤出俄国，至此，日本政府完全表明了它反对革命的立场。华盛顿的海军情报局向国务院递交了一封信，报告了日本想把符拉迪沃斯托克变为自由港和把松花江与阿穆尔河开辟为通商河流的计划，以及购买萨哈林岛北部领土的计划。

我们不能否认，日本原来的想法是试图打倒东方俄罗斯的共产主义制度。当然，日本的这一想法是建立在自己利益基础上的，但它更坚定的想法，主要是要竭力支持白俄罗斯人，特别是在1918年至1922年之间。日本的这一态度表现得比支持其它任何一个盟国都更加坚决。某些历史学家曾提出，在整整这一段时期内，日本曾被有关反犹太主义问题的偏见攻击得相当激烈。这一指控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持此种观点的人是对当时的事态根本不了解的表现。反犹太主义者组织在所有的国家都存在，但在日本，却恰恰比其它国家要少得多。据我所知，“反犹太主义”一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日本，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因为犹太人在日本的数量非常之少，日本人民对“反犹太主义”一词，既不理解，也无法判断其是非。

此外，在知识界，无论是右倾的民族主义者，还是左倾的自由主义者，他们都想同犹太人合作，以了解犹太复国主义真正的性质是什么。他们这种愿望可以上溯到日俄战争时期。当时日本银行的高桥男爵为解决愈来愈高的战争费用，曾克服了许多极大的困难才搞到一笔贷款。当时他的谈判对

手就是一位很通情达理的美藉俄国犹太人。他的名字叫雅克布·希夫，希夫借给他一笔数额为500万英镑的贷款，当然，那也是为了对沙皇组织的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报复。自此，这两个人便成了很忠实的朋友。

当白俄罗斯人在1919年以假的“犹太贤哲会议录”(1)为借口，掀起一场诽谤中伤犹太人的运动时，日本情报机关才识破了俄国在西伯利亚对正在那里作战的日本士兵的欺骗行径。

有两名日本军官在一位名叫西蒙诺夫的白俄将军的司令部里研究“犹太贤哲会议录”的细节。后来，他们写了一份报告交给日本海军部和陆军部的情报机关。于是，日本便成立了一个叫特工科的机构专门研究犹太问题。由于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日本人中不但没有发生一起反犹太事件，反而诞生了一个和他们搞同盟的计划胚胎。

---

(1)1897年犹太美国主义者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该会议被犹太人称为“贤哲会”。后来有人为了中伤犹太人便制造了一个所谓的“犹太贤哲会议录”。——译者

第十章　拯救沙皇的计划

“拟同意日本特工科的做法，即设法把他救出，并安置在一个安全的所在。”

——摘自美国驻叶卡捷琳堡(1)代表1918年7月15日给美国国务卿的一份密电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有相当的理由觉得它并没有从中得到多大好处。非但如此，当它的一部分部队在西线作战，而另一部分部队在西伯利亚同布尔什维克作战时，甚至还受到了损失。

俄国问题，以人们不曾预料的形式又重新出现了。日本人希望在同他们的盟友处于平等地位的情况下结束这场战争。与此同时，它还要在东南亚显示出它不容忽视的存在，并要在太平洋上又以一个海军强国的形象出现。在和平会议之前，它的如意打算已经破灭了。所有西方国家都在暗中策划阻止日本在亚洲大陆上哪怕是任何一点点进展。每个国家都想在中国保留它们自己的阵地，并竭尽全力使他们所谓的“权利”在世界的这块土地上产生更大的效益。十分明显，美国对日本变得愈来愈敌视了。这很使自由主义的领导人感到沮丧。得到海军将领们支持的美国政府，甚至还企图设法阻碍日本海军的发展。

(1)叶卡捷琳堡即今天苏联的斯维尔德洛夫市。——译者

1891年，俄国皇太子(不久以后的尼古拉二世)访问了日本。当他看着人力车通过大街时，一名警察手持长剑企图对他行刺。后来的调查表明，此人是个狂热的教徒，由于这位皇室的客人不顾自己的身份在大街上看人力车，破坏了皇室的礼仪，于是他便被激怒才做出此举。令人费解的是，尽管日俄发生了冲突，但日本人对这一谋杀事件仍认为是一种犯罪行为。当日俄联合起来一起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人对这件事的犯罪感就更加强烈了。似乎日本人对罗曼诺夫家族(1)在道义上欠了一笔债似的。日本天皇睦仁认为，这一外交事件应予忘记，原因是如果将来有机会时，日本可以用另一适宜的行动加以弥补。当俄国沙皇的家族被俄国革命者监禁以后，日本的某些人便认为弥补过错的机会到了。如果这一行动能够得到人们理解的话，日本将会在世界上赢得极大的荣誉。

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人在俄国内部始终保留着一个很有效的情报网，而世界各大国对这样一个组织几乎一无所知，并且时至今日也知之不多。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即：日本人在1918年对罗曼诺夫家族真实情况的了解，比同时期其它任何国家的情报部门了解得都多。大量的日本情报军官扮成剃头匠、伙夫、内仆等在俄国的远东工作，以尽可能多地获取这方面的情报。

根据日本同俄国签订的条约内容看，日本人对沙皇和忠于沙皇的军队在1917年至1918年间所进行的对德战争，是取支持态度的。直至1918年停战以后，它仍然支持沙皇。尽管这时候欧洲的协约国由于白俄的问题，对沙皇的支持很显得

(1)罗曼诺夫家族是当时沙俄的皇族。——译者

有点暧昧了。

距此20年以前，日本人就已经同俄国的革命者建立了联系，其目的不只是搜集情报，他们同时在私下里还有另一种打算，即削弱沙皇的军事力量。然而自1906年以后，日本却从根本上转变了态度。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日本同俄国一样，是一个帝国。因此保皇党们企图在国际上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帝国“辛迪加”。在战争进行到中期时，川岛浪速开始秘密活动，想同沙俄的军官达成一项协议，以求实现他所设想的“满洲计划”。英国在彼得格勒的情报官员威廉·萨默塞特·莫姆在一份报告中，曾隐约提到过此事：“马萨里奇教授强调要‘等价偿还’，必须预先付款…至少以派出30万日军为宜，这可使俄国人恢复勇气。”这位教授还提出：“日本的这一介入将得到报偿。如果用现款支付不予考虑的话，那么就将把满洲的一部分领土让给日本，而实际上那些地方已经在日本的掌握之中了。”

就这样，情报机关的领导人、黑龙会的头头，以及某些军官们，把目标都放在如何以一种有利的方式来寻求西伯利亚战争的出路。此外，他们也都知道，日本要在这场战争中取胜是轻而易举之事。一旦把沙皇家族救出之后，日本便可以在俄国东北部取得开发权了。但是政界要员从一开始就对这一计划能否成功很有怀疑，而后来事态的发展，证实了他们的怀疑是有道理的。

1917年年中，日本便和俄国东部各港口建立了商业联系，而且在贸易中颇为盈利。一大批日本的大公司在西伯利亚和满洲地区开设了分公司，而且大部分原先在那些地方工作的日本人，现在也已半长期性的居留在那里了。

日本人在西伯利亚驻有两个师的兵力，此外还有与之相

应的指挥机构。根据一份条约的规定，协约国的每个成员都可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驻军7,000人，以便随时可向西伯利亚进军和有效地支援忠于沙皇的军队。1918年11月，日本在那里的兵员已经增加到73,000人。他们的将帅们也已认识到，对沙皇军队的一次直接援助，比单纯想让德国军队遭到一次失败的愿望要现实得多。

但有些谣传却很使日本人担心：美国和英国对俄国这场内战愈来愈不感兴趣，甚至比这更糟的是，由于美国坚决要求，英国竟意欲同日本中止联盟关系。日本情报机关怀疑这是布尔什维克的一个阴谋，其目的就是挑拨日英关系，同时还使日本同各协约国之间产生不和。

1919年4月《北京时报》披露了德国和日本之间的一项秘密协议。这份协定的细节是意味深长的：德国和日本双方都应帮助白俄战胜布尔什维克，日本将帮助德国在波斯和中东开辟一块自由行动的领地。这样一份条约便意味着，日本将在满洲、韩国和中国的北部取得很多特权。

尽管这一切没有能够实现，但这件事的暴露却使日本受害匪浅，特别是被西方新闻机构得到这些材料时更是如此。根据该协议的某些条款精神，日本情报机关首长中岛正武将军接到命令便奔赴远东前线。不久，大批日本情报军官源源开赴俄国、中国北部、蒙古和满洲等地去搜集情报。我们可以在这一时期的陆军部的档案中看到有“为在远东的情报工作提供经费和在秘密经费中拨款”等记载。

日本的秘密情报机关成员（它有别于各秘密会党所领导的那些半官方的会众）是在所谓“元帅府”的幕僚们监督之下工作的，幕僚们负责监督他们在西伯利亚的活动，因为在那里日军总司令部和情报机关的外勤人员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

系。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俄国东部叶卡捷琳堡的郊区建立了侦听站，因为在这里监禁着沙皇家族的成员。有时候日本间谍也藏在村落里活动，但最经常的活动方式则是在日本驻该市的商务代办处里进行。

现在已经很难说清谁是这个使人难以置信的解救俄国皇室计划的原始倡议者了。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这些国家或多或少都与此事有些瓜葛，但在这些国家各自的档案中看到的材料或是残缺不全，或是根本没有，或是已经过篡改了。

这里有两个根本问题需弄清楚：第一，不管沙皇家族最后的命运如何，不能推翻的事实是，由索科洛夫法官对此事做出的解释是不准确的，也是不可信的。第二，根据最近50年来流传的资料来看，沙皇家族已全部被拯救出来了，执行拯救任务的是由英、美、日三国共同组成的一个绝密行动组织，沙皇家族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获得了自由。然而，以上的传说是没有根据的。

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官员罗伯特·维尔顿保留了一份原始档案资料，有关索科洛夫的档案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整理出来的。这个历史资料中，最引起轰动的部份，是它证明了这位俄国法官企图匆忙让这个皇室家庭消失。

“有一个证据，根据这个证据，那些公主们在被所谓的执行死刑后，仍然活在人世。”

我们不应该忘记，原来制定的拯救计划中，打算最少要救出3至4名皇室成员。日本人曾积极地参与了这一工作。在所有与此事有关的国家中，比较起来日本人是最有理由希望这一拯救行动获得成功的国家，因为如果罗曼诺夫家族依然在世，并且沙皇能够重登皇位的话，那么日本对于西伯利亚、蒙古和满洲的“伟大的梦想”的实现就是指日可待的事。

但应说明的是，这只是由那些极右的民族主义分子们酝酿出来的一个荒谬的梦想而已。即使沙皇重新执政，这个计划最终能否实现也是难以预料的事。因为纵观俄国的军事历史，不得不使人想到，沙皇的对外扩张政策，同苏维埃现代帝国主义一样，也是十分顽固的。当前的事实证明，苏联对日本也取敌视态度。

但是，这一近于幻想的梦想，也有几分根据。因为日本比起任何其它国家来，在做这件事上，以及同白俄商谈订立什么条约上，都更具备有利条件。布尔什维克对于美国在俄国的外交人员和其他人员，均取不信任态度。英国人在俄国很有一批优秀的间谍人员，但都被“虚弱的”劳埃德·乔治政府给撤掉了。法国人的情报是很灵通的，但在执行类似的、近乎虚无飘渺的行动时，便显得过于讲究实用主义。只有日本，他们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的特务是常住俄国的侨民，并且他们还掌握了布尔什维克所有这方面的密码电报。因此，与其它盟国相比，日本人要有利得多。

在第一批关于罗曼诺夫家族越狱传说的材料中，有一个是来自东京。1919年《泰晤士报》驻东京记者写道：“记者从可靠消息来源获悉，沙皇仍在人世。他现正被囚禁在克里姆林宫，是化装成商人后被人带进去的。其眷属则被软禁在特曼伊斯克——塞尔捷夫斯基的一座寺庙内……在叶卡特琳堡被处死之说，纯系蓄意之欺骗。”

这一消息是在罗曼诺夫家族于1918年7月16日被宣布处决以后的第7个月登载出来的。关于这条消息的来源，外人不得而知。1918年夏季，东京的情报往来十分频繁。根据当时的一些报告看，日本人当时试图通过外交途径来使沙皇获得自由，倘不行，便通过秘密行动解决。其中间人便是季米

特里·阿布里科索夫，他是米歇尔大公的密友。直到1925年日本承认苏维埃政权为止，此人都在东京担任沙皇驻日本的代办。

在叶卡捷琳堡郊区有一座城堡，它被认为是日本商务代办处的掩护所。有一小队步兵严密地警戒在城堡围墙的外面，任何一个俄国人都不准入内。但有一个神秘的人物却经常出入这个城堡，他便是大名鼎鼎的黑木为桢上将的侄子、日本情报机关军官黑木近义参谋。此人在1904到1905年日俄战争时，表现得非常出色。所谓参谋，实际上就是日本帝国军队里的军事顾问。这种头衔常常起到掩护某些军官执行其真正使命的作用。自1917年以来，黑木近义就担任了白俄同日本情报机关联系的牵线人。后来他离开了这个岗位，据他称，是因为政府不愿意接受他主张的那种更为“亚洲化”的政策。

自那时起，他的工作便披上了一层更加神秘的外衣。他在西伯利亚以谢苗诺夫的顾问身分定居下来，谢苗诺夫是白俄哥萨克骑兵部队的一位将军。还有一位名叫黑木新圭的上尉，也替谢苗诺夫工作，……那么这个上尉是近义参谋的亲属吗？……据某些人说，他们是父子关系。

黑木近义参谋肩负着设法使沙皇获得自由的重担。为了选择一个适宜的时机，光酝酿讨论就持续了好几个月，最后确定在1918年7月初行动。计划是先用卡车把沙皇家室的成员送往日本的那家“商务代办处”去，并暂时留在那里，等到日俄组成一个联合护送队后，再把他们送往日本的郡衙。

季米特里·阿布里科索夫在给谢苗诺夫将军的一封信中，曾含糊其词地透露过一些关于这个计划的情况：“请您尽一切努力把西伯利亚以及那个地区以外的交通线路详细情况

告知黑木近义上校，并把下列这一令人气愤的事情也告诉他：我们领土的某些地区似乎已被敌人控制了好几天了，并且在下周它又将改换主人。这一切使在东京的那些尽力安排我们未来的尊贵客人进行一次绝对安全的转移的人们深深感到不安。”

这封信证明了阿布里科索夫希望能在东京的俄国（沙皇）大使馆里殷勤地接待沙皇。我本人也曾研究过有关案卷的影印本、某些密码电报，以及其它一些所谓的美国驻叶卡捷琳堡的代表同华盛顿美国国务卿之间的来往文电。但我在白宫和国务院一系列的调查却一无所获。面对着这一大堆“档案”材料所提供的情况，国务卿本人也同样感到迷惘。据我个人的看法，其中仅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即提到拯救行动的那些材料，其中许多假材料都是被故意放进去的。但是，为什么？又是谁干的？

我建议，只把看来是真实的档案，即记载着某些细节情况的那些材料留下，并把它们送到日本去鉴别。其中1918年7月10日的一份信件写得很清楚：“这一计划迫在眉睫，今天我拜访了此间的参谋长，他出色的英语使我们之间的交谈进行得十分清楚明白。他的职位相当于日本帝国军队的一名上校，名叫吉木。”（原话）

此人似乎肯定就是黑木，尽管该信的书写者没有把名字拼写准确。另外上校一衔也的确是黑木的相应身份。第二封信是1918年7月15日，是美国驻叶卡捷琳堡的代表写给美国国务卿的，此信声称，把“从居住地转移到另一安全地点”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会同日本有关方面做好了。最后一封信还提到为采取这一行动所需的经费，“均由日本天皇陛下提供，共约75,000美元左右。但这些仍不够用，总数至少需要

20万美元。”

我们可能永远也搞不清楚这个拯救沙皇计划的准确而真实的情况了。但不会有问题的是，在这一行动中，日本担当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现，那么它将是当代秘密情报史上的一大杰作。笼罩着这一事件的气氛是那么神秘，因此，这一行动有很大可能是由政府或是军方单独实施的。日本版的《名人录》上有一个条目使我深感困惑，上面写的是黑木参谋后来离开了军队，因为政府对他的建议不予重视。那么所谓他的建议是否同拯救罗曼诺夫家族有直接关系?一位日本的老外交家兼历史学家风敏和曾说过，有一位名叫瓦西里·雅克夫列夫的人“曾经起意把沙皇家族成员转移到鄂木斯克以东很远的地方，并曾和白俄军队联系，以便把他们送往日本。”

根据这位外交家的这一说法，我们可以认为，在黑木和雅克夫列夫之间是有着秘密联系的。但是如果这一说法被确认是可靠的话，那么另一个疑团又使人不得其解了，即雅克夫列夫是何许人也?他在1918年4月到达叶卡捷琳堡附近的托波尔斯克把一份报告交给地方当局，并自称是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的特派员，前来托波尔斯克执行一件绝密任务。这个绝密任务就是要把沙皇从托波尔斯克转移出去。雅克夫列夫成功地让沙皇登上去莫斯科的列车。但他的做法却是，“让火车按相反的方向开往鄂木斯克，并把车上灯火全部灭掉。”

于是，他受到了怀疑，上级命令他把沙皇重新带回叶卡捷琳堡。他被指控有背叛行为，并无法为自己辩解。对这一异乎寻常的事件，苏联官方的提法是：雅克夫列夫确是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特派员，但后来此人叛变了。第二

种说法却与上面说法相反：有一个名叫索科洛夫的人，此人可能是德国特务，但却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一说法，也有人说索科洛夫是立陶宛一位名叫札林的工程师的儿子，他在1905年脱离俄国海军以后改名为雅克夫列夫。同时也有人怀疑他是英国派往俄国的间谍。更有甚者，有人说他在加拿大可能同住在西海岸的日本侨民有过联系，是由这些侨民的介绍，他才在满洲地区为日本充当了间谍。

唯一能对这些神秘现象做出解释的，就只有雅克夫列夫本人了，但此人已经彻底地消失了，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信息。

在那些流传的假文件中，有的说罗曼诺夫家族仍然安全地生活在俄国以外的某个地方。其中有些材料是苏联在20年代初期的东西，那时俄国人在反情报方面已取得了很大进步。无疑，日本军队在俄国远东地区的驻扎，对俄国的政治制度的威胁，远比英国、法国乃至美国要大得多，因此，苏俄的宣传矛头便专门对准了日本。同时，俄国共产党人的企图也是要在这个国家制造混乱。对罗曼诺夫家族拯救工作的"消毒"运动以及日德之间签订的秘密条约也便是这一巧妙的神秘事件结出的果实。尽管没有任何人一开始就有这种打算，但最终形成这个结果则是完全可能的。最近有关这些事的一些资料又重新出现了。据这些材料记载，苏联人的目的是想把历史学家的头脑搞糊涂，并意在欺骗那些希望罗曼诺夫家族永远活在世上的轻信者，因为这样对苏联的事业有利。

第十一章 “战斗的波涛”

“‘战斗的波涛’指的是旨在把中国当成他们的狩猎场的一些高级人士。”

——泰德·奥康罗依

泰德·奥康罗依教授有一段时间曾在东京大学任教，并娶了一位年轻的日本贵族小姐作太太，他对日本这个国家有着真挚的爱，但对日本的民族主义者，却从各方面都抱有偏激的仇恨情绪。在他1933年出版的《日本的威胁》一书中，他任凭自己那种仇恨情绪肆意发泄而置大部分积极因素于不顾。因此他不能算作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各种事件的一个客观的见证人。但他对“战斗的波涛”的意见还是对的，他对“战斗的波涛”的确切解释是：“战斗的波涛”是指旨在把中国当成他们的狩猎场的一些高级爱国人士。

“战斗的波涛”直接脱胎于封建主义，他们确实同波涛一样起伏和动荡……人们利用他们充当特务。“战斗的波涛”中还同时包括有极端民族主义政治家。这些人管辖下的特务及秘密会党组织，在国内继续发展壮大着。“黑龙会”，“血盟团”，“政界爱国同盟会”，“樱会”等等都是这个组织的一部分。然而要明确地说出，哪些人是“战斗的波涛”成员，哪些人不是，却又使人感到非常困难。自日俄战争开始以来，他们便在中国，在满洲地区，有时也在蒙古从事间谍活动。

他们大都扮作低下的小市民阶层以为自己的活动作掩护。如化装成办公室的雇员、农场的临时工、江湖术士，甚至香客和乞丐等。很明显，他们是得到了日本国家情报机关的资助的。但“奥康罗依”却提出，他们把自己的收入汇拢起来，用以开设妓院，拐骗良家妇女为娼。在20至30年代，黑龙会无论从人数上，从力量上还是从政治影响上，都有了很大的加强。在内田良平的控制下，黑龙会鼓吹的是：“我们将革新目前的社会体制；我们将通过向海外的扩张来支持政府的外交政策；我们将对社会政策进行革命以提高人民的福利；我们还将解决工作和资金问题。”

上面这些话，完全不象极端主义分子的语言。那些极端主义分子很善于用几乎是慷慨大方的语气宣传他们的社会政策。但他们把间谍工作同海外扩张政策混在一起，搞这种危险的游戏，那就大错特错了。在西方国家，从来没见过一份有关这种秘密会党活动的记录，只有象日本这种社会里的会党，才允许它的成员投身于爱国事业中去，即是说，在亚洲大陆搞扩张政策。如果把它们同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意大利的黑手党相提并论，那将是不恰当的。

然而，在黑龙会和纳粹分子之间，确实存在着秘密联系。它们的中间人就是唐·加托。此人是东京新闻界的负责人，在一段时间内，他曾是内田良平的亲密合作者。然而，黑龙会究竟同纳粹党之间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从某些方面看，黑龙会的基础更加沙文主义，更讲江湖义气，而且不论是对左派的革命党人、对反动分子，还是对愚不可及的自由主义者，它都一视同仁，都利用他们，只要这些人能为它所用。有一个名叫拉希·贝哈利·博斯的印度恐怖分子，他曾掀起过一场反英运动，于1915年逃往日本避难，被富山睦

保护起来。富山睦不仅让此人成了一个日本的国民，并且还把他接到自己家中去住，还把自己的孙女嫁给了他。

从此这位前恐怖分子就变成了日本特务，并且参与了"泛亚大同盟"的组建工作，这一活动同样与黑龙会有关。尽管如此，博斯作为这些组织筹划的各种活动的参加者，他的年令是太大了。尽管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曼谷为日本人工作，最终还是由另一个人冒名把他顶替了下来。这个人的名字叫萨布汉斯·钱德拉·博斯。他也是一个反英分子，是日本人把他从柏林召来的。雅利安军是一支反殖民主义的亲日军队，是日本人一手组建起来的，这支军队的领导人叫雷加·马汉德拉·普拉达普。但这支军队又被"印度独立同盟"所兼并，而"印度独立同盟"又是老博斯（即拉希·贝哈利·博斯）所创建的。

自从英日同盟破裂以后，在日本的民族主义分子中间反英情绪日益高涨。而黑龙会又把大不列颠所有的对手都看作可以与之成交的朋友。它通过巧妙的手腕颇拉了不少这样的人站到自己这边来，从而使这些人成了它的积极的同谋者。其中之一就是那个情感矛盾的骗子伊格内修斯·蒂莫西·特里比彻·林肯。此人原是匈牙利的犹太教徒，但他却经常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同他随时都可能改变自己的国籍一样)。他出身于一个循规蹈矩的犹太教家庭，但他在年轻时就参加了一个反正统的宗教团体，后来在加拿大成了英国国教徒，继而先后在英国肯特郡的阿普特莱多尔当神甫，参加"公谊会"(1)，又披上佛教的黄色袈裟，最后又托人替他加入了英国国籍，并被选为议会的自由党议员，是达林顿派的代

(1)公谊会又称教友派，是十七世纪创立的基督教的一个教派。——译者

表。

当他在西班牙的加利西亚地区和罗马尼亚做石油投机生意时，赔了一大笔钱（都是从朋友处借来的），从此，他的政治生涯也便突然中止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他志愿到英国海军情报处工作，但他同时也替德国当间谍。为了躲避英国的逮捕，他逃往美国，但终于被引渡到英国。在英国，他并非被指控替德国人当间谍，他的罪名却是制造假银行支票，这实在大出他的意料。他被叛处3年监禁，然后被遣返到他的出生国匈牙利，但他认为无法忍受匈牙利的共产主义制度[1]，于是又逃往德国，在那里参与了一个右翼集团酝酿的政变。后来，政变失败，他又在1921年同中国政府建立了联系，当时他以佛教徒的身份作掩护，开始为被英国幕后所支持的军阀吴佩孚工作。关于他的记载十分混乱，据一份文字资料载称，林肯可能是被中国特务机关雇用打入吴佩孚内部搞情报的，但他的传记上却写着他是在中国的德国特务，同时也为英国工作。必须指出的是，不久以后日本向吴佩孚建议，让他出任中国新政权的首脑。林肯很可能也是参与这一事件的人物之一。可以肯定的一个事实是，最终他还是叛变了他的那些主子。

日本人同其他人一样，也对林肯的真实意图有怀疑。他是亲德的吗？亲布尔什维克的吗？亲日的吗？还是亲华的？或者仅仅是反英的？甚至可否干脆称他为反西方派？1926年，他以“照空（音译）大师”的名头出现。同年，他那个在英国皇家炮兵部队服役的长子以杀人罪被判刑，他意欲以上述假头衔返英，但英国拒绝其入境。次年，他又恢复了他一开始的身份重返

（1）指1919年3月21日成立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这个政权仅存在了133天便被帝国主义者颠覆。——译者

欧洲，在那里进行了所谓的为中国借款400万英镑的谈判活动。

这期间，日本特务已经监视了他很久。知道此人奸诈而虚伪，但他们仍然认为可以利用他为自己做事。从某些迹象上看，此人是在玩着两面手法。后来他到了阿姆斯特丹，但仍然同荷兰驻北京的使馆保持密切联系。中国的废帝溥仪在定居天津的日租界以前，就曾在这个使馆里避过难。中国人怀疑林肯也在为日本人服务，他们的怀疑在1927年得到了证实，那年他被派往欧洲去结算第一笔向中国出卖的军火帐目，他却把那笔钱给扣下了。

蒋介石的一位前情报官员曾对我说：

"林肯甚至在他已年事很高时，在我们面前仍然很谦虚。当时我们已经得知他是支持日本人的，尽管他为人不够坦率，但我们对他的了解仍然胜过你们这些西方人……如果换成你们英国人，肯定已经把他抓起来了。但是如果把林肯关起来，那我们就什么也学不到了，如果给他自由，他就能教会我们许多东西……只要当时还同日本人联系，我们同日本人之间就需要有一个媒介。然而，他在那段时间里，并没有向我们提供多少情报……我们同日本斗争已经好几年了，日本是不想同我们讲和的，但是通过林肯这个媒介，尽量争取一个有利于我们的解决办法却是可取的。"

据最后的消息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林肯在新疆电台做宣传工作。1943年10月，日本的一家通讯社宣布他死在上海，但"林肯的传说"却仍然在传播。1947年5月5日，路透社和锡兰的《时报》说，他仍然活着，因为有一位记者曾收到他的一封信，邮戳盖的是孟加拉湾。

在二、三十年代，日本秘密会党的活动迅速加剧，它们

对于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情报网做出了宝贵的贡献。由于这些秘密会党活动的形式多样，因此它们很容易招收一些象特里比彻·林肯、两个博斯，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反对西方的人物为自己工作。因为这些人也很容易被“在日本保护下的繁荣的亚洲”这个形象所迷惑。我们已经看到，在距那时的30年以前，明石上校是如何在亚洲各地到处奔波同穆斯林团体建立联系的先例。他死后一年，“战斗的波涛”又开创了一个新阶段，并创建了“白狼会”，吸收了大批军官参加。这个小团体，创建之初仅以宣传鼓动为目的，但到后来竟发展成一个名符其实的恐怖组织。还有一个名叫“土狼会”的组织，他们活动的方向，主要是联络俄国的和土耳其的穆斯林人。

“土狼会”开始时，与外界并无联系，主要是由各地流亡到匈牙利的穆斯林人在布达佩斯筹划成立的。1920年，该会的一个领导人前往日本，同原“玄洋会”和“黑龙会”的成员取得了联系。后来“白狼会”的成立，就是这些人研究讨论的结果。他们之所以起“白狼会”这个名称，是出于土库曼人的迷信心理，因为土库曼人认为自己是“白狼的后代”。几年以后，俄国的穆斯林人在东京定居，另一个“土狼会”也便在东京诞生了。在日本人控制下的这两个会的会员，同在布达佩斯的那个“土狼会”和在土耳其的“灰狼会”都有联系。

因此，日本人便可随心所欲地利用这些会党为自己服务，便能在土耳其和匈牙利建立起许多情报网。日本人的目标有三个：保护中东和俄国在亚洲的穆斯林；尽可能多地搜集布达佩斯、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的情报；最后，尽量增进伊斯兰教徒——日本人之间的友谊。

“黑龙会”还把它的秘密活动渗透到中国。在两次世界大

战之间，它对在中国的某些秘密组织控制得尤为严密。其中有一个名叫“基础团结之路”的团体，它是一个属于佛教体系的宗教组织，在中国的北部，在天津和南京吸收了许多信徒，它公然宣布为日本利益服务。

著名的激进分子汪精卫，他原是孙中山的老搭挡，后来投靠了日本。作为中国南方傀儡政府的一个首脑，他依靠的是在他管辖区内活动的那些亲日的会党。其中一个就是“洪门三合会”。其中许多会众都是在日本的中国侨民。这就使得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能够在英国殖民地香港建立了第五纵队。这个“三合会”在当时那个时代，势力非常之强大。因此，当香港被日本占领之后，这些秘密会党的头头们都答应日本特务，可以向日本提供能够搜集得到的任何情报。

在这一时期，“战斗的波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有富山睦，内田良平等人，此外还有狂热分子井上日召……在这个链条上，有一个中心环节，就是广田弘毅。他是黑龙会会员，在对外事务方面有出众的才能。他曾在1936年英国船只“莱迪勃德”号被炸以后，亲自到英国驻东京大使馆表示歉意。

井上日召是“血盟团”的领袖，自从他带着让日本控制中国的愿望在中国进行半官方的活动以后，便当了“日莲宗”教派的和尚，成了著名的激进民族主义分子。他在中国满洲地区从事间谍职业时间很久，他的最主要的杰作之一，就是创建了一所名为“护国堂”的学校，这个学校的训练目标就是培训狂热的极右分子。在他的领导下，他的学生们曾于1932年密谋对20名政界要员进行暗杀。这一阴谋活动在日本情报史上，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空前的，而其动机则仅仅是被狂热的爱国动机所驱使。结果，只杀了两个人事情便告暴露。井上

日召及其同伙本打算到富山睦的住地躲避，但仍遭逮捕。富山睦虽有巨大影响，但仍然未能使他们逃脱法律制裁。井上日召被判处永久监禁。后于1940年特赦获释。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以后默默无闻，至1954年，据某些人说，他又组织过一次民族主义运动。

内田良平曾不止一次地受到警察的监视，理由是他被怀疑有暗杀企图。的确，在那个年代，由秘密会党作掩护并与一些军官有牵连的暗杀活动，已经成为日本国家的严重威胁。所有年老的狂热分子领导人都疯狂地想要把他们所有的反对者给“清洗”掉。如果军队里发生了叛乱，这些叛乱分子马上便会被会党的头头们所利用。这种令人头痛的现象，到1935年8月相泽中校持枪闯入永田少将办公室行刺，已达到顶点。

日本官方情报人员对这一形势感到非常棘手，因为秘密会党使用政治暗杀这一武器，同时也损害了他们的同胞。

内田良平卒于1937年。他死后由九藏义久接替他主持黑龙会，九藏义久同时也是“帝国法律声援会”的领导人。黑龙会继续培养年轻的间谍人员，在东京开设了两个专门的间谍学校以传授间谍技术。

广田弘毅是黑龙会在这一恐怖时期能够采取忍让和克制态度的极少数会员中的一个。他曾任驻莫斯科大使，在其任期届满后担任了外相。他在外相任上很受西方大使们的欢迎。毫无问题，他比起富山睦和内田良平来，更为能干，也更加稳重。他对苏联表现出强烈的敌对态度，这种态度的代价，使他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广田弘毅于1947年以“战犯”罪名被判处死刑，那是因为苏联有效的外交压力，使他没能得到减刑判决。

第十二章　土肥原将军和川岛芳子

“他的作用是，制造混乱局面，然后再把这种局面平息下去，以使日本人从中渔利……他的办法是，到那些政局不稳的混乱地方去，与当地的民众建立联系并取得他们的信任。”

——约翰·根室

土肥原贤二将军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成绩最为显赫的情报专家之一。世界新闻界称他为“满洲的劳伦斯”。这对土肥原来说，显然是不合适的，土肥原比起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上校在阿拉伯的所做所为要残忍得多。但是最近那位大名鼎鼎的爱德华的传奇故事却被玷污了，因为最近从许多方面透露出的情况说，爱德华竟是一个最大的骗子。于是土肥原便成了日本在满洲地区不可争议的、最为显赫的情报部门的中枢人物。

除此以外，土肥原尚有其它过人之处：他是一位很有外交才能的军人，嗅觉灵敏的政治家。这种类型的人在军界堪称凤毛麟角。此外，他还是一位能力出众的实干家（行政事务专家）。他善于恰到好处地使用各地送到他的司令部来的各类情报。

他于1883年生于日本冈山一个清贫的民家。但他却从不把自己贫贱的出身视为在军界向上爬的障碍。他在军校学习时，对各门课程都表现出超人的才能，在同期同学中以第一名的成绩结束了学业。他对语言上下的功夫尤深，能讲一口十分漂亮的汉语，这些就很自然地决定了他将在军界从事间谍工作的命运。

开始时，他是慢慢地，也是正常地沿着晋升的台阶一级级地向上爬，并没做出什么惊人之举。许多事他都是只在幕后活动。他慢慢地不仅成了中国通，而且还成了满洲事务专家。满洲对他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还在很年轻时，他就曾梦想有一天能看到满洲这块土地成为大日本帝国的一部分。他在中国居留了许多年，不仅使他的汉语水平进一步提高，并且还学会了许多地方的方言。他身体结实而肥胖，留着“标准的”小胡子，性格开朗，富有教养，这使他能够很容易地便和别人交上朋友。然而，他这种善于同社会各阶层打交道的才能只是他的伪装而已……。

在西伯利亚战争中，他把一个情报军官应处理的各类问题，都同政治问题作了深刻的比较。当时他又遇到了另一个不久晋升为陆军大臣的阴谋家，即板桓征四郎。日本在1922年自西伯利亚撤出以后，西伯利亚——满洲政策的中心策划人物名叫张作霖，此人站在日本方面同俄国人作斗争，并被认为是保护满洲利益的关键人物。

原英国驻东京大使罗伯特·克雷吉爵士对土肥原贤二的评论是：“历史将会明白无误地表明，日本的殖民主义政策就是不断地在中国制造‘事件’，就是不择手段地进行挑衅行动……在所有的阴谋活动、阿谀谄媚和威胁利诱中，有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并为日本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人物，此人就是

土肥原上校……当他悄悄地，不动声色地到达某个地区时，可以肯定地说，这就是那个地区将发生动乱的先兆……他的手法绝对灵活，通常是他非常巧妙地在中国人中间制造不和，然后再利用这种不和为日本的入侵铺平道路。”

但上面那些话也并非十分合乎实际，因为在中国和满洲地区，军阀政客们互相间的挑衅和阴谋活动是早已有之的，那些人把时间都用在如何实施阴谋诡计和互相攻击上，这也是引起局势动乱和互相猜疑的原因。他们今天投靠日本，明天又倒向俄国，各找自己的后台。土肥原便是善于利用这种局势为日本渔利的人。如果他能够和中国人这样应酬下去而不去参战的话，他的计划就有可能实现。实际上，他每次到那些局势动荡的地方去，其唯一的目的就是争取同盟者，意在用和平手段把中国这个国家给殖民化。有一次，他没费一枪一弹就几乎把中国北部的五个省份给分化出来，其手法仅仅是通过半官方的谈判。当时蒋介石正忙于和共产党作战，在进行着另一场战争，无暇它顾。

土肥原贤二还企图协调其国内所有有威望的人物共同加强日本在满洲的影响，但这一尝试并不尽如人意。因为他的那些同胞们在如何加强这种影响的做法上，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甚至有的人竟不惜单枪匹马地搞自己那一套危险的把戏，那些人为了争取土匪军的支持，或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意志，他们从单纯地搞暗杀直到收买中国的公职官员等各种手段都可以使用。

有一个名叫“颅骨的呻吟”的恐怖小组的成立引起了问题，于是他们便象做文字游戏一样，随便抽了一个词作自己组织的名字，这个词叫“卡库梅”，意思是“革命”，于是这个组织便叫“卡库梅皂”（意即革命吧）。这是一个反俄组织，它

的头头是个很爱冲动的年轻人，名叫摺立肇。他在中国干过许多事情，其中包括讹诈和绑架。土肥原是这个组织的死对头，其他日本军官大部也对该组织持对立态度。

日本人还策划了一项令人吃惊的计划，对这一计划，西方人一无所闻。这个计划就是把在俄国的犹太人迁到满洲去。当日本人还在西伯利亚作战时，他们便已感到了俄国人反犹太宣传的尖锐性，这种反犹太宣传是日本的同盟者白俄人掀起的。当时日本人便马上决定成立一个研究小组，对这个问题给予进一步的分析。他们认为其白俄盟友在这场令人反感的攻击犹太人的运动中走过了头。此外，日本人也看到了有相当数量的"赤色分子"也是犹太人……日本人对犹太人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其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国内几乎没有犹太人。日本人震惊于犹太人出众的智慧以及其在艺术和科学、政治和商业方面的领先地位。但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当时还没有人能说得出来，不过他们却相信，这个问题的解决一定要同满洲问题联系起来。

一个名叫安江典弘的年轻上尉，他原先曾以语言专家的身份在白俄的西蒙诺夫将军身边工作，现在受命同另一名军官一起研究白俄反犹太的宣传问题。在起草上送的报告之前，他们翻阅了自日俄战争以来所有的情报档案资料，发现日本人在暗中破坏沙皇的武器装备等方面的做法，早已参考了犹太人社会主义组织的一些做法。这两名军官后来写出了一个长篇报告，在报告中他们揭露说，所谓《犹太贤哲会议录》纯系伪造。这份报告日本的海军和陆军情报部门于1924年仔细地研究过，并认真地研究过犹太人的历史，随后做出决定要培养犹太问题的专业情报军官。于是，安江典弘便被派往中东，到巴勒斯坦现场观察犹太人的一切。他第一个

提出了独立见解，认为传说的犹太人为统治全世界而酝酿的一个所谓国际性的大阴谋，纯属无稽之谈。他甚至还曾就此问题同戴维·本·格林和钱恩·维茨曼进行过讨论。

日本专门成立了一个犹太事务局，负责同它驻世界各国的大使进行联系，以便协调他们行动方面的情报内容。在蒋介石身边也有一名犹太人情报军官为他工作。这个人名字叫莫里斯·科恩。

日本人在经过深思熟虑以后，便产生了对逃难的犹太人进行帮助的想法。这一想法将会把日本人对满洲的经营向前推进一步，即把流浪在外的犹太人和他们的资金全部转移到满洲，以使在那里的日本人和犹太人一起发展他们的事业。

这一宏大的方案送到了政府最高决策层，他们决定，要严格保密。当时正有人对美国犹太人的院外活动集团进行民意测验，并且已经有一些犹太人移居满洲了。安江典弘的想法是，如果当时的5万犹太教徒占据了满洲这片土地，他就能够轻而易举地使他们成为日本的同盟者。日本人称这个计划为“富古计划”，“富古”日文意思是“河豚”，是一种只有把它体内带有的致人于死命的毒素去掉以后才能食用的鱼。这就是说，日本人把犹太共产党人比作河豚体内的毒素，只有把他们这些“毒素”除去，才能实现日本人时刻都在念念不忘的这一伟大计划。

到1934年，这一计划的进展已变得十分迅速了，以至日本外务省竟提议，可以让在希特勒迫害下幸免于难的5万名犹太人迁往“满洲国”——满洲地区的新名称。这时安江典弘晋升为上校，他觉得谈判进行得太慢，便邀请犹太人团体的领袖亚伯拉罕·考夫曼访问东京，以加快会谈的进度。他本人则前往美国交涉在“满洲国”和在中国的殖民地的一些问

题。犹太人被准许有宗教信仰自由和选择自己教育体系的权利，但前提是需在日本的监督之下。安江典弘表现出对犹太人极大的支持，他甚至提议，让犹太人实行自治，但这一提议遭到了日本军方的否决。如果这一大胆的计划能够在1935年实现的话，得救的就不只是5万犹太人了，它将会使100万犹太人免遭毁灭性的灾难。这样，美日冲突也会得以避免，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也就不致于同日本人结成同盟了。

由于犹太——美国人代表大会主席拉宾·斯蒂芬·怀斯的心胸狭窄而使得这一行动的许多成功的机会被断送了。1939年，正当日本同意再增加几万名犹太移民时，他却发表声明，谴责所有支持日本这一做法的犹太人。他过份虔诚的心理，使他犯下了一个大错误，当时有许多犹太领导人都发表声明支持日本这一做法，但他却置这些人的态度于不顾。整个1939年夏季，德国和日本的关系都相当紧张，这种紧张关系，本来是很可以被利用一下的，但……。

日本关东军同5倍于己的俄国军队在满蒙边境上作战。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不顾1936年同日本签订的共同反共协定，反而单独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因而在事先未打招呼的情况下违反了协定的规定。在这时，犹太人完全可以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有所行动，英国也完全可以重申它同日本的联盟关系，但都没有这样做。

安江典弘由于失望而深感痛苦。于是便结束了他满洲国政府顾问的职务。在日本投降之前，他把家属送回了日本，之后成了俄国战俘，在苏联西伯利亚强劳营里结束了他的一生，于1950年在那里死去。他的另一位当间谍的同伴犬冢回到了日本，成立了一个名叫“以色列——日本友好协会”的组

织，在支持犹太人方面，此人远没有其同伴安江典弘真诚。后来有人揭露，他曾在战争期间写过一些造谣中伤犹太人的文章，尽管他为自己辩护，说那是为了反对犹太共产党人的，但大家还是要求他辞去了"以色列——日本友好协会"的领导职务。

土肥原贤二这个名字，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在驻北京武官任上被叫响的。他当时是个十分受欢迎的人物。他能讲九种西方语言和四种中国方言。也正是由于他懂得中国方言，才于1920年被派任驻北京武官。当时他是"安福系"(1)的支持者，正因为如此，他才得以说服这个派系的成员把"满洲"和中国的一些土地租给日本。但却因之引起了公愤，安福系也随之瓦解。在这段时间，他利用为他工作的中国变节分子组成了一个情报网。在木可教(2)和哈尔滨的许多妓院(这些妓院同时也是贩卖鸦片的掩护所)都是他的情报点。土肥原支持发展大烟馆，目的是使为日本工作的中国和白俄间谍有一个依附之地。大多数妓女都是白俄人，如果她们能向嫖客卖出6支烟枪，她们自己便可以从中抽取1/6的好处。

在1928年6月到1931年9月之间，满洲地区发生了一系列"严重事计"。1928年6月3日，张作霖元帅被一颗炸弹炸死。此人曾是满洲地区各派力量之间最合适的调停人。在某些军界人士及情报机关中，曾传说他在调节他自己同俄国军队和中国其他军队的关系中，超出了他应做的范围，因而有

---

(1)安福系是北洋皖系军阀政客集团。1918年徐树铮、王揖唐等在北京安福胡同成立俱乐部，伪造选举，并推徐世昌为总统，这一派人被称为安福系。——译者

(2)即我国东北的沈阳市。——译者

时就损害了日本的利益。当他的死讯传到日本后，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日本的关东军是这次谋杀事件的参与者。张作霖被除掉了，日本人便为在满洲的阴谋活动扫清了道路。

张作霖元帅手下有一个名叫安尔托·维斯帕的意大利人。此人曾经是马德拉政府下墨西哥革命部队情报部门的雇员。不久，他于1916年走遍了远东各地，并成为日军西伯利亚作战部队联合情报机关的专员，后来，他又进入满洲督军张作霖的情报机关。由于同意大利政府的政见不同，他一直同意大利当局持对立态度，于是便加入了中国藉。维斯帕认为炸死张作霖是日本特务机关的预谋。他说："炸药放在桥墩下面，但在那地方站岗的中国哨兵，在爆炸发生的几天之前即被日本士兵接替了。"

1946年在对战犯的审判过程中，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了，日本特务犯下的罪行：他们是按河本上校的命令行动的，而河本上校独断专行，做事从不请示上级。

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坚决反日，因而很快便同蒋介石的军队联合起来。这使中日关系日趋紧张。1931年6月，中村上尉和他的三名同事在内蒙古和满洲边境为中国士兵所杀。作为对这一事件的迅速反应，日本人立即对满洲事务进行了极其强烈的干预。土肥原于1931年9月被任命为木可敦市市长。日本军队向该城开进。9月17日，在通往木可敦市的一条铁路上爆炸了一枚炸弹。日本人的一支调查小分队突然同中国军队迎面相遇，双方交了火。战斗持续进行。到了第二天，这件事竟成了日本军事政府进驻木可敦市的借口。

当土肥原自日本返满之后，他带着军队占领了哈尔滨。自那时起，他便成为当地最强有力的、最有影响的人物。他在木可敦市设立了著名的特工科。这个组织负责监督当地所有

的特务活动。他于49岁那年被授予将军衔，竭力进行占领南满的战斗，为建立“满洲国”傀儡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于土肥原的努力，日本人迅速而有效地控制了对木可敦市和“奉天省”的行政监督权。

安尔托·维斯帕在张作霖被谋杀时，正在哈尔滨经营一家电影院。他曾提到，在1932年2月14日，一个日本中尉来到他家，请他到土肥原那里去，土肥原对他一向都很尊敬，当他到达他那里后，土肥原用俄语对他说道：

“我希望您能在我的情报处工作。这并不是向您提建议，而是从现在起，您就要开始为日本工作。我们正在作战，维斯帕先生，任何逃避的企图都将被视为背叛并将被判处死刑。

您俄语讲得很流利，而且还会讲好几种其它国家语言。我的目标就是消灭将来可能不是这个国家真正同盟者的任何一个组织或团体。”

维斯帕立刻懂得了他的企图。土肥原知道维斯帕同许多在满洲国的俄国团体有关系。为了不致引起人们的怀疑，日本人需要有一大批可以信赖的白俄，以各种社会组织负责人的身份出面活动。

“我们需要一些俄国人，以他们的名义来掩护我们的活动，但不一定是知识分子……我想请您担负这个工作，在移民组织中选择一些人……待您把名单确定以后就拿来送我。”

维斯帕首先要开列一份满洲国所有俄国人团体组织的名称，诸如“俄国难民委员会”、“老公务人员联谊会”、“土地所有者协会”等等。移民局是由日本军方控制的；军方除对移民局行使权力外，同时还控制着银行、工厂乃至饭店。移民局无疑是情报机关的核心组织，并且在整个满洲国都有它

的分局。凡是在这些移民局登记注册的移民都必须缴纳税金，这些税金便是这些移民局的间接财政补贴。

维斯帕声称，他受到日本人很好的礼遇，他还是天津情报站站长田中上校的密友。但到1936年，日本对他的态度就变了。他接到通知，作为情报人员这个职业，他可以结束了。他的家属被大连警方逮捕，所有的财产也全部被没收。但他自己却逃了出来。后来，他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出版了，但在书中他对被日本人辞退一事却只字未提。这不免令人感到他的讲述有些言犹未尽……。

土肥原已成为"满洲的劳伦斯"这一神话传说中的英雄，而他手下的一名美貌绝伦的女特务则已在许多报纸上以"满洲的贞德"(1)而闻名于世。对于那些著名的大间谍，往往很难区分哪些是他们的真实业绩，哪些是传说的轶闻。她经常被人们比作玛塔·哈丽，但称她作贞德似乎与她那种"男子形象"的打扮更相称些。川岛芳子出生于满洲，她原是肃亲王的女儿，而肃亲王与川岛浪速是亲密的合作者，因此，肃亲王死后，川岛浪速便收养了她，并给她入了日本藉。

川岛芳子积极支持日本，并成为日本在满洲的一名出色特务。她知道有一个"开山会"，是川岛浪速于1916年为挑起暴乱和建立满蒙帝国而建立的。据某些资料讲，她嫁给了"开山会"里的一个会员，并和他一起在里面工作。另一些人则讲，她在30年代，作为一名独立不羁的人物，十分活跃。她在日本长大成人。日本这个国家，妇女是要绝对服从男子的，但这却没有使川岛芳子的魄力和男子的性格受到丝毫影响。一个和她很熟悉的人说，她"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

---

(1)贞德（冉·达克）(1412—1431）是法国的女英雄。她能率兵打仗，曾立下许多汗马功劳，后被俘遇害。——译者

不可冒犯的性格，她几乎可以说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其举止言谈一半象男子，一半象个女豪杰。尤其喜欢穿男人的服装，一套西装在身，能倾倒所有的男性，倘若混入男子群中，又绝不会有人认出她是个妙令女郎。”

她酷爱冒险，尤其喜欢干男人才能干的事，在这方面总爱与青年男子比个高低。据我的一位消息提供人称，满洲事变以后，她于1933年在上海工作。为回答土肥原的一封信，她出发去天津。清废帝，年轻的溥仪在荷兰使馆躲避了一些时日后也住在天津。土肥原和溥仪自 1924 年起就已是朋友了，因为那一年中国的一个军阀打进了北京，当时溥仪想去英国大使馆避难，遭到拒绝。而英国这一做法却正中土肥原的下怀，给了他一个机会，使他得以连夜让这个废帝离开了北京。这位前皇帝很惊异于何以英国人要拒绝对他的庇护，因为他曾聘请过英国人当他的教师，他本人也是亲英的……当满洲发生动乱以后，土肥原和他的同事们便很容易地说服了这位被罢黜的皇帝，使其同意登上满洲帝国傀儡皇帝的宝座。

1931年，土肥原到达天津不久，天津城里及其附近便发生了骚乱。这时川岛芳子也离开上海来到天津。为了溥仪的安全，土肥原将军说服了他离开天津。还有一种通行的说法是，日本人违反了溥仪的本意，把他挟持到满洲去的。但这种说法恐怕是当时中国出于宣传目的而讲的，到1946年审判土肥原时也仍然用这一说法来诋毁他。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位皇帝正是借助土肥原的帮助，出自内心意愿离开天津的。他乘坐一条日本的小艇到了大连附近的一个海水浴疗养院，就这样跑出来了。这件事是溥仪1964年在自传中说的。

至于为了什么原因他把夫人留在天津，至今仍然众说纷

坛。事实上，她如果落入张学良手中，那对日本人是不利的，因此他们在考虑如何把她救出天津。川岛芳子便被选中了担当这一行动的领导者。她改扮成一个汽车司机，在机枪的扫射声中，从容不迫地驾车行驶在天津的大街上，然后来到皇后的住地，请皇后上了她的汽车，带着她直奔港口。在路上她们曾几次被拦住，由于川岛芳子的沉着冷静，应付自如，她们终于到达了一个平安的地方，皇后被安排到一艘日本反鱼雷艇上。

关于这位漂亮的女间谍，有各式各样的说法在人们当中流传着。有一份美国出版的《文摘》，上面写道："每当日本的某一个作战分队遇到困难情况时，川岛芳子就好似从天而降前来相助。只要她一报出自己的名字，就能唤来胜利，并重振部队的士气。"

有一个未经证实的传说称，是她劝说溥仪当满洲国皇帝的。该帝国正式宣布成立于1932年，溥仪当时对救过他两次性命的日本人十分感激，但对登基当皇帝还是犹豫的。2月29日在木可敦召开了日本人占绝大多数的"国民代表大会"，会上推选溥仪为满洲国国家元首，随后派出6名代表前往旅顺向他报告这一消息，但未受到接见。对于这件事，日本人在2月份以前一直是十分慎重的，对于他们的选举，一直到3月中旬以前都未向外宣布过。溥仪的身份，在新闻界也从未暴露过，只是以一位贵宾的身份出现，被称为"马鲁马鲁萨马"(即"某某先生")。很可能因为川岛芳子的魅力和皇后的获得自由，促成他接受了这一建议。但有一份极不严肃的中文资料却称，溥仪一开始拒绝接受这一建议，后来之所以接受，是因为川岛芳子把一些毒蛇放在他床上，以此相威胁，才使他就范。

不管川岛芳子在这些阴谋活动中担任何种角色，但成功地安排溥仪执政，确实是土肥原的一大功劳。随之而来的，便是他的另一杰作，即：中国华北在亲日派控制下的“独立”。

土肥原在日本关东军的绝大多数军官中，是最讲究务实和最具外交手腕的人。对于某些高级将领的黩武主义，他常常能把他们说服。东京方面也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以防他超越自己的职权。为限制他的影响，日本政府收回了他对中国华北的监督权，并且另在北京也设立了一个特工科，以与原来设在木可敦的特工科互相牵制。1936年，皮戈特将军访问满洲时，曾参观过木可敦的特工科，他在那里看到除了他们“份内的”特务活动外，“他们还把手伸向所有的地方”。不久，他又在北京参观了松室上校领导的那个特工科。皮戈特仔细地参观了该特务机关所有的部门，两年以后又在上海参观了一个日本特务机关。他认为这些特务机关的活动，“无论就其范围还是从其形式上讲，都远远超过了满洲的特务机关。”

不久以后，他又参观了天津的日本特务机关，那是由柴山将军所领导的。这个机关的情报军官们知道皮戈特对日本十分钦佩，便领他参观了计划室，并在地图上向他介绍了天津市区哪些地方是英国租界，哪些地方是法国租界……“恐怖分子控制的地域都染成红色。在法租界中，只有几个孤立的红点，而英租界里几乎被红点布满，就好象身上长了痱子一样。”日本人清楚地知道，皮戈特将军回国以后，将会把他们的不满转告英国当局。

中国同日本之间原先经常发生的局部的、孤立的战争，渐渐发展成大范围的大规模战争。战火在整个亚洲大陆上蔓延着。日本担心苏联人会介入。为了防止这一点，土肥原开

始设法征服马占山将军。马占山当时是中苏边境地区中国驻军司令。开始时土肥原以金钱为诱饵来换取马占山对满洲政权的支持。这一做法造成了土肥原一生中为数不多的错误之一。马占山将军很爽快地收下了他的金钱并答应会见日本特务机关的机关长。但不知为什么他又突然改变了主意，说是烤火时因靠炉火太近，烤出病来了，不能会见。这一脱身妙计被中国新闻界知道了，引起了蒋介石阵营的一片喝采声。马占山把土肥原给他的钱用来装备了自己的军队，以便能更好地对付日本人。不久，土肥原便派出一个支队同他作战，马占山遂逃往俄国，这一做法又构成了土肥原为数不多的判断错误之一。

土肥原被任命为总司令以后，动身去上海。自1938年至1939年中期，他在那里领导着他的情报机关特工科，以操纵中国的傀儡机构。他利用在中国最高司令部内部工作的特务关系，把自己的势力渗透到蒋介石周围。他成功地把蒋介石身边的一个打手黄森（音译）收买过来，仅这一件事就应该给他颁发一枚一级勋章。土肥原把自己能否发现他将要捕获的目标，把他将要吸收进自己特务机关的人的特点、爱好或弱点，都看作关系到自己荣誉的大事。黄森是一个酷爱金鱼的人，每一种珍奇的金鱼他都要千方百计寻求到手，精心喂养。而土肥原又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知识，经常给他传授有关的经验。为了回报他的好意，黄森向他提供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情报。其中有一份中文图表，在这个图表上标明了中国人为对付日本海军，在长江两岸布置的各种军事设施。由于这是一次重大的泄密事件，中国当局发现了他的叛变行径，就把他处决了。还有一份调查报告，根据这份深入调查的报告称，中国有一大批将级军官暗地里为土肥原工作。

不久，土肥原又受命到前线指挥一个师。他是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所犯战争罪行而被处以绞刑的6名高级将领之一。至于川岛芳子，开始时还常传出一些她的故事和传说，随后她也消声匿迹了。1945年11月11日，一份新闻公报报道说："一位漂亮的少妇，在经过长时间的搜寻以后，被中国反间谍机关的军官捕获。"不久，她便以土肥原的同谋者罪被处死了。

第十三章 政治警察

"奥格尔维同学在刚刚3岁的时候，他对一切玩具都不感兴趣，唯独钟情于一面鼓、一支冲锋枪和一架小直升飞机。6岁时，他就玩起间谍游戏来……

"……他11岁时便向政治警察局告发了他的叔父。"

——乔治·奥韦尔(1)

奥韦尔式的"政治警察"这一概念，首见于1984年。这种组织颇似苏联的总参谋部情报局和苏联的秘密警察组织。奥韦尔可能对30年代的日本政治资料掌握得太少，因为他这种虚构的军事组织与现实的日本警察组织有很大差别。

人们往往把日本的宪兵队同这种与其略有类似之处的警察混为一谈，把两者混同起来。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的组织，只不过在行使其职权时互为补充而已。由于这两个组织在许多方面有合作关系，因此在这一章里，有必要对这两个组织一起研究一下。

20年代初，日本政府和情报机关忙于应付由于外国革

---

(1)乔治·奥韦尔(1903—1950)英国小说家兼随笔作家。1922年曾以英国皇家警察身分被派往缅甸，1928年解职。后写了大量的随笔及回忆录。——译者

命的传播和蔓延而引起的社会动乱。而这传播的渠道就是中国和印度。但对日本尤具威胁性的，乃是来自苏联。因为那时已在内战中接近于取得胜利的苏联突然引起了世界上的关注。1922年7月，一小部分日本人在苏联的帮助下成立了日本共产党。1925年是日本受到日益壮大的共产党颠复威胁最为严重的一年。各大学里已开始传播马列主义学说，在京都尤为活跃。不久，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1927年法务省在刑事司下成立了一个政治处。该政治处有两个任务，首先是制止激进分子的颠复活动和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其次是要深入研究这些新出现的学说的不同的政治面目。这个处的主要目标就是同“颠复性舆论”作斗争。这在今天可能产生自统制经济，但在日本当时的那种背景下，人们对此是可以理解的，也并不会把它同纳粹主义相提并论，因为纳粹是要把所有非雅利安人种都消灭掉。同样，人们也不会把它同苏联当时的秘密警察厅进行的政治迫害相提并论。在一开始时，日本政府至少在主观上尽了很大力量来研究分析这些新思想，并竭力设法消除这些思想对大学生和工人产生的影响。尤其注重想出各种办法与这些思想的传播作斗争。有人为求更好地消除危害，甚至试图清理一些有意义的概念。

一个由35人组成的机构开始工作了。他们定期地，系统地向上级提供他们调查对象的详细情况。这些报告内容包括大、中学校的教育界人士的情况，所有左派和右派政党的情况。在必要时，他们还对那些有“不法言论”的分子进行盯梢。为了在法庭上能拿出充分有力的证据，这种警察还依靠其下属各部门专门负责检查工作的特种高级警察署、警察研究院以及一些其它独立的特务机关。这些工作都是政治警察独立进行的，不需宪兵队的帮助。在30年代初期的日本，

一个有效的特务系统，渗透到所有的学校和社会团体，学校的每一个班级都有不为同学们所知的特务人员。这些人定期向上面递送他们老师和同学的各种情况。这些活动的效果，也因学校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京都大学在该市政治警察头子窪田山的直接监督下进行，早稻田大学则由宪兵队对该校充当特务的教员及学生进行监督。

政府当局还有更甚的做法，即鼓励诚实的公民向政府告密，这就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告密大军。而且日本还颇不乏其特有的奥格尔维式的学生。1930年《每日新闻》曾载文称：东京行政当局“非常乐于接受公民的秘密举报”。这就意味着一个全国性的特务网络已经形成，在这面特务网的笼罩下，每个人都在监视着另一个人，并向警方报告此人的一切。

不言而喻，这种在如此广大范围内的“恐谍症”，是导致政治警察官僚机构体系大大膨胀的原因。20年代末，它还只有50个局，到1932年便增长到380个。与此同时，特种高级警察署的地位也更高了。他们同时还利用选举人员进行特务活动，因为这些代表们很容易使本地居民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样就可以从中套出居民们由于出言不慎而无意中流露出来的某些情绪。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一段时期，这种特务制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待到那个灾难性的“邻里协会”成立以后，这种特务活动便发展到它的鼎盛时期。“邻里协会”在每一幢居民楼里都设有分会，每一个居民都要向自己的上级报告所见到的“秘密”、然后再由上一层机构转报到政治警察那里。各分会的负责人不但要把辖区内各居民区的情况向上面报告，而且还要同这些家庭“交朋友”，以便消除他们的所谓“颠复意识”。当日本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当局便利用

这一组织体系实行物资配给制度，并在紧急情况下进行战时训练。

当一个国家掌握了一套过分强大的情报机构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对侦察水平的破坏以及滥用侦察手段的现象。约翰·根室曾说："人们根本无法买到一张日本地图或一张东京市区图。最近一个时期，警察们老是围着古董商店转以便没收刻有代表十八世纪长崎港图案的古物……一个丹麦人曾遭逮捕，理由是他带有违禁照片，那是些什么照片呢？原来是为一个肋骨折断的病员拍的一些X光片。"

某些人显然把这种秘密警察的无能作了夸大其词的描写。奥科罗依教授曾对我说，有一天他的一位女朋友来到该警察署，看到当天的行动命令用粉笔写在黑板上，其中有"库拉柏鲁福布斯"几个字，是用粗体字写的。"库拉柏鲁"意思是"监视某人的举动"，而福布斯先生则是美国驻日本大使。

我们也很难总是相信奥科罗依教授所说的一切，因为他也曾犯过某些判断错误，他所断言肯定的一些事情，也并非都能得到证实。有一次他说："印度在英帝国压迫之下过着水深火热的困苦生活。"我们说，印度这个政府比起已经取得独立的其它政府来，还算是宽厚的，他似乎对于印度人民原先的生活比当前更加困苦这一事实还有怀疑。奥科罗依还表示，日本警察署有一个特工处，它对外国人实行特别监视，从而使这些外国人的生活处于很困难的境地。当代的观察家对此也给予了纠正，因为实际上日本警察署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处。战前政体评论家根室曾经说过，日本的特务们（他们在其它方面表现得非常有礼貌）在火车上就对旅客们实施搜查。但在整个满洲国和在韩国的密探们，作为向导，他们

工作热忱而又有效率。

自1935年至1940年间在日本居留的英国人，不止一个对记者说，日本家庭佣人，有人向他们提出，要求其刺探主人的情况，他们都给以拒绝。有时候他们不得不向其女主人提出，随便向他们提供些无关紧要的“秘密”，以便使他们能够把这些“秘密”报告给警方以完成自己的使命。

这一体制在维持了很久以后，又得到了加强，当局又制定了一些刑事措施。拉塞尔·布赖恩斯曾透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监狱中和宪兵队里，严刑拷打已成为司空见惯之事。然而对此事，康奈尔大学教授理查德·H·米歇尔却认为“在日本的情况根本不可能同索尔仁尼琴笔下的那种可怕情况[1]相提并论，对于个人的教育，日本当局采用的多是鼓励而很少威胁。”

在那几年当中，有一条导线在指挥着这种政治警察的工作。政治警察尽管可能因其干涉主义、统制经济、镇压活动和官僚主义而受到揭发和指责，但却也不能否认它的某些积极方面，它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一个“宁治病而不惩罚”的医生作用。它的信条是：“一定要对某些人的危险思想给以揭露，并指出他何以会有那种见解，努力使他改变认识，清除他的病灶，并恢复他在众人心目中的形象，这要比凌辱他和惩罚他更为明智。”

各种统计数字是支持上述观点的。据《日本时报》的材料，1933年至1936年间，警察逮捕的有危险思想的嫌疑人员不少于59013人，其中包括国家分裂主义分子、马克思主义

（1）这里指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写的一本名叫《古拉格群岛》小说里的情况。该小说描写了苏联古拉格群岛集中营里的一些事。——译者

分子，以及其他有破坏行为的人。该时报还透露，在这些人中，有5000人获释。如果把这一数字同1928年至1941年的统计数字相比较，即可看出，在62000名被逮捕的人员中，继续服刑的只有不到5000人。

我并不想为这种政治警察作辩护，但把真象讲明还是必要的。日本是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现代化强国，现在正在为能在大国的行列中有一席之地而斗争着。在近一个世纪之前，它与外部世界是隔绝的。官方的想法就是，利用政治警察这个“思想的储存库”来分析那些颠复言论产生的原因，以便找出抵制的办法，并对患者给予医治。

这些政治警察们都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目的是想找出它何以能够对大学生们有如此的吸引力。如果某人被认定有现行鼓动罪，或者某人被怀疑有有害思想，他便被告知，将对他提出司法诉讼。但其方式大多是温和的，并力图劝其参加一些正统派组织的活动和团体。对分裂主义分子则以“大东亚共荣计划”为王牌进行说服工作，并以许诺为其谋职作为诱饵，加以说服。官方人士称这种对话方式为“恢复声誉”，宪兵队则称之为“净化活动”，还有一些人把这叫做“洗脑筋”。总之，他们既不使用麻醉剂，也不用电疗等战后通常使用的方法，同时也从不企图使用其它一些手法向对方实行“强制信仰”。

他们这种做法收到了出乎意料的效果。路透社驻东京记者马尔科姆·肯尼迪上尉曾对我说，老的左派分子已经转向了，他们转向国家社会主义，并已变成最激烈的极端主义分子。

政治警察的另一大贡献，就是对情报的搜集工作。通过他们这一条线，大量的情报资料被以极低的代价搜集起来。

根据宪兵队军事警察及其所属的情报处的观点看，这种政治警察很可能会变得更加强大。其中最杰出的军官之一，便是东京地区检查官池田胜男，他对其下属整理出的情报资料十分感兴趣，这就使得这个狡猾的司法人员无需提出诉讼，就可以成功地制服他的犯人。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日本的情报圈子内，作出了许多重要决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几年，山口总司令官被任命为军事情报局局长。1930年，当时他还是中校时，便召集了20几名军官，讨论成立了一个新的秘密团体，他们主要的目标就是想排斥议会内所有的政治党派。该秘密社团命名为“樱会”，会员大多为宪兵队成员。

“樱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成了制造恐怖行为最多的一个团体。它在日本军队内部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是属总司令直接领导下的一个独立单位，直接对陆军大臣本人负责。陆军大臣由于同“樱会”合作，所以拥有了更大的权力。尽管法务省有时候也对军事秘密警察进行干预，但起不了多大作用。实际上法务相很少使用这种权力，也从不做有悖于宪兵队意愿的事。在日本社会上，只有一股强大的势力敢于和宪兵队对抗，那就是帝国海军。海军对陆军和秘密警察中的极端分子十分反感，也绝不容忍他们当中的任何人来干预自己的工作。

宪兵队的人一般在工作时都穿便服，但他们的正式服装是军服，佩带四周绕以树叶的星形徽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情报机关把日本的宪兵队增长到75,000人，其中约1/3为军官。但我们不知道这个数字是否包括了其在国外的工作人员。由于战争的关系，其效率水准降低了，原因是征集的员额受训不足。在正常情况下，其对人员的挑选十分

严格，一些应征人员还来自外务省，因为他们懂外语。申请加入宪兵队者，应具有在军队服役6年以上的资历才能被确认资格。被接受后，先用一年的时间在一所学校内接受训练，学习语言、法律、徒手博斗以及各种间谍手段，经过这一段学习后，新学员便接受考核，其内容为化装进入某一办公室或打入某一工厂等。

宪兵队的任务是，在所有的军人中寻找并发现散布不良思想的分子。宪兵队员可以逮捕比自己军阶高三级的高级军官，并且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立即实行制裁。对于他们掌握有过分的权力以及出现的某些越权倾向，我们也不应否认。但实际上，他们滥用权力的现象并非很严重，这是使人惊奇的。宪兵队除了维护秩序外，还负责审查工作和一部分反间谍任务，并参与政治警察的工作。

他们在国外还设有分支机构。皮戈特曾谈及他1931年在满洲国的亲身经历。当时蒋介石的一位军事顾问沃尔特·斯坦内斯曾与他有过某些争论。他说：

“如果他们怀疑上你了，他们简直就象眼镜蛇。那境况就好象你处于一个漆黑的屋子里，里面却有一条眼镜蛇，但只要你不惊扰它，再点上灯，就行了……”

斯坦内斯是普鲁士军队的一位老军官，他侨居在上海的法租界，当时他极想会见驻上海的日本宪兵司令，目的是向他说明，他的一次同中国记者的谈话内容被歪曲了。在他们相会时，举行过一次盛大的宴会，皮戈特说：“我们在一起吃得很好，……日本的艺妓非常之出色……香槟酒和日本米酒随你的喜爱而任意选择……斯坦内斯向宪兵司令提出，他讲话的译文是经过篡改的，但他仍情不自禁地声称，“日本将会输掉这场战争。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友好地分手了。”

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似乎斯坦内斯都与日本的宪兵队有着特殊的关系。日本宪兵队也似乎对他的坦率很为欣赏，尽管他曾替蒋介石做过事。日本人对德国人的感情是好的，但他们都憎恶希特勒，有一天一个日本人对他说道：

“您亲自到这儿来看我们，这很好。我们这儿有关您的档案材料有两厘米厚，我们曾经想过要把您除掉……但当您向我们宣称，您是一个君主政体的拥护者，并忠于德国皇帝时，您打动了我们，我们认为您有我们日本‘浪人’的气质，我们应该保护您。”

希特勒下令处决斯坦内斯，但日本人却对审判丝毫不感兴趣，并把他保护起来，还通知柏林说，他们已把斯坦内斯置于“无害的”状况之下，这种说法译成德文便是：已处决。

有时宪兵队也使用女间谍或女情报员。诺加米太太就是其中之一。这位迷人的35岁的太太在上海的西方殖民主义者中，素有“眼镜蛇女王”之称，其原因就是因为她是日本秘密警察头子的工作人员。据斯坦内斯说，她的军衔是宪兵上尉，这对当时的一个女人来说是罕见的。

在大战期间，日本宪兵队的工作十分繁忙。这个国家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团结的，由天皇和他的大臣们治理着，但是失败主义分子的活动和社会骚乱等情况随时可见。因此由警方予以干涉十分必要。1943年，作为军事警察的宪兵队，搜查了东京的山野饭店。该饭店中住有战争中的俘虏和其他被拘留的人，这些人也在为日本的“海外侨民办公室”工作，用手写体书写宣传品，并参与电台的广播。同时也参加日本电台办的“零点广播”的音乐节目的工作。常驻该饭店的宪兵队成员在国家安全局的配合下，对这些宣传品进行审查，并利用这些宣传手段作间谍活动，同时也一边对关押在这里的

犯人进行审讯。其中有些人就是打进“海外侨民办公室”里的特务。

他们巧妙地利用“零点广播”这个节目作手段，进行瓦解美军士气的工作。事实证明，他们的打击目标找得十分准确，致使几乎每天和他们在一起工作的《纽约时报》的记者在1943年6月29日写道：“在东京的电台和日本轰炸机驾驶员之间，夜晚并不是单调无味的。东京播放的‘零点广播’节目，在所罗门群岛可以直接收到。我们的小伙子们十分喜欢这个节目，因为他们从这个广播中得到了同情和理解，广播员同他们谈天说地，对他们讲他们非常喜欢吃而又吃不到的菜肴，还谈论他们留在国内的妻子……”

宪兵队对纳粹分子肯定是仇视的。但自从日本站到德国一方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大约在秘密社团和日本的秘密警察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德国在日本的移民，其第一号领袖名叫赫尔·希尔曼。此人是一商业巨头，卸职以后，被一个更加使人不快的继位者所接替，他叫奥托·斯帕汉·约赛夫·梅辛格，即那位著名的“华沙屠夫”。他乘潜艇在日本登陆后，同宪兵队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关系，成了纳粹党远东事务最强有力的代理人，他同时也是把势力扩张到上海去的强有力人物之一。

美国记者F·D·莫里斯在战后发现，在距东京150公里处的山林里，躲藏着2,000名被怀疑为间谍的德国流浪移民。经过调查，莫里斯写道：“在梅辛格上校的领导下，日本宪兵队表现得既卑鄙又凶残。”所有日本的家庭佣人都被组织起来刺探其主人的秘密活动。其中有一个，一天对他的主人说道：

“请您在一张纸上随便写点什么吧，因为我今天必须向宪兵队递交我的报告。”

第十四章　海军间谍在美国

"1936年左右，反间谍活动大大加强了。自1936年至1940年间，在美国就有两起间谍判决案，其中有4人是由美国海军情报署发现的；海军同陆军及空军相比，其作用显而易见。"

引自J·R·格林著《海军情报署的前60年》

1945年，埃伯施塔在关于英国国家安全和情报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海军和陆军的各类秘密情报工作表现一般化。他承认"可以自由支配的经费不足……有很多地方表现为领导不力……经费是太少了……对情报资料的评估又由那些不懂情报技术的军官们去做。"

尽管他对情报工作做了这样的批评，但是，由于海军情报署的主动精神，还是干了几件十分漂亮的工作。这个情报处仅有18名军官，但他们工作却完成得很出色，其中负责整个拉丁美洲的，只有两名军官和一名秘书。

日本人把主要力量放在加利福尼亚海岸和墨西哥湾。日本人认为他们在美洲的情报网，需要其在南美洲和中美洲的间谍人员的支持。只要朝加利福尼亚地图上看一眼，就会明白，他们何以把重点放在海军的理由了。美国的主要海军基地都建立在美国的太平洋沿岸，主要分布在长达1000多公里，宽150多公里的加利福尼亚湾附近。这是一条航道既深，又

没有暗礁的水域。在战争情况下，这一水域对日本来说，将成为与其性命攸关的军事重地。在太平洋上，无论是通过哄骗墨西哥政府进行渗透也好，还是通过其它方法也好，都不能构成对加利福尼亚州的直接威胁。然而，墨西哥湾上的墨西哥海岸，却可以为日本海军提供理想的停泊港。如果他们能找出某种办法对该海湾进行监视，并占领起自圣卢卡斯角的加利福尼亚航道，他们就可以在这一带发动一次战争了。但这一设想乃是纯理论性的，可以肯定，不会有任何一个军人对这一空想去进行认真的思考。这种战略设想可能会给旧金山造成恐慌，而洛杉矶却又能成为日本的一个通向美洲大陆的支撑点，尽管不甚稳固。

日本情报部门当然知道，人数众多的日本移民都居住在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那些地方就是一个日本政府支持者的隐蔽所，在墨西哥方面，也同时会有许多志愿人员帮忙。于是在30年代，一场针对加利福尼亚和中美洲的规模巨大的间谍战，便在自墨西哥到巴拿马运河这条漫长的战线上发动起来。

日本间谍经常用以掩护自己身分的职业是渔民、牙医师或者理发师。他们的计划之一，便是向墨西哥人传授科学捕鱼法。两国政府将就此问题提出一项专门解决的方案，其内容应为：日本人教授墨西哥人捕鱼并对渔民实行监督和管理，而墨西哥则承认日本在墨西哥海岸的某些地区捕鱼为合法化。然而这一方案没有得到具体落实，尽管日本驻墨西哥特使松井为此尽了很大努力。但松井并非一个在困难面前退缩的人。他又转而努力从事在加利福尼亚湾的捕鱼活动。这一地区的捕鱼业自20年代便已发展起来。当松井回到日本以后，许多拖网渔船，英国的旧渔场巡逻艇等都被拉到港口

进行维修。这些巡逻艇上还留有原来的机枪座，因此稍加改造便可装配成为战斗艇，在巡逻艇上还装备了电台。这些船艇的驾驶、维修人员一半是出生在美国的日本人，其余则是真正的日本人。船上的一些水手是由日本军官化装的。其主要任务是监视美国舰船在加利福尼亚湾一带的活动情况。这些小艇一般在80—200吨之间，其最大航程为几千英里。

与这些船只相配合行动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墨西哥海岸上的瓜马斯，另一个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佩德罗一带的咽喉区。当这些日本船队进入瓜马斯港口后，这些船只的船长们便分别进入一家日本人开办的充气饮料厂的各个办公室内。该厂厂长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名叫松宫。距他的工厂不远处，还有一家日本公司，名叫“日本水产公司”，该公司是监督日本捕鱼船队的最重要的公司之一，但它自己又属于一家在墨西哥本土上开办的另一大公司。这个充气饮料厂里的职员经常在“墨西哥南太平洋铁路”沿线旅游，这样他们便可利用远镜头照像机把沿线所有的设备都拍下来。

30年代初期，加利福尼亚湾上的许多岛屿都是私人财产，大多属黄金投机商人所有。在淘金业不景气的年代，这里大部分的私人岛屿便被亏本出卖或者干脆被遗弃了。然而日本人却迷上了一个名叫“德林公主”的了不起的女人的故事。据说，她在加利福尼亚半岛的尖端占据了一个名叫格伦德里纳的小岛，并在那里建筑了宫殿居住下来，同时她还隐藏了许多身穿中国式长袍的“海军陆战队员”和一些舞蹈演员。日本人坚决认为，这件事肯定同某一件十分秘密的美国航海计划有关。于是他们便花时间企图实现一个怪癖女人随着兴之所至干的那些事。但他们却能够把冰岛人南航的这个终点站变成了日本人的船藉港。包括美国渔民在内的当地人

都饶有兴味地看着日本人一边探测着海水的深度，一边不停地核对他们的航海地图，这些日本渔民还互相传递着秘密信息。在1938年以前，他们的这些活动没有引起任何怀疑。但就在1938年，一个美国渔民出于极端的好奇心，想了解一下，为什么他们把一些黄桶堆放在一条船的甲板上。这个渔民发现，桶里装的竟是用酸性物质对沉船进行腐蚀的试验品，于是他便推断出，他们这些试验，将来可以用于破坏军舰使之不能继续航行。

巴拿马运河是间谍活动最要紧的目标，在这一地区，日本人企图建立起一个由附近各国就地来的人员充当情报员的间谍网。这些国家包括尼加拉瓜，哥斯答黎加和巴拿马。1935年在巴拿马城里有35名日本理发师，他们统归“日本理发师协会”管理，该协会的创办人是一名日本间谍。这些理发师统一接受一名漂亮的日本女人的命令，他们负责搜集所有到自己理发馆去的海军人员的情报。

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叫森野的日本人在墨西哥的蒂华纳兴办了一家风力磨房，取名叫“楼上磨房”。这个磨房同时又是个舞厅、酒巴和妓院。一天，一些日本军官们来到这里，姑娘们被命令留在自己的屋里不准出来，舞厅却被布置成了会议厅。不久，人们又得知，此次会议乃是讨论关于在加利福尼亚和墨西哥海岸贮藏供潜水艇用的燃油问题。

约翰·L·斯皮瓦尔曾对这一时期的日本情报工作做过调查，他曾透露，他发现过“化装成铁路工人的日本工程师……在美国南部边境地带的军事战略区域内活动。同时也有一些日本士兵乔装成农场工人，在一些他们能造成极大破坏的地区内活动。”斯皮瓦尔可能对事实有些夸大了，因为日本当局从来也没有准许过日本人在如此大的范围内作战。

但他又宣称，当日本人得知一名洛杉矶警察在银行里存入一笔巨款，并把一个机密情报出卖给一名意大利间谍时，日本人也同这位洛杉矶警察有过接触。其手法是，他们向这个警察谎称想了解美国共产党的情报。

斯皮瓦尔也怀疑，墨西哥斯帝洛将军的未遂政变是日本人作其后盾，同时也怀疑日本人参与了推翻巴拿马政府的阴谋活动，因为该政府曾把日本渔民驱逐出巴拿马海域，并且这些渔民后来也还是经常不断地进入巴拿马海域，又不断地被驱逐。1934年，日本人要求在塔皮拉岛上存放制冷材料，巴拿马当局认为，那样很可能会把该岛变成一个海军基地，于是也予以拒绝。一个在巴拿马经商的日本人，名叫天野义虎，他创办了一个名叫《天野》的渔场，并骄傲地宣称，他的“旗舰”《天野丸》将是世界上拖网渔船中最大的一个，这，他确实是犯了一个错误。他听说美国将计划在尼加拉瓜挖掘另一条运河，而且掘土工程已经在尼加拉瓜的马那瓜军事区开工了。然而他一出巴拿马便被盯上了，并于1937年10月7日被逮捕，其罪名是，曾参与破坏活动，并在禁区拍照。人们常说，运气总是向大胆的人微笑，他竟能成功地使自己获得“无罪释放”的判决。但他却又以同这次一样的理由在哥斯答黎加和哥伦比亚被捕过，但他又都成功地得到“无罪释放”的判决。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间谍！

还有一个贪婪者也在时刻觊觎着美国海军的秘密，这个人就是日本海军中最年轻的少校宫崎敏夫。他于1933年到达美国，在加利福尼亚的斯坦福大学留学。学成后由他在东京的领导推荐，便在日本海军情报局里得到一个位置。他收买了一个名叫哈里·托马斯·汤普森的人作日本间谍，此人原在美国海军中任文书军士。与此同时，又有许多日本军官以学

习英语为借口来到美国。其中大谷稻夫于1936年到达，他也是到斯坦福大学来学习英语的。后来人们才发现，其实他根本不学什么英语，倒是经常去蒂华纳的风力磨房。如果说，不是1932年有一个名叫鸟居的日本留学生死去，并在他身边发现了一个手提公文包，从而使美国联邦调查局对这类事件引起注意的话，大谷稻夫也很可能被忽略过去了。鸟居也是一个海军少校，由于韦勒大街117号一个日本私人诊所的医生深泽说，鸟居身边的包是他的，这才引起了美国警方的注意。

到了这时，警方才抽出时间进行调查，因为当时美国警方的注意力并非全部放在日本方面，而且这次的怀疑也是由于那位医生奇怪的举动引起的。当他到死者身边来取那个包时，他紧紧地把它抱在胸前，好象里面装有什么秘密文件似的。当时警方只是简单地表面检查了一下那个包，甚至连里面装的文件都没有过目。这位日本医生也是斯坦福大学毕业生，已在美国居住了很久了，他是加利福尼亚医生联同会的主席，也是该地区钓鱼俱乐部的主任。到他诊所就诊的几乎全是日本人，表面上看起来，此人很令人尊敬，没有任何理由对他进行调查，但是，1933年他的档案里多了两份别人提供的补充材料，于是联邦调查局便接着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宫崎敏夫不在斯坦福大学学习却和这个医生在联系；第二个“渠道”来自纽约的联邦调查局，那里提供：德国人赫尔曼·温·凯特尔让人印制自己的名片时，名字是自己的，但地址却是“韦勒大街117号”。联邦调查局发现了这一令人感兴趣的事情后，他们对这些人的档案材料开始更加重视了，而且对德国特务的注意甚于日本人。

宫崎敏夫是在美国海军情报署合作下，由联邦调查局抓

住的第一个日本特务。那个被收买的哈里·托马斯·汤普森，当时28岁，是马里兰州的农村短工，曾当过美国海军的文书军士。他原先是个失业者，在圣佩德罗海岸上毫无目的地流浪时，遇上了宫崎敏夫。宫崎收买他的价格是每月500美元，此外还有一些其它费用，在取得美国海军的情报时再另给奖金。于是汤普森便买了一套海军文书军士的制服，假作另一个舰艇上的人员登上停伯在圣佩德罗和圣迭戈的军舰上窥探情况。他向宫崎敏夫提供了美军射击训练的情报，技术改革和技术操作等情报，逐渐地他竟能偷窃到有关军队规章制度的小册子、军事地图和某些计划的草稿等，他把这些东西交给宫崎，宫崎也定期给他在旧金山银行开的户头上存款。

如果汤普森不是由于不慎把自己的活动情况向他的同屋伙伴透露出去的话，那么这种特务活动可能还要继续很久。汤普森有一个同事名叫威拉德·詹姆斯·特恩廷，和他住在一个房间，汤普森对他说，他和一个名叫坦尼的日本人交上了朋友。他那位得克萨斯州的同事对他交上了新朋友并不介意，但使他吃惊的是，汤普森何以能够登上美国舰艇呢？当时他早已不在海军工作了。1935年1月底，汤普森对特恩廷说，他将离开几天，要去圣迭戈的宾夕法尼亚号美国军舰上去找一个老同事。特恩廷想，他去找朋友可能会和那个日本人有关系，于是便决定报告海军情报署。海军情报署对他的讲述非常感兴趣，马上开始跟踪这个神秘的坦尼又名宫崎敏夫的人。他们很仔细地查阅了这个人在银行里的帐目，终于发现了他向汤普森付款之事。

海军情报署向地方当局提出，要求立即逮捕宫崎敏夫，但却遭到拒绝，其回答是：海军当局能做的，只能是命令它的水手们不要同汤普森交谈。尽管海军情报署没有权力进入

汤普森家里实行搜查，他们却安排人员对汤普森倒出的所有字纸篓里的东西进行仔细地检查。在其中的一个纸篓中他们发现了希望找到的东西，这是一封信的草稿，是写给宫崎敏夫的："亲爱的坦尼先生……我诚恳地请求您解除我为贵国服务的工作……我希望过去提供给您的情报，能足以抵偿我的工资……解除我工作的生效日期，将是我们下次最后一次见面之时。"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那个日本人已收到了这封信，因为此后不久，他便应上级之召返回日本，那用意无非是怕汤普森向海军情报署告发他而已。那个美国人被捕了，罪名是非法穿海军工作制服，并把机密文件出卖给外国人，他最后被判处15年监禁。

在出现了汤普森这一不愉快的事件之后，又发生了另一件轰动一时的事件。这次的被告是一名军官，一位名叫约翰·塞默·法恩斯沃恩的海军少校，该军官曾以"多朵"的假名在其挚友中很有声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曾在反鱼雷艇上工作，但当他同一位上流社会的小姐结婚以后，却变成了一个大赌徒，并且欠了一大笔债。最后他只得向一家航运信贷组织借钱，但因无力偿还，经军事法庭审理，被开除了公职。

他曾以航运专家的身分向好几个国家提出供职要求，均遭拒绝。但是，日本人看中了他，于是他便加入了日本间谍组织。此后日方慢慢地开始向他提出要求，让他提供海军方面的分类资料。他则以替报纸写一篇文章需查找一些资料为由，数次向海军部长索要资料，这引起了海军部长的极大怀疑。于是，以海军情报署为主，国家安全局为辅，开始对他跟踪调查。调查人员了解到，他曾向美国海军部借过一部关

于安全和情报方面的著作，并把它照像复制出来以后，卖给了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一个成员。必须指出的是，由于美国丢失了这样一本书，使得美国的舰队不得不作全面的战略调整。有足够的证据说明，逮捕他是正确的。但日本人采取了防范措施，事先就割断了同他联系的一切线索。

尽管法恩斯沃恩不断提出强烈的抗议，检察长还是不能在2月份以前结束他的案件，因为法恩斯沃恩声称，他向日本提供情报是为了破坏日本的情报网。但这是徒劳的，最后他还是被关进了联邦苦役监狱。

第三件间谍案与上两起非常不同，它直接关系到苏联，另外，还触及到日本很少见的某些方面。萨利赫是美籍俄国人，他替洛杉矶警察局工作已有好多年了，后来又在圣佩德罗海军情报署找到一份工作。但突然间他和他在洛杉矶工作的一位俄国同胞米哈依·戈林被指控为间谍并被判了刑。这一案件在未宣布判决结果之前，曾经美国最高法庭审问过，辩护词称：送往苏联的那些情报并非军事秘密。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以下原因，即转送出去的那些情报，提供了大洋彼岸日本人搞间谍活动的不可辩驳的证据。

在30年代发生的这一轰动一时的丑闻，导致了美国海军情报署经费的解冻以对付日本的威胁。与此同时，日本人也重新调整了他们在美国的间谍网。在墨西哥，他们收买了一些印弟安人，这些人向东京提供了大量的关于商业贸易，海上交通及铁路运输等方面的情报。此外，他们还谨慎地建立了德、日间情报工作的关系。冯·凯泰尔伯爵就是德国的情报联络员，他夫人则任交通员……联邦调查局和海军情报署，无法应付如此众多的特务们，于是只好重点地跟踪几个。此外，这两个组织的情报人员也常常因地方政府部门的

梗阻而感到无能为力。例如，当他们意欲实行逮捕时，地方部门却拒绝给予法律支持。

第十五章 查理·卓别林的男仆事件

"上星期，联邦调查局逮捕了两名日本人和一名叫艾尔·布莱克的美国公民。实际上艾尔不是特务，而是英雄，因为他仅凭自己的兴趣爱好便把这件反间工作做得十分出色"。

——引自1941年6月23日《泰晤士报》

大谷稻夫、深泽医生，和别名"立花致司令官"的山本等人，是美国西海岸情报网上的主要人物。

大谷稻夫是南加利福尼亚情报机关的领导人，他和永井千惠子在一起共事。后者则以"多萝西"的美国名字露面而比他更出名。大谷稻夫经常到这位已经是纽约人的同胞家里去拜访。同时，大谷稻夫也是洛杉矶某旅馆的常客。他在该旅馆把一些色情照片交给一个日本摄影师山罂栗，同时还向一个名叫具特西·奥哈拉的年轻女人交待任务，而奥哈拉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女人。

深泽医生的太太是"日本海员福利会"的会长。这个职位使她有得以为获准休假的军官和水手们提供消遣、娱乐的场

所，从而可以利用这种机会把上边给她让她转交她丈夫的指令收下来，并把向东京报告的情报交给这些人。30年代末，深泽和立花致在那里经营的情报工作非常活跃。立花致用贩卖鸦片的收入为这个情报组织提供一部分活动经费。联邦调查局曾收到一个名叫金盛汉的韩国人的报告，据此人讲，立花致打算画一张沿海地图，在上面标出美国的主要海军基地和军事设施、发电站和引水工程等，以便在打起仗来时可以很快地制订一个对主要目标进行破坏的计划。原先立花致可能只想按老办法简单地制订一个一般的行动方案。由于联邦调查局在调查时行动缓慢，进展不快，致使日本人很快发现自己已被监视，并立即向老板发出警报信号。而老板则马上派出另一个间谍小组前往波特兰和西雅图去执行一件任务，然后再返回旧金山和洛杉矶。与此同时，老板还命令前一个小组，把对方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那边去，即让他们天天都跑夜总会，然后再去逛妓院。这就给人以活动十分频繁的印象，但这时另一个小组已经开始行动了。结果他们获得出乎意料的成功，尽管其做法有点闹剧性质。

1940年在旧金山举行世界博览会期间，联邦调查局有意安排破获立花致的特务组织，其做法之一就是组织一个叫"无形摄影机艺术摄象"活动。这一活动由一个名叫艾尔·布莱克的美国人负责组织，他是一名老海军文书军士，自豪地称自己为"基诺，是遥控机器安装大王"。他的工作很简单：向摄影爱好者提供漂亮的裸体模特，不要其它费用，只收取廉价的门票。这件工作对于一个精明的旁观者来说，并不是特别赚钱的事，因为前往拍照的人，一般都是非常冷静的人。发表这一看法的是一个名叫河野虎一的中年日本人。因为他也进去拍过几张照片，他拍完后便向布莱克走去，并对他说

道：

"我们曾经见过面，您还能记得起来吗？"

布莱克大略地打量了他一下说：

"很抱歉，小伙子。我一点也想不起您是谁了"。

"这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当时您曾在查理的影片中扮演过一个小角色"。

"是的，那是在1917年"。

"一点不错，那时我正给卓别林当贴身仆人"。

这是他们第一次相会时的情景。河野虎一在为大名鼎鼎的卓别林当仆人时，积累了一笔巨款后，把自己赎出来了。在当仆人时他曾听到卓别林和他的客人们的许多谈话。后来他自己公开地经营一个小商店过起安闲的生活来。实际上，他非常富有，除经常到深泽的诊所而外，还和一些德国外交官有来往。此外，他还每年要回一次东京，这已成了他的习惯，因为他在东京还有一大批财产。

布莱克感到吃惊的是，河野虎一漫不经心地对他说："很遗憾，您已不再在海军工作了，不然的话，您会搞到一笔不小的款子的"。

1941年，他们又第二次会面了。这时布莱克试探着对河野虎一说，他想重返海军工作。听到这话，河野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并请他在日本俱乐部里共进晚餐，这时布莱克充分表现出当年他作演员时的才能。晚饭结束后，河野和他约定，第二天再在森斯特马路和威尔顿大街的交叉路口相见，但却没有告诉他要带一个重要人物来和他会面。

会见是在一辆汽车里进行的。开始时河野和另一个人向他做手势请他上车，随后车子便向乡下开去。这位新来的不是别人，乃是那位大名鼎鼎的立花致海军少校。经过一番讨

论后，布莱克终于明白了，他们是想让他当间谍。他本来就没有半点重返海军工作的意思，但为了拉住河野，他还说他认识一个在海军中专管秘密文件的朋友。这次谈话后不久，他便被告知，他将定期拿到一笔酬金，其条件是，他要向他们提供美国海军的情报。

当时日本海军情报局的间谍正在把注意力放在夏威夷群岛。这时有人又告诉他，如果他替日本人去檀香山和珍珠港工作的话，他会取得巨大成功。并说，如果他能接受这一任务的话，他将得到2500元美金的活动费，另外还可以加5000元美金的情报报酬。

布莱克对此事的第一个反应是，他应该立即把这些报告给海军情报署，甚至还应该报告给华盛顿。但他又改变了主意，因为他害怕会有日本特务跟踪他。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间谍们对于任何一件小事情或小动作都十分敏感。他甚至也不能使用电话，因为电话里有窃听器。

尽管他不是一个反间谍的技术专家，但作为一个反间爱好者，他表现得十分冷静，而且足智多谋。他走进距海军情报署不远的一家电影院里，利用里面黑暗、人多的条件，又偷偷地溜了出来，跟踪他的人却没有发现。他跑进影院的经理室，要通了海军情报署的电话，在电话中报告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和他当时所处的形势。随后他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回放映大厅，特务们根本不知道他曾出去过。海军情报署的人们把窃听线路接在他的电话机上，录下了他和日本人的全部谈话。

海军情报署马上便摸到了立花致的线索。他们发现，此人是1930年移居美国的，开始时就读于宾夕法尼亚的语言大学，但后来又要求转往南加利福尼亚的语言大学。由于他改

变了身分，因此海军情报署的人员便认为，他很可能是东京情报部门的一个高级军官，但他到底属于何种级别尚有怀疑。为了弄清这件事情，他们要布莱克接受到檀香山去工作的这个任务。

立花致给了布莱克一张去夏威夷的船票。布莱克一上船就发现，他仍然被监视着，有两个人轮流跟踪他。他据此得出判断：日本人自己行动怕引起怀疑，于是便请德国人来干这件事。他还需在这条船上同一名海军情报署的人员接头，因此他显得有点紧张。他想，此人现在也已经上了船了，这使他非常不舒服，唯恐被暗中监视他的人发现。

接头安排得十分巧妙，简直可以说是一场出色的演出，以致使得这位老喜剧演员也不禁为之叫绝。在船上你随时可见有一种人，他每时每刻都喝得醉醺醺的，晃荡晃荡地到处乱走。在这条船上，也有这么一个人，此人矮胖短粗，他没有事便从客厅里走到甲板上，然后又从甲板走回客厅里。凡是他经过的地方，遇到旅客便和人家纠缠不休。监视布莱克的特务们极力想避开他，因为他们怕这个家伙防碍他们执行监视任务或者把他们的注意力从布莱克身上引开。他们这种回避态度大大方便了这位假酒鬼完成他的任务，于是这个人便在两个特务离他很远的地方监视布莱克的情况下，大摇大摆地同布莱克搭起话来。

起初，布莱克也在想办法企图避开这个讨厌的家伙，但这时口中唸唸有词的酒鬼突然小声和他说起话来，只听他道：

"听好，下面是对你的命令：到达檀香山后，便从你下榻的旅馆给宾夕法尼亚号美国军舰打电话，找坎贝尔。懂了吗？并请他到你的房间里去同你会面。当你看到来人军衣上的左

衣袋有一道轻微的裂口的就是。要看清楚屋里放窃听器的地方。就是这些。你们的会面一定不要让日本人产生怀疑，因为他们会窃听的”。

布莱克一口把杯中的酒喝光，声称他非常之忙，不能和他闲聊。这时“接头人”又成了一个酒鬼，晃晃悠悠地高举酒杯，向他提议，他俩再干一杯。

布莱克一到檀香山便立即打电话找坎贝尔。就象海军情报署的那个人对他说的那样，他住的那个房间几乎到处都装了窃听器。他不得不承认，日本人对他的考察是非常慎重的。在开始和坎贝尔谈话之前，布莱克已经十分明白了，即日本人在他们的住地能够一清二楚地把他们的谈话全部听到。于是便在坎贝尔和他之间发生了一场准备得十分精彩的对话表演，因而他们的“听众”也感到十分满意。布莱克首先向坎贝尔提出，请他向自己提供某些情报资料，而坎贝尔似乎被激怒了，表现得十分生气，但最后还是接受了他的要求。

此人接着便向布莱克提供了一些假文件，布莱克立即把这些情报资料交给了日本人，日本人很大方的买下了那些资料。不久，他接到命令，让他返回美国本土。美国海军情报署对此事的处理十分果断，但他们的努力却因联邦调查局的缺乏远见而受到破坏。联邦调查局的人倒是对日本人的破坏内容更感兴趣，因为他们认为这一破坏计划已由立花致在美国的西海岸布置开来了。他们也知道日本特务们曾经受过桥梁和发电厂实施爆破的技术训练。至于立花致本人，他也已感到自己被联邦调查局的人跟上了，其实跟踪他的是海军情报署的人，联邦调查局是想马上逮捕他并把这一切功劳全部记在自己的账上，因此他们便很少向海军情报署通报情况。

如果布莱克把为日本人充当间谍的这一职业续继到日本偷袭珍珠港，那对美国可是太有利了，但是《泰晤士报》却报道了如下的消息："两名日人和美国公民艾尔·布莱克被联邦调查局逮捕……艾尔不是间谍，相反地却是一名反间英雄"。

立花致和河野虎一被捕后的罪名是，在某一外国政府的指使下阴谋反对美国。法庭宣布，每人可以交付5万美金获释。日本驻洛杉矶领事交付5万美金保出了立花致，而河野虎一自己无钱，也没有人替他付款和前来看他。

如果说，在布莱克——河野事件中美国海军情报署的功劳被人剥夺了的话，日本海军情报局却可以大肆宣扬，这是他们这一时期情报部门的杰作。设立在夏威夷的美国海军基地愈来愈吸引着他们的注意力。一开始，东京情报机关的首长还担心在夏威夷土生土长的情报人员数量太多了，担心这些人会被认出来或受到怀疑，因此曾指示雇用一些德国人。1936年11月，德意日三国签订了一个共同反对共产国际的协定。这一协定使日本在情报方面请求德国的帮助有了文字依据。鲁道夫·赫斯的密友，卡尔·豪斯佛尔教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曾以军事教官的身分在日本住了一段时期，日本人对此公的兴趣却不在军事上，他写的有关地理政治和星相学理论的书，在东京十分畅销。1933年他的儿子奥尔布赖特被任命为一位大人物直接领导下的一个办公室的顾问，那位大人物后来当过驻英大使和第三帝国时期的外交大臣。后来在三国签订反对共产国际的协定后不久，奥尔布赖特便应豪斯之邀被派往日本。

小豪斯佛尔（奥尔布赖特）的任务是帮助日本招募太平洋方面的情报人员。作为交换条件，日本人把他们情报机关的

作用向小豪斯佛尔作了某些简略介绍。豪斯佛尔特别写了两篇关于日本间谍的文化素养的文章："间谍工作的训练对参谋本部军官的本职工作来说，有典型意义，这不仅能使他们学会前往工作国家的语言，同时还可以使他们了解各该国家的文学和文化，这一工作看来似乎有些多余，但这正如赌博一样，它往往可以成为你备用的一张王牌……所有在国外的日本人，其行动表现，几乎本能地象个间谍，因为他们在国内也以作一名间谍为荣"。

豪斯佛尔向日本人推荐了三名间谍，三个人的名字无疑都是由赫斯给起的代名。那是一个姓科恩的德国的三口之家：父亲、母亲和女儿。女儿的名字是露丝·基特·萨斯，她和科恩家庭没有丝毫血缘关系。贝纳尔·科恩医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监狱里学过英语，三个人都是德国情报机关的间谍，他们把家安在檀香山，这一有利条件帮助他们大大方便了向日本提供情报。为了掩护其特务活动，贝纳尔医生充分利用了他对日本文化感兴趣和对夏威夷地区史前化石研究的爱好这些特点，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到附近各岛屿上去观察。他的夫人担负起情报传递工作，并定期到海军情报局汇报。露丝·基特是个十分漂亮的姑娘，非常喜欢交际，晚上她常常去美国军官的驻地作客，并向他们学习打网球，后来她嫁给了一个美国军官。

科恩一家为德国和日本搞情报工作成绩斐然。有人估计，在6年中，他们从这两个国家拿到25000美元。1935年他们便定居在夏威夷，但到1937年科恩医生才奉德国人之命前往东京汇报。1939年他们全家迁往珍珠港。露丝在那里开了一家美容院，这使她有机会听到许多长舌妇们泄露出来的秘密，这些人大多是军官太太。

日本海军情报局无意雇用住在夏威夷的外国人。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坚持主张在那边应有一个常驻间谍，此人既应是航海问题专家，又能提供情报，并且还能把情报传递到附近的岛屿上去。他选中了一个日本海军掌旗官，名叫吉川猛夫，28岁，是一位警官的儿子。此人办事十分认真、细致，由于健康的原因，不得不离开作战部队。随后被调入海军情报局的美洲处，并学了4年英语。山本上将是一个出色的战略指挥家，他在准备同美国作战的过程中，要掌握所有的有关资料，依他的观点，日本如果同美国开战，除非战争一开始日本就把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全部击沉，否则日本就没有半点打赢的希望。

吉川猛夫暂时被从海军调到外务省去。在这段时间里，他进行了英语强化训练，并详细地接受了到夏威夷后的具体工作任务。1941年8月，他被派往檀香山，其头衔和化名是：日本驻檀香山副领事森村丝。他的任务是，把获得的情报用密码发给总领事。无论从哪方面说，当间谍都是违反他自己意愿的，因为不当间谍的话，他将会尽一切力量重返战斗部队了。他虽然不是一名专业间谍，但他却善于适应环境，而丰富的想象力又使他在工作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他干间谍经验不足，便以近乎疯狂的成功欲来补偿。他在间谍工作和密码书写方面受过全面的训练，但他到了工作岗位上仍然独自进行顽强的训练。例如他针对海滩的坡度大小和海浪的高度，经常进行海上游泳训练，他每天晚上还都要跑到海边的酒巴间同美国海军聊天。并且时刻注意在“二世”姑娘(1)中物色可提供情报的线索。他的指挥部设在码

---

(1)“二世”，指在美国出生的日本人。参见第十九章注。——译者

头上一家名叫“森乔罗”的饭店里。

他向东京发出的情况报告，除了“绝密”件外，都是通过外交途径发的“明码电报”，起码电报中不用暗码，这些须发的电文要经过美国人过目的。有时候他在电文中对某些事件还加有重要的评论性意见。但美国当局对此似乎并没有明白它的重要性。他开始想同科恩医生接头，但一接触后他立即对这个德国特务产生了怀疑，他要用自己的情报网来代替这个外国人的工作。他向东京写了报告，指出，不管怎么说，科恩首先是一个德国人，如果日本一旦同德国发生冲突，他会毫不犹豫地背叛日本。

他经过慎重的考虑以后，认为有时候“亮亮像”反倒是最好的掩护。由于他是一个乐天而随和的人，于是他便充分发挥他喜欢喝酒和寻欢作乐的天性，但他乐于接近的朋友却总是那些喜欢暴露自己内心秘密的人。实际上，他已经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给盯上了，因为他们窃听了他的电话，所以对他那伤感并略带点杂乱无章的生活了如指掌。然而这些美国人却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他们与之打交道的这个人，他的第一职业就是间谍，而且他竟能利用所有日本在夏威夷海面上的舰船向东京传递情报。有人说，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没有爱情的间谍，就象一个被判了刑的间谍”。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象他这样，每天都在追逐维纳斯女神的人，确实可以避免被人怀疑为间谍。他这种每天都忙忙碌碌地沉醉在花天酒地里的生活，是对他同时进行的另一种活动的出色的掩护。

他非常强调对人们一些普普通通的、平淡无奇的日常琐事的观察。这种观察包括从对美国海军高级军官喜欢吃什么的口味研究起，直到对珍珠港地区的拉圾箱里的内容不断的

检查等等。他能根据岸边拉圾的多少大致判断出在某一时期停泊在港口内船只的数目、而且由于长期对拉圾的观察，他甚至还能据此判断出那些舰艇航行的路线。此外，他还有一些别人所不能及的本领。依据日本的传统习惯，他能够毫不迟疑地改扮成仆人、菲律宾的工人，或者是口若悬河的夜总会的解说员。又由于他还是一个优秀的摄影家，他还能够把停泊在附近山丘边上的舰船都拍下来，还曾在空中把附近几处的停机坪也摄入他的镜头。

他把他了解到的上面那些情况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通过明码电报发出去的，不然的话，他便很可能已成为怀疑的对象了。无疑，其中某些电文是涉及到美国人的，但他们却想不到日本人会在距他们身边如此近的地方明目张胆地调查他们海军的调动情况。此外，日本的大使、公使、领事们几乎从各自的驻地，如珍珠港，、檀香山等地向东京报告情报资料，这一战术正是日本下列情报计划的一部分，即：从斯德哥尔摩到卡普，从那不勒斯到丹吉尔和夏威夷，把这些地方能搜集到的情报都要搜集上报。

吉川猛夫知道，由于美国人缺少日文翻译，对这些电文的翻译要花时间，因此他向东京提出，由一周报告一次改为一周三次，而美国人为翻译这些材料，通常要比原件发出去的时间晚三周。

对于一些确实重要的内容，吉川猛夫便冒险使用其它传递手段，因为他随时都准备被逮捕，尤其是当战争一旦爆发之后。他在夏威夷建立了一个秘密情报网，使用照明火光为信号，若在屋内，就用两种闪光办法为记号接受科恩医生和其它人员发来的情报。比如数字7（它代表某种船只的数目）是在夜间的某一个时候，在屋子里窗户后面发两次光来表

示。有时候他们也在远远的山丘上点起一堆火。吉川猛夫在把重要的秘密内容用公开形式传递上表现了出色的才能，这样就可以尽可能地减少人员直接接触。

在他发往东京的所有报告上都签以"北永井总领事"的字样。自1941年3月27日直至奇袭珍珠港止，这个日本人向东京情报局交送了大量情报。如果研究一下日本海军情报机关是怎样准备那第一次毁灭性袭击的话，那会使你感到震掠。首先是东京方面向吉川猛夫提出了下面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在一周之内，星期几停泊在珍珠港的舰艇最多？""星期日"，他回答说，"基梅尔每周必然率领他的舰队到这儿来度周末"。日本海军情报局同时还想了解那儿的船只抛锚的方式是什么样的，他回答说，最常见的方式是抛双锚。此外，山本上将还向他驻伦敦和罗马的海军武官索要一些紧急资料的报告，试图从英国使用鱼雷艇攻击停泊在塔兰托港意大利船只的战斗中找出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来。资料表明，塔兰托港水深只有42英尺。另外，人们一直认为使用空中投放的水雷，对该港来说船只是太少了。山本还想了解一下这种空放水雷是怎么使用的。人们向他介绍说，这种水雷上安装有一种木制的尾翼，这样它一旦落水便可不再续继下沉了。将军还想知道，如果美国人不在珍珠港装置防雷网的话，这种攻击方式是否可以用来袭击停泊在该港的美国军舰等问题。

吉川猛夫又向本部报告了一个好消息：基梅尔上将拒绝了在珍珠港安装防雷网的建议。其理由是，这样将使海道变窄，从而妨碍了海上运输。由于他的这一决定，后来便使大批美国军舰白白地葬身鱼腹。

英国情报局有一个名叫达斯科·波波夫的双重间谍，他了解到日本人正在通过德国间谍对美国的弹药库、水雷、航

空基地、航海设施、潜艇的数量以及珍珠港地区反水雷网装置的情况等进行全面的调查。波波夫怀疑，这种迹象很可能意味着日本人对美国有一个突然袭击的军事计划。手中掌握了这些情况的英国人却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没有把这些情况通知美国总统，也没有告知美国海军情报署，却直接通知了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从而造成了一个灾难性的后果。胡佛对波波夫的情报是否真实表示怀疑，他认为波波夫同时还为纳粹德国工作，因此他不可能过多地注意关于珍珠港方面情报的质量问题。所以他在一个英国军官面前说波波夫是个"不道德的堕落分子"。当有人请他对此作出解释时，他喊道：

"请您看看他电文上的那个神圣的署名吧：三轮车！这就是说，他喜欢同时和两个姑娘睡觉！"

就这样，一个如此重要的情况竟被彻底地搁置起来，而珍珠港的大惨案也便能按日本的计划实行了。

1941年12月5日，吉川猛夫向东京报告：3艘装甲舰停泊在珍珠港。这样，停在港内的装甲舰总数就达到了8艘。第二天，他又报告：怀俄明装甲舰和1艘扫雷艇又进入了珍珠港。

> "到今天为止，港内共有9艘装甲舰、3艘扫雷艇、3艘轻型巡洋舰和17艘驱逐舰。此外，船坞里尚有3艘轻型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重型巡洋舰均未在港内"。

上面的报告，只有一件事搞错了，即他说的怀俄明号装甲舰实际上是犹他号装甲舰，同时忘记了在港内还停泊有两艘重型巡洋舰。

在实施攻击之前的那一夜，人们都非常疲乏。27艘日本

潜艇在珍珠港地区巡逻。吉川猛夫烧掉了他的密码本和所有的有关材料，随后便被美国人逮捕了，但过了很久人们才知道他是夏威夷地区日本情报机关的核心人物。在一次互相交换外交人员时，他获得了自由并回到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一直在日本海军情报局工作。

科恩一家却没有他那么好的运气。在袭击珍珠港之前科恩医生一直续继在他的窗户下向日本领事馆发火光暗号，这些情报随即便被转送到海军指挥部去。有一次一个美国军官发现了他的暗号火光，便立即报告了联邦调查局。

科恩医生和露丝一起被捕。随后他的太太也被捕了。他被判处死刑，后来又减为50年监禁。但在1946年因为他向美国当局供出了过去的全部情况而获释。他的妻子和“女儿”则在战后被送往集中营。

第十六章　在东南亚的情报手段

"优势又转到了敌人方面，他们掌握了地形和大气条件的最新资料，即开战前最后一分钟的情况，并且在很大的作战范围内制订了详尽的计划。特务的渗透工作已准备就绪，即将付诸实施。同时还准备了一批自行车以备日本自行车队员们使用。"

——引自温斯顿·邱吉尔勋爵《第二次世界大战》

邱吉尔的上面这一段话概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新加坡陷落时日本方面的优势。日本的情报人员不仅调查了当地的地形条件，同时也调查了整个东南亚的地形和气候条件。这种调查活动开始于距那时30年以前。

在新加坡，日本的间谍活动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日本的军官们可以在那块殖民地上自由地活动，但却也不能说攻占新加坡就已是预谋之举，但在那里的军官们也确确实实把他们的所见所闻都写成材料报了回去，

在20年代末期，绝大部分情报资料，都是关于商业贸易方面的。这与日本后来开始的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业大发展也有联系。自1930年以来，日本人就实行对商品的分摊税收制，这就使得他们能把自己的产品以最低廉的价格卖给

西方。并把自己的出口产品迅速提高了30％多。在情报的搜集方面，他们也从未因粗疏大意而忽略过任何一点点东西。例如，1930年日本派出一个医务组前往印度和印尼，研究当地的医疗卫生条件，并对传染病进行统计调查。他们写的报告材料都十分详尽，这样日本当局在后来入侵这一地区时，就可很有效地防止部队传染上这些疾病。

一位日本医生在同荷兰军官们谈话中以及在调查妓院时发现了另外一个情况，即在荷兰殖民者的行政部门工作的日本人大部分是同性恋者，因为有这种现象，所以在爪哇开办的妓院里便有了男妓。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爪哇的经理们将来都可能被日本特务所雇用，日本特务们在这块荷兰殖民地上也特别活跃。他们在当地的头头是一个名叫吉住留五郎的巨商，当荷兰当局开始对他产生怀疑时，他已奉召回国。此外，日本的渔船也一直在印度尼西亚海域内作业，其活动范围甚至达到新加坡。

荷兰当局这时收到一份揭发两名日本情报军官的报告，这两个人以荷兰军官洗衣工的身分工作，因为这样，他们便可以从容地翻检荷兰人的军服，以便能在衣袋里发现什么文件之类的东西。当日本人1938年在印尼北部取得了对一块森林的经营权时，他们便在那里开出一片土地当飞机降落场。约翰·根室游历东南亚时曾写道："日本人在井里汶停泊的巡洋舰，邀请当地土著人上去作客，以便从中雇用间谍。"

在印度尼西亚，非常自负的英国情报局的官员们，根本不把探测海域深浅的日本渔船放在眼里。他们说，这里的海域已由海军部探测过了，而且过去的海图也已过时了。我曾向一个日本海军军官全面地了解过一些情况，此人回答我说：

“我看他们把话说得过于轻率了。不错，那些海图是已经过时了，但这您知道，它们却在不断地被修改。首先，这些海图都在由实地探测人员定期核对。很显然，我们不需要像他们那样大张旗鼓地搞测量，事实上我们也完全用不着那样。你们的人以为我们就是搞这件事，所以对我们不太重视，岂不知，我们这种测量只不过是一种障眼法，我们真正的目的是在搞别的。”

1938年，正当远东舰队调动之时，一艘日本军舰“婆罗洲丸”停泊在新加坡码头附近防区的布拉康马蒂港的外边。据此英国人立即决定全部改变其舰队的行动计划。邱吉尔在该地只有为数很少的情报人员，他似乎不知道在新加坡幕后策划之事。在马来西亚的日本第25集团军作战主任辻政信上校宣称：

“新加坡没有保卫后方的部队。”

但邱吉尔却并不知情，或者我们可以设想是他搞错了，因为到此时再了解日本在世界上的活动已为时太晚了。1941年2月17日邱吉尔向他的军事顾问伊斯梅将军问道：

“如果日本要进攻不列颠哥伦比亚的话，应该如何同当地的日本移民做好协调工作？”

显然，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加拿大政府来做才合适[1]。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一下在这个英联邦自给领里是否有统一的武装力量的话，那将是很令人感兴趣的。30年前，当发生了反日搔乱时，在那里的日本人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和组织性，从而完全控制了局势。

甚至在1941年，当紧张局势达到顶点时，新加坡的保安

(1)因为不列颠哥伦比亚是加拿大西部太平洋沿岸的一个省。——译者

措施也是相当松弛的。一个名叫沙万的亚洲旅馆老板，在海军基地的一个军官俱乐部里已工作了3年，此人是负责替日本挑选并招募特工人员的，有人认为他是中国人，可当时竟没有一个情报机关能搞清他的身分。

一天晚上，一位顾客当着这位老板的面和人热烈地讨论起来。原来这位顾客事先和他的同伙商议定，要编造一个假情况，待这位老板当班时，故意在他面前高声讨论那件事，以试探真假。当沙万老板听到他们谈的内容后立即在酒单上写了些什么字，然后又匆忙地把酒单的一个角撕了下来，只见那上面写道："P.W.[1]11月末"。这显然指的是威尔士亲王殿下即将访问这里的事。进行这种访问，先由访问者向俱乐部成员提出要求，以便由俱乐部成员检查必要的证件，并向先遣人员的负责人提出必要的问题。原来这个沙万的真实身分是日本的一名上校，名叫门松世德，于1930年进入日本情报机关，因英语讲得十分流利，而被调来新加坡，在这里他定期向上级提供情报。

辻政信上校是日本最活跃的青年军官。有一段时间曾参加"樱会"的活动，并且是"大东亚同盟"的支持者。他领导着一个军官小组，负责筹备对马来西亚进行一次为期17天的调查活动，并为占领新加坡作准备。1941年1月1日，他组建了"台湾军"第82分部(即勘测大队)。台湾军由板崎将军指挥。该勘测大队的成员大都有在满洲地区接近北极圈的地方作战的经验。这一次，他们要通过热带丛林，潜入这块英国占领者的属地，并把在各种情况下和各个时期的地形变化作了最详细的记录。他们的记录称，新加坡由于地处海岸，易于固

(1)P.W.是法文威尔士亲王的缩写。——译者

守，但它的后方，在向着居銮的方向，都没有防御工事。这些情报军官靠着勇气和纪律，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工作并且赢得了胜利。比如有一个名叫朝枝的少校，他扮成苦力潜入新加坡，在马来西亚边境上工作，"积累了他业务范围内的一批极其宝贵的资料"。

还有一位名叫福井的，他是间谍专业训练的初级教官，在进攻新加坡的前10天奉命监视附近的海峡地区，其具体任务是监视敌人的阵地并观察当地的潮汐情况。这是情报工作中最初级的工作，但他却一丝不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辻政信上校被英国宣布为战犯，由于他化装成一个和尚才免遭逮捕，但因此却使得他在东南亚各地和在中国大陆周游了3年。

日本人占领了整个东南亚，也未在情报工作方面出什么大问题。1938年，情报局的军官们曾提出，在中国进行的战争将会旷日持久地拖下去，长此以往，它将成为日本经济和军事上的沉重负担。当时中日双方的情报人员经常在中立区澳门秘密会谈，以寻求结束这场灾难性战争的办法。不幸的是，当时"国联"的某些成员国对结束这一战争不甚热心，反而在那里发表一些加剧紧张局势的演说。其演说的内容都是强烈反日的，这就加剧了东京极右分子的反感情绪。伊恩·哈密尔顿将军曾说过：

"导致远东动乱的，竟是那些强迫我们同日本断绝联盟的人。毫无疑问，在这方面'国联'在无意中起到了火上加油的作用，这样就激怒了日本，并且鼓励了中国。现在他们要火中取栗了。"

他的讲话在东京受到了热烈欢迎。日本政府拒绝承认曾被迫退出"国联"。华盛顿的海军条约于1935年12月被废除。

有些日本情报人员认为能够，而且也应该同中国签订一个和约。儿玉义夫就是其中一个。儿玉诞生于1911年，曾经是“爱国青年会”的会员，后来以“半官方人士”的身分被派往中国。在那里他创办了“儿玉洋行”，在作进出口贸易买卖中赚了大钱。他在日本时是一个穷光蛋，孑然一身来到中国。待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的财产竟达到了25万英镑。他奇迹般地发了大财以后，便向日本海军提供军需、给养等物品。这个激进分子开始时仅是一名普通工人，18岁时，竟提出要求请日本天皇接见他，声称要求解决1700万失业者的工作问题。不久，他因极端民主主义的活动曾数次被捕。有人说，他以一个商人的身分被派往中国，就是为了压一压他身上的那股政治热情。

中日战争的局势使人莫测高深，经常发生一些使外国观察家感到惊奇的事。当两国军队在战场上厮杀的时候，双方的情报人员却在秘密洽谈、悄悄地交换战俘、偷偷地开展贸易，并在私下里暗中想办法，想找出一个把战争减到最低限度的解决方案。随着日本人的后退，他们已打算承认应该在1936年以前同中国签订一个和平条约，以便不丢面子。在这件事情上，西方也有他们的责任。

蒋介石的情报官，美国人马坤在他的《日本军队史》一书中，向我们透露过一些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他把住了通往香港的边界地区，企图中止军火贩卖活动，但他本人却在日本人监视之下。一天，有一个人到他的办公室找他。

“这是我到那时为止遇到的一个最令人难以捉摸的年轻人，我一向以善于察颜观色而被人称道，只要我看一眼就知道此人是何许人也，但面对这样一个人我却什么也看不出，既看不出他是什么种族，也猜不透他的年龄有多大……或许

他有20岁左右吧，也许是地中海东岸地区的人，总之，站在我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人……”

来的这个日本人想和他商谈一桩买卖，“他得到准许，可以向上海出口140万美元的赤砂糖，以从我这里换取100万美元的汽油，然后他再把这些汽油交给蒋。”马坤接着评论说：“这是我做过的最好的一笔买卖。”

他在书中还讲了许多日本人如何利用麻醉品换钱支持间谍的经费开支，还利用这些毒品麻醉中国军队的意志等情况。一个名叫理查德·休斯的，是一家通讯社驻东京和香港的记者，他报道说：

“日本军方人员不间断地、有计划地向中国人提供麻醉品，以便在日本人进攻珍珠港之前，使他们处于麻醉状态。为了经济上的卑鄙目的，英国人在十九世纪也干起这种勾当来。但是，在这里情况却恰恰相反，麻醉品的贩运只为一个目的，即为了更好地控制住那些在日本人支配下的中国间谍，并达到进一步腐蚀他们的目的。在中国出售的“金蝙蝠”香烟，含有比重极大的海洛因和鸦片。这种香烟在妓院里自由买卖。这里的妓女也都为日本情报机关工作。”

香港的保卫者被击败以后，这个城市的地位颇象新加坡，4天之内日本便占领了许多地方，两周时间便占领了全岛，据中国组成的破坏小组和一些双重间谍的看法，这里的一切战争过程和新加坡一样，完全是按日本人的预想进展的。但在香港，女特务要比她们的男同行多。埃米莉·哈恩曾讲过她同一个女特务邂逅的故事，那时香港已沦陷。

“她通过一个俄国女友向我传来一句话，请我到格洛斯特旅馆喝茶。当时这家旅馆已被日本人征用，并改名为“松原旅馆”。在我们谈话时，进来了3个中国人，用一连串的问

题盘问妓女们，那些妓女们也确确实实是属于一种神秘的产物：漂亮的女特务。日本人还以为和我谈话的这个女特务在套取我的情报呢！因为她问我的都是一些诸如我是否有关在集中营里的朋友、我是否有办法可以和他们通信等……等了一会儿，她又来到我这儿，并且每当我一转身的时候，她就用藏在手提包里的一架小照相机给我拍照……又过了一会，我实在忍不住了，于是便打开一个壁橱，从里面取出一些我保存的像册，指着其中一张我的照片对她说：'拿去吧，这就是我的照片'……这位女士竟然毫不犹豫地向我道谢并对我说道：'亲爱的，你能在上面签个名吗？'……"

结果是，这位少妇的情报反倒被埃米莉给搞了去。这位少妇手上持有日本人的通行证，她的保护人原先是香港食品监查局的大老板。她在战争爆发前就已当上间谍，任务是专门在美国海军和英国士兵中交朋友，他们对她并不怀疑，同她讲话也很随便，还以为她是拥护蒋介石的呢。战后她在香港一家大旅馆里当女招待，老板是一个土耳其人和她的俄国丈夫，一天，日本警察来到这家旅馆，并宣布该旅馆已被征用。

您不难想象，老板自然是这位妓女！

第十七章　苏联在日本的情报网

关于著名的双重间谍理查德·佐尔格，许多人对他有过很多描写，笔者这次也要让他的大名在本书中出现，敬希读者见谅。佐尔格是苏联特务系列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而1940年左右，日本正在力图使苏联的情报工作对日本保持中立态度。

要完成这一任务，固然需有坚持不懈的韧劲，机动灵活的调查能力，有专门的情报员和能认定怀疑的对象等，但超乎这些之上的，则必需有情报机关在全世界范围内设立的情报中心所提供的有关情报的综合分析。日本的情报监察站设立在维也纳、索非亚、伊斯坦布尔、安卡拉、日内瓦、苏黎世，当然也有上海和满洲。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其规模之大可以由下面这件事中看出：日本人为使他们的敌人放松警惕，竟和俄国签订了一个为期5年的中立条约，自1940年4月生效。日本人认为，俄国人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在1940年至1941年之间，俄国对日本在满洲地区向它发起进攻的可能性的担心程度，比德国人对它的威胁所造成的心理负担还大。这种惧怕是有理由的，因为苏联在日本的情报工作，由于其手法笨拙，已处于日方严密监视之下，这种状况直到佐尔格到达后依然如此，甚至连他本人也成为怀疑对象，因为他是个双重间谍，又是那些被斯大林清洗出去侨

居在欧洲的苏联情报部门的一些人的亲密朋友。日本宪兵队对所有潜伏的苏联间谍都实行严密监视。对塔斯社派出的人尤其注意。路透社记者马尔科姆·肯尼迪曾在东京遇到过2名塔斯社记者，他写道：

“我在东京时，曾会见过罗姆和他的接替者纳吉。当时他们都在东京工作，我很喜欢他们，但我却对他们那种奇怪的逻辑推理方法感到十分惊诧，他们在分析某一特殊形势时，当希望和要求都与客观实际不相符时，他们总是把“希望”放在优先地位来考虑。

在30年代末，罗姆和纳吉都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清洗出去，遭到这种命运的，他们俩并非个别。其背景似乎是苏联在远东方面有些事情出了什么毛病，于是受政治局之命，一大批情报人员便被清除了。

佐尔格是苏联“格拉乌”(情报总局)的情报人员，俄国人依靠的几乎全是佐尔格送上去的情报。但“格拉乌”又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的前身）不同。理查德·佐尔格于1895年生于巴库，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俄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德国工作，不久便加入了共产党。1925年便成了苏联情报机关的成员。后来被派到远东组建“中国分部”，遂成为情报总局远东分部的负责人。他曾说服莫斯科，要搜集日本的详细情报。他还提出要求返回德国以便同纳粹的代表会晤，同时还提出，作为苏联的间谍去日本的要求，这都明目张胆地表明了他同德国的关系。

为了使斯大林能同意交给他一项同样冒险的任务，那就必须使苏联人手头上缺少关于日本方面的情报。斯大林知道佐尔格是曾经被自己清洗出去的一个情报人员伊格内斯·赖斯的朋友，同时俄国人对日本人企图搞到他们的机密情报而

进行的多次尝试也极为担心。他们知道，日本已派出一大批人骑着自行车进了阿富汗，并在那里用低价出售自己的自行车以取悦于阿富汗居民，而且已经开始了招收间谍的活动。这件并不显眼的小事却使苏联警惕起来，但更为糟糕的是，俄国人泄露出去的秘密却转道瑞士传到了东京，其中间人就是苏联经满洲出境的叛逃者。

由于德、日双方的互相合作，双方都得到了大量关于珍珠港的情报。这正如我们在达斯科·波波夫的工作中看到的一样，他向美国报告的大量情报，对日本海军来说，有着生命攸关的重要性，很难相信这些东西 胡 佛 竟 会不知道。同样，如果英国人不把这些东西通报给美国海军情报局，也是不可理解的。在珍珠港事件以前，德国人习惯于利用日本人作为他们在英国的特务的中介人。伍尔夫·施密特1940年空降在英国农村，化名"塔特"，此人被英国抓获并成为双重间谍，开始向德国递送假情报，而他因投递那些情报所得的报酬均掌握在英国人手中。一天，他到伦敦向他的一个情报转递人付款时，在公共汽车上，一位乘客突然偷偷地递给他一份报纸，里面夹着一大笔钞票。这位乘客是日本驻伦敦大使馆的一位随员。这样英国情报局的官员便对他跟踪调查，发现他是一名中尉，名叫义井道则。

最使莫斯科感到头疼的，就是从日本发回去的假情报。1941年初，俄国人便发现了所有的"英 国 人 玩 弄 的 两面手法"，即德国间谍都转向为英国人工作了。他 们 同 时 也担心，一些假情报通过正式渠道传送，使他们真假难分。

有很大一批情报，英国人是通过苏联红军中的一些反斯大林的军官从内部搞到的，这些情报被直接送到避居在维也那的一位俄国将军那里。1941年9月，日本人从德 国 人那里

搞到一批苏联内部资料的影印本……这些材料他们已等了一年多了，这是日本人干得最漂亮的事情之一。事情真象令人难以捉摸。是否在海军上将卡纳里斯[1]和日本人之间有什么密约？此事各级纳粹组织是否晓得？日本人是否同德国人分享关于苏联方面的情报？这些都值得怀疑，因为有一个名叫矶野清的日本驻保加利亚和巴尔干半岛的记者曾在索非亚向他们提供过不少情报。

那么矶野清此人是否可以信赖呢？他的情报源在哪儿？甚至连德国人的情报机关对此人的情况都一无所知。但是却突然间出现了令人十分吃惊的事：一些关于苏联红军的非常准确的情报大量涌入"阿勃维尔"[2]的俄国处。这些情报都是通过一个名叫"马克斯"的中间人转过来的。首先，德国人对这批情报持怀疑态度。它们过于详细了，因此就不见得很准确。他们认为这是有人故意传递的假情报，但是马克斯又不愿意出卖他的情报源。在这段时期，对日本来说，占首位的就是要掌握住苏联和德国。而且人们也相信，他们的特工人员已经在柏林和莫斯科进行秘密策划。1941年5月11日，德国谍报局宣布："日本驻莫斯科使馆曾企图在德国和苏联之间进行单独媾和的斡旋工作，这一情况我们是从截获并破译的日本电报中得知的……但我们声明，在苏联没被我们打败之前，我们决不同它签订和约！"

佐尔格在东京的情报网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尽管东京的宪兵队在不停地对首都地区进行搜寻，以便找出秘密电台，但佐尔格却在与他跟踪者的斗智中遥遥领先。他把要发回去的内容不经过信使传递，而是采取发一个电报换一个地

（1）他当时是德国武装部队谍报局局长。——译者
（2）阿勃维尔是卡纳里斯领导的德军谍报局的简称。——译者

方的办法使对方无法破获。第4处的信使都是经过香港或上海的。1941年日本一个名叫小左志的便衣警察坚持认为，一个强大的地下间谍网正在东京活动。电台探测器探测结果表明，东京地区有一个秘密电台在工作，但他们却不知道这个电台是美国的？英国的？还是苏联的？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核心人物艾伦·杜勒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住在瑞士。他极为欣赏日本秘密警察对佐尔格实施的“出色的跟踪”，那是因为日本秘密警察经过艰苦的调查和在共产党人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询问的结果。其中一个被询问的怀疑对象叫伊藤立，此人与间谍人员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瓜葛，他因此也就无所畏惧，答应同秘密警察合作，向他们提供所有已脱离共产党的原党员名单，并向警方告发那些他原来所不喜欢的人。

在那些人中有一位太太名叫北林，原先曾是共产党员，她曾侨居美国，后来又改信基督教，于1936年回到日本，并同一个名叫宫木与德的人在冲绳进行接触，此人是佐尔格的人。

伊藤立叛变了共产党，但也并非死心踏地。他出卖的唯一的一个人就是这位太太，因为她已脱离了共产党，但他却对宫木与德一无所知，他也只是在漫长的“询问”中才提到了这位太太的名字。宫木与德的行踪，把秘密警察的视线又拉到了尾崎身上。此人是佐尔格的首席间谍，苏联使馆政务参赞。此后不久佐尔格的全部特务组织便被发现了。

但是，并不能肯定日本宪兵队或者别的什么反间谍组织，在破获这一间谍网之前就不知道这个间谍网的存在。佐尔格的发报员科罗森是德国共产党员，他曾发现过一辆小型电台探测车停在他的住所旁边，而且有一个电工曾几次向他

家里打电话，然后又道歉说打错了。如果秘密警察拉紧布在这位发报员身边的网绳，他们便会惊奇地发现，此人并没有在他们的网络之中。科罗森是在很久以后才被逮捕的。当然，如果事先能对他实施监听，日本秘密警察无疑会有更多机会提前破获佐尔格的全部情报网。

从这时起，受到德国进攻威胁的莫斯科迫切想了解日本会不会进犯西伯利亚，而东京方面也似乎并不急于中断佐尔格同苏联的通讯传递，佐尔格也已预见到这一点，即日本人不会对此采取武力行动，但当他们一旦有了对珍珠港发动袭击的可能性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使他的电台消声匿迹。日本人一面监视着佐尔格向莫斯科的情报传递，一面从中学会了许多技术问题和情报组织方面的问题。此外，也仍然有另一种可能，即日本人逮捕了他以后，仍然继续保持着向莫斯科传递情报，当然是假情报。时至今日，某些日本人仍然倾向于这种可能性，但却无法确实加以肯定。

西园寺公一的奇怪事件也勿庸回避。西园寺原是属于日本贵族青年中的一个，他经常与近卫亲王周围的人接触。他是外务省的顾问，并以此身份参加了佐尔格的特务组织。也就是尾崎所在的那个情报组织。他被指控为侵犯“军事秘密”而被宣布有罪，但却只受到缓刑判决的处罚……显然那是因为他是日本政界要人西园寺公望亲王孙子的缘故。

时至今日，西园寺公一仍然是一个颇具神秘色彩和令人神往的人物。西园寺公一生于1906年，曾就读于牛津大学。1934年进入外务省，他属于裕仁天皇亲信圈子里的人。但由于他娶了一个艺妓为妻并投身于无产阶级事业，因此被认为玷辱了高贵的门第，并给上流社会的人脸上抹了黑。他于1936年出发去美国参加“太平洋问题研究会”的报告会，一年

以后他便成为“世界问题研究会”的主席，其时他正在外务省工作。在访问俄国时被作为“日本的布尔什维克”介绍给斯大林。

青年时期，他立志当一名剧作家，但由于受到挫折未能如愿，遂改做外交工作。他给人的形象是一个无主见的人。在外务省工作时他替俄国人出力，随后他又支持中国共产党。尽管他的观点有倾向性，即倾向于中国方面，但却不能怀疑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热情。他参加日本共产党是为了联合愿意同中国和平相处的日本人一道工作。他在外务省工作这一有利条件，对他促进中日接近应该是有帮助的。为防止日本人侵上海，他打算率领一个半官方的代表团到那里去，但却突然又中止了。

1947年他被选为参议院议员，重建了“太平洋问题研究会”并成为该会的领导人。他同中国的友谊并未减弱。甚至在东京每当有人提到他的名字时便有人咒骂。1958年他和全家都定居北京。在那里，他以毛泽东式的笔调宣布与“过去的错误”决裂。

1970年，在周恩来为他举行了告别宴会之后，他经香港返回日本，其间应一位王姓共产党人的邀请，曾在香港稍事逗留。在整整12个年头里，他一直是东京和北京两方的半官方大使。他在中国比任何居住在这个国家的外国人享有更多的特权和自由。他利用时间撰写有关中国烹饪和中国音乐方面的著作。1963年他为中日备忘录奠定了基础。根据这个备忘录的规定，以后每年都将有一个日本代表团访问北京。

1941年10月18日，警察督察小佐志同一位检查官来到佐尔格家里，这名特务便立即被捕了。其后不久，他整个的特务组织也便全部被破获了，一共是35人。尾崎和佐尔格于

1944年11月7日被处决。从逮捕到处决，其间有3年之久，这样长的延缓期令人产生了许多疑问：他那时还在人世吗？是否有另外那么一个人作他的替身代他服了刑？这一丑闻的披露既不利于德国，也不利于苏联。佐尔格曾是德国大使的心腹人士。实际上，日本人原想从他身上获取更多的情报，最后他们终于得到了佐尔格以忏悔的形式写的一份详尽材料。直到最后一刻，日本人都觉得对这样一个不可多得的人物处死是太可惜了。

但我们也不应对他的死持怀疑态度。他的死讯是他的情妇公诸于世的。在战后，她曾在一个公墓里找到了他的墓穴，经开棺验尸，在一些可辨认的形迹中，她认定，那几颗金牙是佐尔格的。

第十八章　珍珠港事件的后果

“日本的情报工作已成为严重的威胁，它在世界的情报系统中是非常有效率的。”

——艾伦·杜勒斯

在袭击珍珠港之前，日本尚以某种方式遵循着海牙协议的规定。在华盛顿时间13时，他们向美国递交了最后通牒，声明他们将于珍珠港时间7时30分（华盛顿时间13时30分）对美发起进攻。这样，在通知美国以后到发起进攻，只给美国半个小时的功夫来考虑问题，这份十万火急的通牒，其中有这样几句原话：“鉴于美国政府所持的态度，日本政府深表遗憾的宣称，它不得不认为通过今后的谈判来达成一项协议已成为不可能了。”

这是一篇战争宣言，措词十分明确。但美国海军却不明白它的重要性，一位美国海军军官十分明白地表明这种态度：

“我们搞不明白，为什么日本人要把这封信在13点送给我们。”

实际上，海军情报署在收到最后通牒几小时以前就收到了这份宣战的电文。甚至在这以前，海军情报署就应该明白，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了。美国国会专门委员会在珍珠港事件以后的调查报告中称：“破译日本的密码电报，远比从正常渠道了解他们的消息来得重要。”这一奇怪的断言，其结果是

使得人们完全忘记了日本送给他们的那个重要通知。

1941年，海军情报署收到了一份已译出来的电文，该电报是发给日本驻檀香山领事的，电报要求他尽可能全面地了解美国海军在珍珠港部署的情况。这封电报在一周内发了两次，但美国海军情报署竟没有把它转告珍珠港方面。

对珍珠港的轰炸是日本海军情报局的一次辉煌胜利。他们在整个太平洋地区有数百名间谍，这些间谍成功地控制了美国军方人员经常出入的那些妓院。日本人知道，在星期日他们会遇到更多进港的海军人员，而且他们也能够识别他们当中每个人的职务。这次袭击，不算基地上的物资损失，其它损失为：军舰18艘，飞机300架，官兵2500人。

在战前，英国人就曾多次截获过日本人的密码外交电报，美国参战以后，他们在密码破译方面又给予美国许多帮助。此后美国在这一技术上有了长足的进步，终于在密码战中赢得了胜利。日本人觉得自己的"密码"十分保险，这种想法是过于天真了。

戴维·卡恩曾指出："日本人对他们译出的那种晦涩难懂的密码文字过于自信，以为是天书难懂，没有任何一个外国人能够准确地翻译出来，这在开始是对的，并且说明后来成了首相的东条英机将军何以那么安心。"

在珍珠港事件以后，日本的各类密码破译人员大量增加。外语学校都改成密码训练组织。有一个"特务班"，就是在海军将领新村领导下的这样一个组织。它实际上是一个局，雇有几千名男女人员干这一工作，由三部分组成：日常事务处、破译处和小和田联络处。

同样，今天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美国人由于不能准确地分析出所收到的密码电报，当然也就不知道它说了些什么

东西，因此就犯了许多严重的判断错误。但人们同样也会赞成这个看法：珍珠港事件以后，日本的密码工作变得势弱了，因为美国人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而日本人却对此愈来愈变得漫不经心了。他们似乎还不明白，其对手何以竟能破译出他们的密码。在这方面，日本陆军情况比海军还弱。但在前几年他们却非常善于截获苏联的密码电报。

日本人要比同盟国精明。在对电文的推论和判断其蕴涵方面，他们从来没有出现过差错。他们也喜欢搞一些诸如发假电报等神秘的手段。

在海军方面，有一些情况是以一种古怪的方式被发现的。例如，1942年6月22日，一封原地址是寄给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位什么人的信，这次又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给退了回来，是退给俄亥俄州斯普林菲尔德市东高街1808号的玛丽·华莱士夫人的。下面是这封信的内容，此信系用打字机打成，其中文字错误百出：

“我所有的唯一的一些新玩具娃娃，就是3个可爱的爱尔兰人……您对我说，您曾给肖先生去过一信，当我去看他时，他已经把您的信弄坏了……他的车子坏了，目前正在修理中……。

玛丽·华莱士”

当玛丽·华莱士收到这样一封退信后，其惊异之心是可以想见的，尽管她的大名已写在信封上，但她却根本就没有写过这样一封信。她越研究越觉得这封信值得怀疑，这是一桩十分奇怪的事……她于是便向邮局提交了一份情况说明，并把这件事报告了联邦调查局。

如果不是又出现了从布宜诺斯艾利斯退给俄勒冈州的一

位太太一封类似的信的话，可能也就不会出现什么事情了，然而却从布宜诺斯艾利斯退到俄勒冈州一封信，信封上写道："查无此人"。但这位太太同样也没有向布宜诺斯艾利斯写过信，她便把这封信直接交给了联邦调查局。

这封信的内容是："我刚刚搞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暹逻舞女模型，不过它受了一点伤，但我们已把它修好了。它使我很开心。由于我再也不能搞到一个和它相同的了，所以我又把一个普通的玩具娃娃改造成了第二个暹逻舞女……"

这使联邦调查局感到大惑不解，于是便把所有类似信件都控制起来。经检查，诸如类似的信件不少，而且都有极多的拼写错误，并且信里都装有一些贝壳。其内容大致有以下几种："我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安达卢亚西[1]的舞女，而且一点也没有坏，我已准备把它寄走。"另一封是："一个泰米尔舞女将在1月份的第一周修好。"还有一封："那些打碎的英国妇女人体模型，要完全修复还得在修理车间里放几个月。修理车间正日以继夜地工作着。"

这种"文字游戏"联邦调查局是无法解决的，他们把这些信件交给心理分析学家和破译人员，其中有一封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您曾经向我打听我那些人体模型的情况，我为爱好此道的朋友们组织的俱乐部里举行过一次报告会。我所有的唯一的一些人体模型，就是3个可爱的爱尔兰人。其中一个是爱尔兰渔夫。另一个是拿着木柴的老太太，第三个是一个小男孩。"

分析专家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些隐语讲的是海军情报。经过反复分析研究，他们终于明白了，其中一封信中讲的是

(1)安达卢亚西是西班牙南部一个地区。——译者

美国海军的一艘轻型巡洋舰，它将在规定的日期有所行动，而英国的一些严重受伤的战舰将退出现役。“3个可爱的爱尔兰人”代表3艘美国军舰。“爱尔兰渔夫”代表1艘航空母舰，“拿着木柴的老太太”代表船体上层的木结构。但是拖了很久，他们仍然不知道这些信是谁写的。后来又收到一封信，上面写了发信人的地址，一位联邦调查局的人便前往调查。在当地，有人指给他一个女人，此女名叫维拉威·迪肯森太太，她在纽约麦迪逊大街开了一家专卖人体模型和布娃娃的商店。这是一个身材矮小的寡妇，约50岁左右，看上去相当瘦弱，根本不象一名间谍。但是经过核查发现，她曾经替一位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帝国之谷”的日本人开办过一家经济商行。她平素交往的朋友中，有日本人，有日美混血儿和海军军官。

调查进展到这个阶段，联邦调查局实在已完全无法肯定这些信件到底是不是密写信件了。但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即有一个很机敏的密码破译人员把“肖先生”同在珍珠港被击中的“肖”号鱼雷艇联系起来，而恰好这艘鱼雷艇也正在修理之中。他们觉得这种解释很有道理，特工人员便打扮成顾客模样，去访问那家模型商店。他们了解到这位女老板非常喜欢与那些日本人有关的玩具，他们同时还了解到，她丈夫生了病，为支付旅馆费和照顾丈夫，她还欠了一大笔债。

迪肯森太太发觉自己已受到监视了，因为她已怀疑那几位最近常来的顾客了。此外还有一件事也使她警觉起来，即她寄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信一直没有回音。一天，她下了决心要摆脱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于是便关了店门，前往俄勒冈州的波特兰。但她却没有料到，联邦调查局的人也同样会在这个城市对她进行监视，因此她来到波特兰后便很放心地和

一个日本海军军官在一起吃了午饭。

她于1943年1月21日被捕。她当时正在纽约她的开户银行里，从她的手提箱里查出了18,000美元，这些钱是日本人为表彰她的忠诚和出色的工作而付给她的4万美元的一部分。她被起诉替日本政府当间谍，并向美国以外的地方书写隐语信函，从而侵犯了信件安全法。她对指控她的两个罪名中最轻的一个，即侵犯信件安全法进行了认罪辩护，法院检查官们接受了她的辩护，因为他们知道，不然的话，被告的辩护律师也将会把责任推到她丈夫身上，而她丈夫已病入膏肓，行将就木了。她最后被判处10年监禁。

从那些隐语信件中，联邦调查局发现，南美洲那个地方很有注意的必要。美国人怀疑，日本人可能已在阿根廷、中美诸国甚至巴西组织了一个情报网，以进行间谍活动。1942年4月，一些情况资料中曾提到："一些日本人已带着他们的电台和美国海岸图出现在这儿（巴西）了。在一次搜查中曾发现40万发步枪子弹和大批自动武器……在圣保罗的另一次搜查中，缴获了他们42艘摩托艇。"

在美国和巴西警察之间，有一种非官方的合作，因之日本人在加基牙附近的港口设置很容易被发现。日本特工人员在那里建了一些燃油库，还专门为其潜艇修建了船坞。

在里约湾上，巴西政府拘留了200名敌方间谍，其中有一些就是日本人。有一个农业工人被逮捕，后经核查，他原是一位日本将军，名叫登能川友。最使人吃惊的是，在巴西一位工厂主的厨房里发现的那个人，当警察把这个女厨师头上厚厚的棕发掀下去时，他们发现，此人竟不是土著女人，而是一名日本帝国军队的上尉。5年以来，他就这样一直打扮成一个女人，而且该工厂主的全家还一致认为是到那时为

止，他一直是所有厨师中最好的一个。

后来美国人在战争中曾数次利用"玩具娃娃隐语"来对付日本人。但这却是一个危险的游戏，因为在间谍工作中，重复使用同一手法总是冒风险的。有一名在艾伦·杜勒斯手下工作的间谍，他的化名是乔治·伍德，此人在柏林外交部工作，他定期向杜勒斯提供情报资料。在日美冲突时，杜勒斯曾与他紧急会晤，向他要更多的关于日本的情报。双方约好，用随便想出的一个瑞士女人的名字为收信者来接收伍德的密信。有一天伍德收到苏黎世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上面说，有一位开玩具店的女友想了解一下是否在德国能买到日本产的高级玩具娃娃。伍德把这封信准确无误地翻译出来，并给杜勒斯寄去一批有关日本的情报。在这些情报发出之前，有许多关于东京的虚而不实的消息通过外交途径在传播着。驻东京和横滨的美国外交官天真地相信，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日本帝国的海军舰队尚停留在日本的水域内没有外出。他们得出这一结论是因为看到了许多日本水兵在横滨的大街小巷游逛，岂不知那都是日本的情报人员假扮出来迷惑美国人的手法。

在战争期间，一些日本军事代表团，从来不放过任何一个搜集情报的机会。1940年，德国国防部长为欢迎一个日本军事代表团举行宴会，一个曾在戈林司令部里工作过的美国间谍曾对当时的情况做过如下描述：

"厄恩斯特·尤迪特将军被好几个日本上校围着，在听他讲空降部队的组织及战术，他并画了一些草图，随后漫不经心地把那些解释性的草图放在一张桌子上。这时我发现其中一个日本军官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拿起来放在军衣内的口袋里。"

还有一个类似的小故事，也是这个人对我讲的。他说，

山下将军曾经说服了戈林、让他乘上一架"容克94"轰炸机到伦敦上空去观察情况，当时伦敦已经遭到德军轰炸，这样做虽是间谍战术中头等重要的事，但倘若在别国的高级军官中，有谁肯去冒这个险呢？

在美国参战以前，关于日本的大部分情报，其情报源都来自法国。尽管如此，他们对收集到的情报资料却缺乏去粗取精的仔细分析，而且经常对情报资料本身有怀疑。美国人事先就曾得知，日本人有在马来亚半岛登陆的可能性。其中有一份报告是这样说的："日本人现正忙于在他们将要侵入的土地上组织第5纵队。对于日本和尚或是在日本长大的和尚都将被优先派到那些地方去。目的就是让他们对当地土著民族施加影响，同时获得军事情报……在此一年以前，烧松上校已被参谋本部派往新加坡，他以一名雇工的身分在一家小橡胶种植园里当苦力，同时还在一个小岛上干杂工，这样一直到他全部搞清了当地的地形为止。后来他又当过搬运工、海军基地上的雇用工人。最后他在淡杯附近的一个日本人开的小橡胶种植园里当了工头，并在那里设立了他的地下指挥部。他的真正工作是为东京的参谋本部搜集有关的军事情报和经济情报，并把它们画成图表。

烧松上校是由日本陆军和海军军官中选调的180名军官组成的秘密派遣团的团长。他们专门收买当地人当情报员。他们的任务是负责记录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过往船只，在地图上标出可以登陆的海滩。他们中有一些人化装成苦力，另一些人则化装成渔民，或者担任拖轮的船长，还有一些人则混入橡胶园当雇工。有一小部分人当上了当地锡矿上的卡车司机。就这样在多种职业的掩护下隐蔽着他们的秘密活动。他们能够在各个地方如海军基地、仓库、公路，以及某些被严

格守卫的地方或无人看守的场所搞到尽可能多的情报。有些间谍甚至在马来西亚竟成了内河航道和在联接新加坡与桑佛巴鲁的公路上的夜间值勤。

烧松上校把搜集来的全部情报资料进行整理，然后再向东京写全面的报告。日本人对全面情况的了解比英国人要具体得多，这一点颇使德国人感到惊讶。

1941年4月17日，美国广播电台播送了下面一条消息：

“日本6个师已占领了海南岛，并正在热带丛林中进行作战训练。由于该岛自然条件与马来西亚十分相似，故此举的目的是十分明显的。”

美国面临着一个如此有效率的敌人，面对着一支在危急情况下宁可自杀也不愿被俘的军队，因此，华盛顿不得不慎重行事。一个名叫拉迪斯拉斯·法拉格的匈牙利人，他曾在美国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手下工作过，他曾对我这样说过：

这次战争使他十分恼怒。他曾在硫黄岛作过战，在那里他经历过一场可怕的大杀戮。因此，他要不惜一切代价使美军避免第二次那样的大杀戮。他曾要求我设法寻找一种心理宣传战，以促使日本投降。

在这一愿望的前提下，某些想法已经大致成型了。我们发现，日本人民是一个热爱和平的人民，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并非如此。这个国家在历史上只发生过两次世界性的冲突，但内部小集团的斗争却一直未间断过。要说服日本投降，我们却没有一个情报人员能在现场帮助我们完成这一任务……于是我们只好直接同皇室接触。

关于对日宣传和对日本的情报工作，对美国和英国来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当时英国空军在暹罗上空撒下

成千上万包火柴，因为当时在那里火柴奇缺。这种“魔鬼的把戏”在一开始时颇见成效，当地人民争先恐后地抢拾这些火柴并拿出去卖钱。但心存报复的日本人却强迫暹罗电台播发出如下的警告：

“‘阴险的英国人’给我们扔下来的火柴，里面装的是炸药。”

第十九章　密码电报：一次决定性的失败

尽管对珍珠港的袭击对日本海军来说，是一次超出预料的胜利，但美国的反间谍斗争却保证了美国在密码战中取得了胜利。

这一点今天的日本人也承认，正如历史学家伊藤正则所说：

"美军最高司令部对于中途岛作战计划的情报，和日本参谋本部掌握得几乎一样多，但他们却放松了防务措施。海军被通过中途岛发出的无线电报、雷达干扰，以及各种情报搅昏了头脑。"

日本人要在两条战线上解决通信问题：在欧洲，他们同德国人的联系有一部分已经中断，在"布雷契莱庄园"(1)英国人破译了德国人用以同日本传递情报的密码。对珍珠港灾难性的打击，对美国情报机关产生的直接后果，便是逐步地加强了它对密码电报的破译和分析。因此，当日本准备发动中途岛战役时，美国海军情报局已经得到情报，并且已有能力破译出日本发出的大部密码电报。

那么日本人为什么在进行密码收发报时突然变得如此疏

---

(1)"布雷契莱庄园"是英国政府破译机构所在地的名称，官方的名称是"政府密码学校"。——译者

忽了呢？因为他们已逐渐开始对自己使用的密码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随后又对自己的“紫色发报机”[1]的安全性也产生了怀疑。这时德国人便向他们推荐自己的“埃尼格马”发报机[2]并声称，他们的发报机绝对安全可靠，而且打算立即给日本人运送一货轮德国制的这种发报机。当货物全部上船以后，德国即告知日本人该货轮运行的详细路线及到达日本的时间。但“布雷契莱庄园”的密码破译人员又截获了这份电报，他们欣喜异常，任凭德国货轮继续前行并不打算对它加以拦截，因为他们知道，这种发报机发出的密码，破译起来比日本的更要容易些。

美国人决定要尽早地搞到日本人入侵中途岛的作战计划。这时监听站的人员发现了一个迹象：可能日本人要对一个被称作《AF》的地方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击。这就意味着阿留申群岛、夏威夷，或者中途岛这三个地方有一处要受到攻击。海军上将切斯特·尼米兹据此作出结论：日本人可能要对中途岛下手。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猜测，他便命令驻中途岛的美国海军司令向他发出一份当地严重缺水的明码电报。这一计谋成功了，美军的破译人员便做好准备等待东京对此事的反应。果然，几天以后便截获了一份日本电报，电文中说《AF》缺水。

当日本人在中途岛登陆时，美国军队早已严阵以待。美国人取得了这次作战的胜利。这是整个太平洋战争中具有决

（1）又称“紫色密码机”，日本名为“2597型字母打字机”，因该机制造于日本皇历2597年（公元1937年）而得名。美国将从该机获取的情报称为“魔术”。——译者

（2）“埃尼格马”也有意译为“哑谜密码机”的。英国人将从该机获取的情报称为“超级机密”。——译者

定性的一次转折。

1942年，英美等国成立了情报协调局，由麦克阿瑟将军领导。这对日本来说，事情变得更为棘手了。该情报协调局的美国分部渗透到日本人占领下的菲律宾，而该局的英国分部则把自己的触角伸进了整个东南亚。在这场情报战中，同盟国方面只取得了相对的成功，因为它的指挥部分别设在密拉特(1)新德里和康提(2)。日本人曾不止一次地破获过英国人使用的密码。

英美两国付出了无数的金钱，牺牲了众多的生命和耗费了大量的时间，采用接近犯罪的手法，依靠一些军事组织如136航空队和101缅甸分队等来实施其发狂的反日计划。例如，其中的一个计划是，印制几百万张日本火车票，票上的始发站分别是东京、大阪以及其它大城市，终点是日本的另外一些地方，然后由美国的轰炸机在日本上空把这些车票到处撒下，从而造成其铁路系统的瘫痪。

在荷属印度尼西亚等地，日本占领军方面通过东京广播电台宣布成立“贞女协会”。该协会旨在联络印尼一带居民同军方合作，以为日本的侵略政策服务。

日本电台关于这方面的宣传工作全部由情报部门的军官负责。负责陆军部情报的最高长官是秋山中将，而宪兵队则受命对专门从事宣传的部门进行全面的监督，并且也负责对他们雇用的“二世”(1)实施监视。

---

(1)密拉特是印度北部的一个小城市。——译者

(2)康提是现在斯里兰卡的一个城市。——译者

(1)“二世”系指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日本人，他们的父母都是侨居在美国的日本人，根据美国的法律，这些人一生下来便具有美国国籍。——译者

这些美籍日人，由于对他们祖国始终不渝的热情，使他们对东京做出了最高奉献。他们当中绝大部分都被拘禁起来，以免形成一种地下的抵抗势力。其实，日本政府在这方面的恐惧是多余的，在这些“二世”当中，从来也没有人企图搞日本的情报或者对日本有所背叛。

常志少校是日本对外广播组织的负责人。他负责对外务省、内务省、陆军、海军、新闻界和电台等的协调工作。他经常性的工作之一，就是专门收听并收集在美国各地发生的各种不幸的天灾人祸，然后再用短波电台向美国国内播放，同时也把这些灾难性事件分别用广播电台发到美军前线的各个阵地。这些广播之所以影响大，其原因有二：第一，他的这些新闻都十分准确可靠；第二，美军太平洋部队当时没有其它办法收听别的新闻，因此美国大兵和水手们几乎是没有办法避免收听东京对他们的广播。

当时美国前线的军队对“东京玫瑰”特别感兴趣。由于有了她的广播，那些节目竟变得特别受美国军队的欢迎。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人们以为“东京玫瑰”只是那一个姑娘，其实这种猜测是错误的。

日本宪兵队曾审问过一个名叫艾瓦·托格丽亚的美籍日本姑娘，她来自加利福尼亚，但自日美冲突以来便一直居留在日本。他们让她加入日本国籍，但她拒绝了，然而却违心地接受了对外广播的工作。可是命运却嘲弄了她，尽管她对任何同日本的合作都不情愿，在战后却成了“打击妖婆”运动的牺牲品。她被关进了监狱，罪名是曾经作过日本电台的“东京玫瑰”。今天我们已经了解到，当时有许多年轻的姑娘都曾当过“东京玫瑰”。艾瓦·托格丽亚最后得到福特总统的特赦。

日本对外广播的另外一些节目则致力于瓦解美军的士气。其中有一个节目叫做"孤女安尼"。这个节目专门对美军在前线的士兵们播放一些美国国内发生的天灾人祸。下面便是这个节目中的一个典型例子：

"孤苦伶仃的太平洋上的战士们，你们好！……你们能听到我的声音吗？我希望能够听到。因为今晚节目是应听众要求的点播节目。我为我这个小家庭的全体成员——太平洋上不听话的流浪者们，选择了一个让人喜欢的节目。第一张唱片是这个家庭的老板点播的，你们能猜得出来吗？是《我的承受力已到了极限》，由邦尼·巴克演唱。老板，您的欣赏趣味真是太好了！"

有时候这个电台也对英国人广播："向你们全体致意！各位无辜的人，你们今天晚上过得怎样？你们有能力承受另一次精神上的打击吗？很遗憾，我听说，你们国家的明星们曾访问过你们在国内的军队，但却没有勇气到缅甸的热带丛林中来冒险……因为这儿太远了，而且又十分潮湿、酷热难耐，再加上疾疫流行。而你们。小伙子们，却不得不永远忍受着这一切，这确实太遗憾了！"

这种挑拨战术，比起德国的宣传手法来要有效得多。德国人的宣传只能让人发笑。日本人在开始时取得的这种宣传上的成功，得力于情报军官们坚持不懈的监督工作。

在中国，日本人情报工作的形式是化装成各类人员，其成效远比其它形式更大。保密工作做得也很出色，竟使我们对于日本人何以未能同蒋介石签订一个和平条约之事一无所知。日本的情报人员已经打入蒋介石情报部门的内部。有两个逃亡在马来西亚的年轻的中国女性被日本人收买，成为在中国的双重间谍。她们曾在日本某基地受过严格训练，并同

戴笠的特务机关建立了联系。戴笠是蒋介石的一名亲信特务。她们本应留在中国国内的特务小组里工作，由于精通英语，便要求其上司把她们派往印度。在印度，她们的任务是打入美国设在那里的情报网。

这一计划执行起来相当复杂，但却在逐步完善地向前发展着。她们加入戴笠的特务机关以后，便出发到加尔各答，对美国人说她们是从新加坡逃出来的，并向美国人表示，愿意继续同日本人作斗争，而且什么工作都愿意干。由于她们表现得象两个修女，美国人便把她们安排在一个教会学校里工作。这可是一个任何人都不会怀疑的工作岗位。

但在新德里的美国人如果不是发现他们同中国交换的情报竟被传到日本去的话，是没有任何人会对她们产生怀疑的。这件事意味着蒋介石的特务机关里混进了外人。于是美国当局在同中国方面接触时便加倍地注意起来，另一方面他们又密切监视着同美国情报机关的军官们有联系的所有外国的怀疑对象。

一连几年，这两个中国姑娘都不间断地向东京提供情报，无论在新德里还是在加尔各答，她们都没有引起过任何怀疑，而在这两个城市中，美国特工人员正在进行调查。有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特工人员发现她们中的一个人买了一些收音机零件，而另一个则和一些美国军官出去了。于是特工人员便围绕着这两个姑娘缩小了调查范围。

其中一个姑娘同美军一位少校订了婚，并准备举行订婚仪式。调查人员认为，在邀请的客人中，肯定会有同日本人联系的间谍人员。而对那个买收音机材料的姑娘跟踪的结果是一无所获，但他们仍然怀疑她可能是在中国的领事馆内给日本驻缅甸的情报站发了电报。

订婚仪式在晚上举行了。奥利弗·卡德韦尔曾对那晚的情形作了描述：

“中国使馆的一位少校是我们怀疑的对象之一，他当时坐在壁炉旁边的一张靠背椅上，同那位姑娘靠得很近，一边同她聊着天。我坐在靠背椅的另一边，仰在那里假作打盹。少校长篇大论地对她讲着关于性疾病的问题，最后并就此问题向她提出了忠告。她却坐在那里纵声大笑，然后凑到我面前在我脸上吻了一下，便离我们而去。一点也不说谎，这个姑娘对我说，她知道我是一个美国间谍。”

就这样，那个漂亮的女间谍在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对她进行任何试探时，便不留任何痕迹地消失了。从那时起，美国人便坚信，在蒋介石的情报机关内部有叛徒。但再找到那个女子是不容易的，因为她不再使用原来的真实姓名了。一位在东南亚情报机关担任领导工作的日本军官，后来曾对我们这样说过：

“我觉得这个人很可能是打进戴笠情报机关里的四个姑娘当中的一个。这四个人中有两个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另两个被暗杀了。现在这个就是你们认为在新德里和加尔各答之间搞间谍活动的那一个。我们不得不把她调离，因为美国人已对她产生了怀疑。后来她被调到吉大港，在那里搞英国进港船只的情报。战后她定居在缅甸，而且现在也仍然住在那里，但我不想告诉你她确切的住址。……”

还是这位军官，他又告诉我说，日本军队的军官们曾研究过中国古代军事家孙子的兵法，他说：

“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日本人曾深入地研究过《孙子兵法》，时至今日仍然如此，这位军事大师的著作被列为必读书目。我们日本人是世界上第一批翻译出孙子用间的论述者。

我还可以告诉你，1905年的英译本，其中某些章节还是在日译本的基础上翻译的呢。这本书名叫《森西》，日文的意思就是《孙子》。”

“要了解戴笠，必须熟悉《孙子》。我们需要一份关于他的准确资料以便揭示此人的能力和弱点。戴笠于1925年加入蒋介石的军事系统。但在1923年至1927年之间，他却同共产党一起工作过。蒋介石在尚未巩固自己的地位之前，顾不上对他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改造，而是利用他来巩固其后方。我们对他的历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上面那些问题他一直是保密的。你知道，他把所有他年轻时的档案资料统统一把火烧掉了，他甚至把在年轻时同他来往的人都设法杀掉了。这是一个卑鄙的家伙！但他却非常相信他手下女特务的工作成效，如果你收买下他的一个女特务的话，那就很容易让他也上你的当。”

珍珠港战争结束以后，庞大的日本间谍队伍的数量减少了。1941年在秘鲁有两万名日本人，其中大部分被引渡。1944年11月份，有人在利马发现了7具日本人尸体，警方当局在搜查罪犯时，在一个五斗橱内发现了德国和日本的各种传单以及地形图和标有美国人驻地的各种地图和照片，此外还有一些秘密社团的标记。

日本人在土耳其成功地保持着一个有效的情报网，其存在的时间比在欧洲其它各地都长。所有的秘密社团诸如“白狼会”，“灰狼会”等，由于其关系广泛，都曾在各阶层中吸收过会员。东京内务省属下的一个有日本人和土耳其人的活动小组一直同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有联系。日本外务省还在土耳其“资助”了两份报纸，它们分别用法文、德文和土耳其文出版。在一份外务省的秘密通报上还披露过4个土耳其人的

名字，他们都曾不定期地受雇于日本情报机关。这些人的主要任务是，及时向东京通报情况。他们同时还组织了一个出版外文刊物的中心机构，以便给新闻界规定“一条方针”，同时也是为了给当时的宣传机构以影响。

1945年1月日本驻安卡拉大使馆烧毁了其保存的大量档案资料，因为其时土耳其刚刚同日本人断绝了外交关系，在5个月前，当土耳其同德国断交时，日本人把纳粹在土耳其所有的秘密联络关系都接了过去，并同德国订了一个协议，规定日本人把德国人留下的秘密档案，将全部秘密转移给德国。

该情报网的主要成员名叫波拉·科克。她原是一名助产士，在阿达纳主持一家新闻机构。有人说她手下有2000名特务分散在中东搞同盟国海上运输的情报，目的是刺探同盟国军队调动的情报。

第二十章　新的起点

他们曾掠走我们的枪支，
还夺走了我们的弹药。
他们强抢了我们的资源，
还虏去了我们的同胞。
我们曾把唾沫吐在他们脸上……
而现在，他们全国上下
又在重新武装。

——玛丽娜·契芙塔耶娃

毫无疑问，在现代国家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象日本那样，它在1945年遭到了战争的失败，但却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尊严和井然的秩序。德国军官瓦尔特·斯坦尼斯上尉，曾描写过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在遭到原子弹轰炸后，日本军队中的气氛，他写道：

"日本人在美军到达之前，仍然继续管理着上海。尽管战争已经结束，他们的军队仍然秩序井然。日本人在战争中遭到了失败，但仍保持着堪可楷模的尊严……在投降以后，他们仍然继续保持着军人应有的仪表，始终严格地遵守着纪律。我曾见到过一队日本士兵，他们手持上刺刀的步枪，面前是一群中国孩子对他们百般辱骂，向他们身上吐痰。但他们始终保持立正姿式，纹丝不动，面不改色。"

这是一个一直想取得世界大国地位的民族的新起点。在其它国家已远远超过它时，它需要一切都从零做起。不应该忘记玛丽娜·契芙塔耶娃的诗句："我们曾把唾沫吐在他们脸上……而现在，他们全国上下又在重新武装。"仍在武装吗?是的，但却不是为了军事上的称霸，而是为了取得同超级大国匹敌的地位。

1945年10月4日，同盟国占领当局颁布命令，把日本内务省的一些军官移交法庭审判，并解散宪兵队和政治警察。同时宣布，对原在押的政治犯，其中包括共产党人，予以释放。但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即对日本共产党人，并没有宣布把他们置于法律保护之外，而对他们采取了另外一些相应措施。在朝鲜战争之前，麦克阿瑟将军宣布清洗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24名委员。这一行动的直接后果是，日本共产党立即恢复了他们的地下活动。在清洗了极右的民族主义分子以后，对极左分子也实行了清洗。1952年4月，和平条约生效以后，仍有8,711人服刑，其中3,000名是宪兵队成员。

在同盟国占领时期，黑龙会被解散，其它秘密社团也同时被宣布解散，那些社团同黑龙会都有经济和商业交往。此外，依据法令，还有233个右派组织也被解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儿玉新闻社的创始人儿玉义夫被任命为东久迩内阁的顾问。这个老间谍，由于他具有丰富的从商经验，曾对日本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还不算他精通中国和东南亚事务这一特点。但在他1948年获释之前，服了短期徒刑之后，占领军当局宣判他为战犯。后来他作为反对恐怖主义的中右派分子的一员，在国内仍然是一位有影响的人物。

渐渐地日本赢得了占领者当局的尊敬和信任，并被当作

盟国的一员来对待。

设立在东京的同盟国四强（美国、苏联、中国和英国）委员会，不但无益，反而成了障碍。该委员会的宗旨是执行华盛顿的亚洲管理委员会的各项决议。这些机构的工作，后来的情况表明，都相当缺乏经验。在实际工作中，双方都可以不遵守决议。因为实际上麦克阿瑟是唯一能领导日本占领当局的人物。他显然是当代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人。而在缅甸的洛德·蒙巴顿则以可怜的印度"副皇帝"的面孔出现。正象印度取得独立后一位自由派政治家所指出的：

"至少，麦克阿瑟没有强迫一部分日本人去杀害另一部分日本人，而蒙巴顿由于他的分裂主义做法，却使得整个印度都在流血"。

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星期内，下令组建了一支75,000人的警察预备队。

一个新的安全保障机构便在1952年10月15日建立起来，它负有陆军和海军的自卫权力并负责维持内部秩序。两年以后，"议会"投票通过，成立一个经过修改后的新的安全机构：防卫厅。于是1954年7月1日，陆上自卫队以及海上自卫队和航空自卫队便正式合法化了。

至于从老的含义上讲的那种情报机构已被严格禁止。但从逻辑上讲，其陆、海、空三军自卫队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情报网。1952年7月，原来的"公共安全调查所"改名为"专门调查局"。同时警视厅又成立了一个监视处，其任务是监视那些左的或右的颠复分子。这个武装监视组织自成立之日起，其任务就是发现并破获各种颠复活动和颠复组织。比起战前的这个组织，它已不那么带有镇压性了。尽管这些人都有随时逮捕权，但他们却更喜欢把注意力放在研究颠复的原因上。

很显然，这些防卫系统的建立并不是使所有的人都开心的。"国民救国联合会"会长大森曾就某些安全措施提出了批评，他说："最近以来发生的变化，使我产生了一种想法，即政府当局正在对极右的各种组织加强控制。它尤其想在我们同志们之间制造互相怀疑的恶魔，以便使我们之间的关系破裂，这样一方面破坏了我们的联合，另一方面又削弱了或者阻碍了我们辛苦联合起来的各种力量的集中……我们应该全力以赴认真对待，以免成为这一阴谋的牺牲品。"

日本情报机关的目标不在于打倒真正的民族主义者，而在于对那些前共产党人进行监视，因为他们在这些组织中以极右的面目出现。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确实已改变了信仰，但也仍然有那么一些表面上"睡着了"的人，冒险渗入各种运动之中以求制造混乱，这就是那些极右分子何以受到监视的原因。还有一些协会之类的组织，其名称稀奇古怪。例如有一个名叫"无双诗歌协会"，它宣称，"要提倡对神的崇高信仰，对天皇的无限忠诚。"这个协会应该是没有什么可顾虑的了，因为在这个协会里文人气氛和宗教气氛比政治气氛更浓，力主恢复老传统。

慢慢地，不知不觉的，但却是民主式地，日本又重建了它的情报系统，这我们将在下面几章内谈到。这个情报系统已成为一个办事非常有效率，不仅只是为了防止日本受到内部或外部骚乱和侵犯的机构，而且还成为一个能够在情报工作方面提出新观念的机构。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日本可以采取主动措施了。它自朝战以来第一次准备同南朝鲜进行会谈，但他们认为，如果缺乏对汉城政局变幻的情报，就会有诸多不便之处。在此之前的几年中，日本人已经破译了南朝鲜的密码电报，这就使得

日本在未来的谈判中能够做充分的准备。然而南朝鲜发觉了日本的手脚。于是它同驻东京使馆的联系，由原来的发电报改为通过外交信使办理。

第二十一章　战后的情报工作

“对日本的防卫政策极端重要的是，坚持不懈地密切注视所有军事动向，诸如自己领海周围的空中和海上动向，本国领空上的动向……同样重要的，还有收集今后世界发展趋向的情报。”

——引自“防卫厅通报”(日本，1978—1979)

上面这份通报归纳了自那以后的10年中对海军和陆军情报工作的要求。更远些，该通报还重申了日美安全条约的必要性，认为那是日本非常需要的。为了完美无缺地完成这一密切注视世界的工作，反潜艇巡逻，空中巡逻和海上巡逻必不可少。

随着陆、海、空自卫队发展的同时，各部门的情报机关也重新建立起来了。防卫厅下设有几个专业部门，如防卫局，其下又有防卫处，第一情报调查处，第二情报调查处等，所有这些部门同时又归国防会议和国家公安委员会领导。保安局也同样重要，下设第一、第二、第三公共安全处、外事处和安全研究处。

公安调查局专门对颠复活动进行研究，归法务省领导。但法务省只负责对颠复组织的处理和对棘手问题作出决定。

此外，现在又添了一个“国民自由局”……。

如果说，表面上看起来，这些局、处在机关中占了优势的话，同时也应该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工作人员公务员化进程的放慢，而是每一个环节都与其它环节紧密相联。这些机构代表着当前政府一个平衡的整体形象。

大部份情报都是由在合法机关中工作的热心人自动提供的，在这个新的行政机构建立的前期尤其是这样。1958年3月，日本的“航空杂志”上刊登了一些在日本领土上降落的一架u-2飞机的照片。在当时，人们对这些武器几乎是一无所知。一位17岁的学航空工程的学生悄悄地在空军基地拍了一些这种飞机的照片。一年以后，一个滑翔机飞行俱乐部的一些成员在藤泽机场的跑道上又拍摄了一架涡轮喷气机紧急着陆时的照片，同样是偷偷进行的。

这些业余摄影爱好者们立即发现，这种飞机带有某些神秘色彩，因为驾驶员不穿制服，但却在腰上挂着支手枪，于是第二天他们便把这事报告了“航空杂志”编辑部。

在1963年“至1965年期间”，日本共产党是归北京的，他们终于明白了苏联通过华沙条约的约束来阻止各国人民开口的做法以及对他们的中国同志可采取的粗暴态度。这些共产主义战士也同时看到，苏联的间谍人员在时刻准备着窃取日本的秘密：1969年日本警察捕逮了一个名叫小田原的大学生，因为他窃取了工业机密。警察发现这个小伙子曾在苏联的一所大学里学习过一年，已被克格勃收买。

日本同外国情报机关的合作已成为不可避免之势，尤其是在战后那几年。在60年代中期，美国中央情报局利用经济人的力量企图恢复南越的经济，但是谈判毫无结果。当然，日本通过它众多的商业间谍所掌握的情况远比美国人

多，在这方面它表现得相当慎重，但终于夺走了这个市场。

日本人在航海情报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进展。海洋的"瞬间"情报，对所有情报大国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首先，因为在水面上发射的核武器由于时刻都受到监视，所以容易发现和对付，而一颗水下发射的导弹，它在深水下运行，便构成了真正的危险。至今人们也很难说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能在地球上很准确地跟踪一个从潜艇上发射的核武器。

1968年，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出一个答谢代表团访问美国、加拿大、英国和德国，以感谢这些国家在发展反潜艇武器方面向它提供了宝贵的情报。法国分配公司专门对北海道给予特别优惠，因为它三面都靠着苏联的领域，只有一个海湾是自由之地。日本海底的地势向声纳提供了一个复杂的图形。暖流层的深度除夏天外，一般很浅，到夏天它又可以加深。如果在暖流层以下设置导弹发射装置就很难在声纳上反映出来，这于潜水艇也很有利，可以防止被发现。但声波的发射要通过浅层水带，这一特性便大大方便了那些能够在沿岸水域装置固定探测系统的国家。在日本领海的中心部位，除了大和山以外一般是平坦的，因此从固定探测站向外发射声波是有利的。日本的地下监测系统很可能搞得同世界大国的监测系统同样完善。

这里谈不上又回到扩张主义政策问题。1978年苏联国防研究所研究员、海洋问题专家马克托·莫莫耶对远东战略的不平衡，曾作过这样的归纳："日本对苏联的威胁晚了10年的时间，因为依据美国的理论，我们认为它的海军是构不成威胁的。"日本记住了这个教训，正如防卫厅第4号通报上所说的："苏联舰队围绕着日本、以及超越日本的各种活动正在加剧，其目的并不在于加强训练或是刺探情报，而在于扩

大其政治的和心理的影响。”

日本以长久不懈的警惕性战胜了这一威胁。它的雷达扫描覆盖了其全部海域及北部地区并直到西伯利亚。所有的海上船只都可以通过电子侦察予以定位。

近几年来，海上情报工作使日本人同中国的距离缩短了。日本人在自己的海岸上实施近距离监视，美国的第7舰队在日本海域以外的地方进行巡逻，而日本的情报部门则在美国的帮助下担任海岸警戒的任务。日本防卫厅长官坂田道太估计，苏联在海参崴的舰艇共有750艘，总吨位120万吨。其作战力量为：巡洋舰10艘，反鱼雷艇80艘、潜艇120艘，其中核潜艇40艘。此外，这些舰艇还比美国第7舰队的要年轻。20年来指挥这支舰队的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指挥官谢尔盖·戈尔什科夫上将。日本人还了解到，俄国人无意保留海参崴基地。他们在萨哈林岛(1)的科尔萨科夫建立了一些基地，在苏维埃港建立了一个潜艇基地，另外在堪察加半岛还有一个夏季基地。

俄国人从未间断过对日本水域的探测。1976年5月15日，日本警察逮捕了一个名叫亚历山大·马什金的特务，因为他曾企图获取美国第7舰队的密码以及关于雷达方面的秘密资料，其手法是向日本的一个一级海军上士购买这些材料。此人后来被宣告无罪，因为重要的机密并没有泄露。这是公开的说法，实际上马什金很可能充分地满足了日方感兴趣的一些东西才换得了这种宽大处理。

一年以后，朝鲜的一名间谍及其5名同伙在东京被捕。70年代，日本大大地加强了对间谍的防范工作，但却产生了

(1)即库页岛。——译者

一个新的威胁：一种新的名为“赤军”的组织出现了。它同著名的“红色旅”和巴德·梅霍夫的恐怖组织极其相似。这个“赤军”是从日本共产党中分裂出来的一支队伍，其领导人是一位女性，名叫茂野房子。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情报机关很注意中国情报机关的活动情况。

在1970年左右，日本执行了一种有限度地重新武装起来的政策。三军自卫队制定了各自加强情报工作的计划，并成立了一个统一的中央情报局，开始时有百余名情报分析人员。这一计划是基于苏联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所执行的扩张其海军基地的做法而产生的，尽管当时日本的军事预算只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而当时的美国却占7%，苏联竟占12%。当时日本的三军自卫队同公众的关系一直很好。在实际工作中，当遇到自然灾害，或动员青年人参加各类体育学校时，都请三军自卫队队员出来帮助。但政府仍然注意人民群众对它们的批评意见。每隔3年首相府便组织一次全国性的民意调查，以了解群众对三军自卫队和对防卫厅的反映。在1978年的一份《关于对三军自卫队和防卫厅的民意调查的通报》中指出：调查结果表明，占被调查人数86%的人愿意保留三军自卫队；76%的人认为它们“有用”；13%的人认为它们应该停止活动；5%的人认为它们是“不好的”。

1978年的这份通报是面向全国的，它宣称：“情报工作以及国外间谍人员所有的地下活动，由于日本在世界上的国际地位的改善而加强了。”但在这方面却只举出了[20]一个例子，即长途电信局的一名职员偷了电信局的器材。在此之前的几年，舆论界也曾为一件事发生过轰动，而居住在日本的一名南朝鲜反对党的领袖在他下榻的旅馆里被南朝鲜情报局的人

绑架了，并把他解往汉城。当这位反对党领袖于1980年被判处死刑时，日本以停止对南朝鲜的经济援助相威胁，火车司机们也鸣笛一分钟以示抗议。

1976年9月6日，一名俄国飞行员驾驶其"米格-25"式喷气飞机叛逃，降落在日本。他在逃离俄国之前，用英文写了一封信带在身上，当他在日本降落后，刚一出飞机便把该信拿了出来，信中写道："请你们立即同美国情报局的代表联系，同时把我驾驶的这架战斗机进行安全保护，不要让任何人接近它。"

于是美国人和日本人便共同到现场调查，证实该飞机是当时最新式的，但俄国人却秘密地放进许多炸药。他们没有料到日本人会发现，日本人发现后便把炸药拆除，同时还担心俄国人会派飞机来摧毁它（因为那些飞机就在他们头顶上飞行着），便把它转移到东京以北60英里的另一个基地去，随之便对它进行全面的鉴定，每一个部件都经过认真地检查，在此期间俄国人要求把他们的飞机送回去，于是该飞机便被分解成零件，装上一艘苏联船只运了回去。与此同时，日本人向苏联递交了一份账单，记载着该机的运输费用及着陆机场的损失费用，而俄国人又要求对该机的"随意拆卸"应给予损坏赔偿。结果双方谁也没出半分钱。

专家们的收获是把"米格-25"进行了分解，但当时他们也只能是粗略地一瞥而已。使他们吃惊的是，他们竟发现机身和机翼里有许多锈斑。那么可以断定，"米格-25"的制作材料并不是钛，那是什么呢？日本人把它靠近磁铁时发出的沉濁的声音证明了他们的猜测：该飞机仅是简单地在外面包了一层钢皮。这使得专家们目瞪口呆，其中一位不禁赞叹道："真是奇妙的设想！"另一位说道："这种飞机能很好地完

成它的飞行任务，可其造价却远比我们制造同一类型的飞机要便宜，很明显，俄国的设计师们是很注意造价低廉的。”

这一插曲表明，日本对自己的情报工作并不给以某种限度。他们不只对该飞机的设计、制造和性能等感兴趣，而且也同样注意使用的材料、成本，以及质量和价格的关系等。在国际方面，他们完全明白，过大的经费开支带来的是生活水平的下降。

与亚洲其它国家相反，日本一直同南非保持着外交和商务关系，它的一个舰队曾对南非进行过礼节性的访问。关于南非情况，日本肯定比西方其它国家知道得更多。

1977年，澳大利亚一位老外交家在东京说，西方的某些大国在几年中已经记录并破译了许多日本的信件和外交电文。此人名叫格雷戈里·克拉克，是前澳大利亚首相的秘书。同时他还透露，澳大利亚情报部门也曾破译过这类电文。他于1965年辞去外交部的工作。因为他坚决反对在越南进行的战争政策。澳大利亚使馆和日本外务省双双否认克拉克的断言。如果说，针对日本而进行的情报工作已有了很大发展的话，那么其结果则是，日本的反情报工作也得到了加强，甚至还可以说取得了某些惊人的成就。

情报部门研究了加强安全措施的办法。一个名为“和平和安全研究所”的机构，在法国设备公司的支援下，于1976年成立。另一个是“日本安全研究中心”，其领导人猪木正道于1979年发表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他说：“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对南朝鲜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对于东北亚的稳定也是必不可少的。”

日本从心底承认，它自己是无法进行防御的。有人却强烈地批评它的防务政策。据情报机关透露，1979年苏联在千

岛群岛又建立了3个航空基地。同年，苏联以3,000人配以坦克、重炮，以及地对空导弹在择捉岛和国后岛登陆。1980年3月俄国人又在千岛群岛装备了核武器。

美国人不断地对东京施加压力，以使其承担起保卫自己领土的责任。依据宪法的规定，日本不得在自己领水和领空以外的地方展示其三军自卫队，同时还不能发动任何形式的进攻。这就明白无误地说明，他们只能等到别人在头上开枪时才能反击。在当今的世界上，这种规定显然是不合适的。象美国那样希望日本加强防务的国家，绝非个别。

1980年，由于对一个苏联在日本的间谍网的破获，发生了许多不愉快的事情。

1980年1月29日，由于在陆军里发现了外国间谍，防卫厅长官接受了陆军参谋长永野茂门将军的辞呈。

为了确定转往国外的资料是何种性质以及这一间谍活动干了多长时间，警察在11天内传询了3个怀疑对象。这一事件的发生使高级军官们大伤脑筋，他们还从来未听说过在自己的军事情报局内部出过叛徒这种事。对于一名58岁的退休将军实行逮捕，同时还逮捕了两名现役军官，这一件事也使高级军官们感到窒息，因为数名军官同时被证明犯有间谍罪，这在日本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另一件不正常现象的出现，又把形势推向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如果说自己的情报人员把美国提供的雷达和武器等的资料偷偷出卖了的话，那么根据美日签订的条约的规定，他们就有被判处10年监禁的可能，但如根据防卫法的规定，如果他们向外泄露的情报不涉及日本本国情况的话，其最高刑期也只能是1年监禁。

日本的新闻界于是便把注意力放在泄露出去的情报到底

是何种性质这个问题上来。他们认为这些间谍可能泄露了日本的军事情报机关活动的内情、日本三军自卫队在北海道设防的情报，以及中国军队设防的情况。据一份报纸透露，某些资料竟以每份1,000英镑的价钱卖出。被怀疑收买这些资料的两名苏联间谍曾是苏联大使馆的随员，其中一个是尤里·科兹洛夫上校，他恰恰是在3名涉嫌人员被捕的消息传出后离开东京的。天刚破晓，警察便开始了搜查行动，并获得了一些绝密文件。向警方提供情况的是该间谍网上的一名判变者，名叫斯塔尼斯拉斯·莱夫琴科。由于这一事件的发生，使得该间谍网彻底解体了。宫永将军由于粗心丢下了一个记事本。上面记有俄国人对他的指令，还记有电台联络的日期。搜查人员宣布，在这位将军家里还发现了一个密码本，有了这个密码本就可以破译他们的密电了。

宫永将军不仅向检查人员交出了俄国人的指令，他还为他们表演了如何在电台上接上一个录音机，这样可以保证不漏掉任何联络的内容。这次审迅还透露，3名被告每人曾得到6,200英镑。宫永将军被判处他所犯的该类罪行的最高刑期——1年监禁，其他两个人均为8个月。这一事件刚刚结束，一些议员即向议会提出一个新的立法议案，内容是如何更有效地防止间谍活动的措施。苏联人在各方面都享受豁免权的时间太久了。

第二十二章　情报工作开辟了通向繁荣的道路

“在明治天皇时代，日本人的思想已经比当时提前了20至30年，这一情况今天仍然如此。”

——哈坎·赫德伯格

世界上有几个国家的情报机构的创立，其压倒一切的宗旨是为了使其国家更加繁荣、人民的生活日益改善的呢？答案是：除日本以外，一个也没有。当然，这一结论需要加以说明，即日本情报机构的一部分任务是以防务为中心的。因为一个明智的国家不这样做就不明智了。但可以说，日本的情报有85%，甚至90%是用来使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加繁荣的内容。

日本，从其传统上看便有这种倾向，即它喜欢研究外国的有用的东西，并把它们拿来运用到自己的国家。这对日本来说并非一个新政策，但对它的情报人员来说，却是一个新任务。哈坎·赫德伯格是个眼光锐敏的观察家，他指出，日本自明治天皇以来，其思想就比当时提前了20至30年。日本人以其聪明和才智，不声不响地对那些看起来似乎是自己痼疾的东西加以改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各方面都处于严重的瘫痪状态，它的军队数量仅能够用来维持自己的防务。

“野蛮的”间谍时代，武侠时代，以及秘密会党阴谋反对王朝的时代，已经随着新宪法的诞生而结束了。

日本由于已不能再有庞大的开支，于是便把情报事业的装备限制在最小的程度。它把剩下的经费用于组织全球体系的情报搜集，而这种全球体系的情报搜集，按西方的定义讲，已经不属于情报范围了。这种搜集系数可以向日本系统地提供一大批有关商业、工艺发展、经济研究，以及或远或近的、所有能够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情报。实际上，这种情报的积累，其目标是相当广泛的。因为对一个日本人来说，他的“知识面”要包括多种领域的内容，诸如行政管理、科学的工艺水准以及有关生产程序等方面。此外，其它国家面对工会主义者是怎样做的呢？外国的消费者最常提出的问题是什么？……等等。甚至他们对生态学也都很重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这种对世界的全面探测，其结果可以说是神奇的。从这种态度中，西方国家、苏联集团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应该吸取不少的教训。事实上，如果第三世界国家能够以日本为榜样，他们可能已经摆脱了由于失误所造成的贫困。同样，西方国家也早就应该把眼睛转向东方，并从中取得教益：“如果你想变得富强，就要决心得到它。”

日本人民本质上的特性，的确大大地帮了自己的忙，使他们得以建立这个“全球情报”网。日本人生来就具有渴望学习别人的本性，渴望用新知识武装自己并对那种新知识加以完善。另外，他们的劳动力，从劳动经济的观点来看，比起欧洲来，是很经不起冲击的。它用于国防方面的开支仅占国民生活总值的一个很小的百分比，这一点对它的经济起了推动作用。其经济研究中心著名的一个原则是：“用于防务的

开支绝对不许超过国民生活总值的1%。”20以后这一原则似乎不太可能继续保持下去，然而到今天为止，事实仍然证明着它是正确的。

日本在这方面可以依靠的，有许多非政府办的机构，如创建于1971年的几何研究院就是其中之一。该研究院对私家公司和官办企业都有非常可贵的帮助。对这个研究院的研究人员的任务，一位有远见的欧洲商人曾这样评论说：“在日本人的观念中，理想的老板是那些能善于发现他所需要的人才，把他们安排到适合其特长的工作岗位上，并又能尽量发挥他们主动精神的人。他的作用决非西方人所认为的那种决策人和老板所起的作用；他倒更象一个教育者或经理。其次，他还应该全力以赴地、不知疲倦地去寻求新知识，他能领导他手下的人向既定的目标前进，但却绝不强迫命令。只要有新的思想，不管是从哪里来的，他都欢迎。其结果便是群众的意见非常一致与协调。在西方，象这样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

这一在大范围内搜集情报的工作，后来变成了一个企业性的活动，它同私人工业、高等学府协调紧密、联系密切。因为这些单位是它搜集来的情报的第一个消化场所。在日本，商业学校的数目同美国的等同。为了满足情报人员将来在国外工作的要求，在各大学里都设置有专门课程。人们把这些情报员称作经纪人（兜售商品也是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但他们经常性的工作则是收集情报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评估，对下面这样一个认识，他们的思想并不狭隘，即：尚不为你所知的事，绝非小事。例如，在50年代日本人曾对全世界的摄影爱好者的人数作过统计，根据得到的数字，他们制定了一个标明市场潜力的图表，经过断断续续地同摄影师

们的研究，他们终于了解到公众喜欢什么型号的像机，从而使日本人在国际相机行业中取得了领先的地位，而且在满足消费者需要方面远远走在其它国家同行的前面。

1956年，一个“经济外交”的方案开始成型，在这个时期为了收集新技术和新工艺，日本企业界向国外派出的人员不少于1万人，派往美国的人数尤多。维廉·H·福比斯对此可以证明，因为他为了研究这个国家曾在日本住了6个月。“它派出去的使者们总共花了20亿美元买下了西方所有的工艺技术，这个数目仅是美国用以研究和发展这些工艺费用的1/10。”

为什么这个国家以白手起家，竟能把事情办得如此之好呢？答案不只一个。不错，他们把情报工作看成是爱国行动，把它看成同战时的军事情报同等重要，是一个原因。但是，他们的情报观念，其内涵是那么丰富而广阔，以致积累下十分浩翰的情报资料。日本人是不知疲倦的，就象一个永远在活动的观察员一样。他们还能够把对技术人员的使用同对经济人的使用结合起来。把对工程师的使用同对大学教授的使用结合起来。这样做，他们就会把本钱压到最低限度。除了这些原因以外，还有就是他们本身的天才，他们的思路比世界其它国家超前20年到30年。这就使得他们能预测电子市场的形势，预测高速火车的形势，以及新式相机的市场形势。

其压倒一切的王牌乃是商界人士同政界人士之间紧密的凝聚力。美国贸易委员会主席E·T·哈密尔顿1970年曾说：

“日本的贸易，由国家给予引导，政、商双方行动起来犹如一个整体，主要原因是计划安排得当才具有这种力量。”

这个情报网的最高领导是通产相（即对外贸易和工业部长）。通产省负责政府部门同工业部门之间的联合与协作。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向实现人们所说的政权同资本主义举行别人无法做到的婚礼。通商产业省把日本推向了世界舞台的前列并为它组织了自己的研究班子，组建各类工艺学科的实验室，筹划对各种科研项目的投资，以及制定未来的规划。日本外务省共有2517人，而通产省的人员，在我写本文时则已达到15,449人。

日本的"经济企业联合会"与通商产业省有密切联系，该联合会有三个主要目标：第一，对各类企业的利润和基本需求加以分类；第二，替政府制定相应的贸易政策；第三，推进国际上的情报收集和交换工作。

当然，其渴望了解世界事务的目的是想使日本在世界上更具竞争力和更加富足。但这种求知欲却在某些国家引起了抗议，他们把日本称为"工业间谍"。对日本的非难有些是合情合理的，有些则是虚伪的。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所谓"工业间谍"，最令人瞩目的是在欧洲，特别是在东欧各国。当一个国家想赶上它的竞争对手时，它要寻找一条捷径，那应该是很正常的。

"分散在日本各工业部门中工作的间谍，就有1万名之多，"美国驻东京的一位记者曾这样说，在东京只有380家私人探所被规定为专门从事同行业秘密情报的窃取工作。去年，随着工业保护学院的创立，工业间谍受人尊敬的程度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这所学院的成立，其目的就是公开地为日本的同业工会培养间谍和反间谍人员。

"在这个国家，除了专利证书能够受到保护以外，没有任何一种法律规定禁止窃取商业机密。"

职业外交官、前驻土耳其大使栗原被任命为这所学院的领导人。在他的9人领导班子中，有一些是经过长期锻炼的职业情报人员，如深町让，他原是海军破译专家。再如古屋达夫，此人原是一个情报机关的负责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上海搞过情报训练。在该学院第一批50名学员中，有很多后来成为年轻有为的干部。他们原所在的公司把他们选送到这个学院来进修，对他们进行多方面的训练，在4个月的进修期中，学习内容有：如何在监听器上安装电话，在接受器的监听装置上发射远距离红外线，如何用可以渗透过皮手套的无色染料覆盖机密文件，以使偷窃秘密档案的人手指染上颜色等技术。

这些青年人完全可以同100年前到欧洲去学习工业秘密的那些年轻人媲美。那些先躯们，有一些人在英国兰开夏的棉纺织工业部门中找到了工作，然后他们又回到日本，再把所学的技术和掌握的情报拿出来，从而使得这种工业能够有一个飞跃的发展。原"盖洛瓦钢铁公司"经理卡特赖特先生于1966年在"英国促进科学发展联合会"上曾说："英国的工业应以日本为榜样，即向国外学习。在这方面日本的格言是：'找到世界上最好的方法，然后再加以改进。'如果英国的工业也采取这一方针，那将是明智的。"

有一大批各种类型的组织主动帮助政府，向它提供各类经济情报。其中，一些部门只向它提供各类信息；另一些部门则属"智囊团"性质，向它提出深入研究某一课题的建议，并具体提出对某一新发明的改进意见。到目前为止，有100多家公司充当着这一"智囊团"的角色。野村研究院就同美国资料互助同业工会进行合作。该研究院全部人员为550名，其中科研人员就有270人，他们分别在纽约、伦敦、巴西、香港

等地设有办公室，其研究范围几乎覆盖了各个领域，从投资的设想到地区的规划，还顺带对环境问题进行研究。各种资料集合起来以后，送往一个名叫信息使用中心的地方，那里设有一个资料库和一个资料室。

三菱研究所是这些“智囊团”中佼佼者之一。该研究所覆盖了欧洲、美洲、中东、非洲以及东南亚。三井集团是历史最悠久的研究机构之一，创建于1616年。它于1891年便开始派职员到国外学习。是首批向外国派出人员的大公司之一，它在全世界各大城市中设有185家分公司，从伦敦到纽约，从纽约到内罗毕，都有它的分公司。

其成功的秘诀在于项目多样。它经营石化工业、房地产业、航空设施及各类成品制造。所有这些项目的经营活动都以极高的效率在进行着。其关键是它的信息网24小时不停地运转。该信息网不间断地把属于该公司在国际上的业务进行归纳、分类。这种信息化系统始于1957年“信息部”成立以后，这就不但决定了它经营的信息化，同时也促进了它研究体系的细密和情报收集的精确。

各研究单位还负责设计规划工作。例如“未来工艺研究所”和“动力研究所”便负责所有能量利用的可能性和对“行为科学”进行探索。这些研究内容包括对业余时间的利用问题进行分析、对地震灾害的研究及预防措施、对发展核能城市的研究、对垃圾的利用，等等。

日本也同样重视国外的研究信息。有一种理论，认为动物将成为第六感官，它们可以在地震时预先发出警报。这一动物警报说，在中国已有记录并在进行研究，其它国家也有类似的研究。但这一理论似乎并不能每次都应验。负责东南亚方向的国外研究处又开展了一项在印度尼西亚建立“工

业区”可能性的研究和调查，对阿曼的苏尔塔那也开展了同样的研究。东京的研究部门还把其科学研究人员派往纽约、伦敦以对其鉴定结果进行实地测试。同样的工作在巴西和拉丁美洲也在积极地进行着。

其它国家也经常搞一些调查研究，但却是盲目的、互不协调的，或者是领导这项工作的人缺乏实际的专业知识，以致对材料无法作出正确的评估。更为经常的是，在那些国家进行这种工作，政府完全不予赞助。更有甚者，那些调查结果往往和部长办公室的一堆卷宗堆在一起，这样，那些宝贵的资料便如石沉大海杳无消息了。但在日本，很少有什么研究项目不取得政府支持的。至少，没有不通知政府就自己干的事情。

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出现，日本人立即就感觉到，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到来。通用电器公司在买下法国的布尔机械公司时，认定欧洲没有力量支撑一个独立的电子计算机工业。就在这时，日本经济企业联合会和通商产业省对欧洲和美国作了比较，于是决定全力支持对美国进行信息研究。

日本通商产业省的重工业局成立了一个情报室，由一个研究小组领导，专门从事对美国的信息研究。今天，除苏联和美国以外，日本和联合王国是发展独立信息工业的唯一两个国家。日本的研究人员曾经去过“硅谷”。这片肥沃的平原当时以其出色的果园出名，今天却是十几种半导体工业的中心。1978年有一份报告称，日本的情报人员在该地贪婪地搜集所有的情报，有时是公开的，更多的情况是秘密进行的。他们购买各种新机器的样品，然后送回国内。他们对什么都想知道：该地区的收益情况、生产情况，以及未来的规划等。在国内要想研究出这些产品并掌握它们的工艺程序，要

花昂贵的代价，而且需要1年的时间。然而在“硅谷”，他们只需找人谈一次话，便可得到想要的一切。

日本的科技工作者大部分都在日本各企业设在当地的办公室工作。

日本人也利用监听器，把各种情报都输入计算机内。他们正常的工作程序就是听课，参加讲座。但他们工作的另一方面则是同美国各大公司的工程师及干部们联系。这种联系一般都在工作之余。只要他们碰到美国人，总要设法从他们身上得到些东西。在这些信息部门中工作的，每年的雇员都占20%，他们的报酬都非常丰厚。

在电子研究部门，日本人很重视同西方的竞争，尤其注意保持其在东方各国的领先地位。在这一研究领域中，日本人对反情报工作的注意几乎与情报工作相等。西方大多数国家如果不经海关同意，均不得出口自己的电子器材，而一般地说，海关也很少签发出口证明，因为这关系到对苏联的封锁问题。

日本人有关经济方面的行动，如需做出决定时，不是按技术情报提供的情况做出，而是根据政治和外交形势而定。在世界其它各地尚从未见过有外交和商业配合得如此默契者。三军自卫队与“经济企业联合会”也有密切的联系，在这方面只有英国国防部同英国企业界的密切协作才能同它相提并论。1970年防卫厅向私营工业企业提出，要其雇用1万名退役军人，目的是要实行一种“军队和工业之间的经济交换体制”。

把军事情报同工业情报联合起来的重要性，在防卫厅1980年10月的一份通报上曾间接地强调过：“站在绝对自卫立场上的日本，要坚持进行不间断的情况收集活动，以便时

刻提高警惕，为保卫自己的领土、领海和领空的完整而取得必要的情报……日本尚需改善通过卫星获取情报的工作。”

上面的声明是防卫厅于1980年作过一份统计以后发表的，该统计表明，1980年有360艘苏联军舰通过对马海峡和宗谷海峡，苏联飞机在那年也有157架次飞越日本海。这一切苏联当局也是承认的。

杰出的技术专家之一，经济问题研究中心的领导人奥田三郎是罗马俱乐部的成员，此人思想十分活跃，是1960年日本发展纲要中心起草人之一。该纲要规定的目标是要使日本的国民收入翻一番。

经过深入的思考，他得出结论说，日本工业的集中发展引起了日本环境污染问题，并提出了一个减轻环境污染的紧急方案。在一个象日本那样人口密集并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里，环境污染问题很快便成为一个严重的威胁，这个问题的解决，由于借鉴了外国的治理经验，取得了很大进展。政府对诸如“日本钢铁公司”这样的企业施加了压力，为了维持生态平衡，该公司在它的高炉周围种植了1000万棵树。

各情报部门都很重视研究政策问题，研究各国的材料来源问题，以及情报工作领导人员的工作职能问题。1962年，一个专业代表团被派往马来西亚，其使命是就新政府的稳定情况提出报告。

对中国也是如此。日本的经济企业联合会积极同日中贸易委员会合作，并于1979年成立了一个日中同业委员会。下一年日本又派了一个专家组前往福建和上海对同类企业进行考察。

世界上不论发生任何变化，或政府的更迭、或有新的发现，日本的信息部门都要对其进行详尽的研究。当在澳大利

亚发现铝土矿时，“三井”马上便成立了“三井铝业公司”对其进行开发并向日本提供精炼铝。在政治领域，日本人的行动也是相当快的，例如1980年9月，日本向津巴布韦派出了一个44人的综合贸易代表团。它是向这个国家派出代表团的第一批外国政府，其时津巴布韦宣布独立才刚刚6个月。